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之比較研究



研 究 生：吳佩娟

指 導 教 授：陳章錫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一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

之比較研究

研究生： 吳佩娟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曾金和
蔡洲鑫
陳章錫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張錫輝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一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之比較研究

論文摘要

劉向與范曄都是我國文學史上，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和史學家，劉向為「戒天子」而編纂的《列女傳》開創了中國古代各種女訓類書籍的先河，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記載女性事蹟為主的傳記類作品，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婦女專史專著。范曄的《後漢書》，沿襲劉向列女列傳的體例，在列傳裡增立《列女傳》，使女性史在史學上第一次納入正史的行列。因此本論文試圖通過對劉向《列女傳》、《後漢書·列女傳》兩書的作者背景、列女的形象、學術地位及其影響作分析比較，以期能了解劉向及范曄之《列女傳》寫作宗旨與當時漢代儒學籠罩之下的文學呈現出之列女風貌，以及其《列女傳》的歷史地位與對後世深遠的影響。

首章緒論探討的是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接著對是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在古代與現在的研究史狀況討論，以及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闡述。

第二章探討劉向與范曄所處之時代與社會背景，藉由了解兩人的家族世系與家學淵源、其生平與仕宦過程，進行深入分析，並比較兩人能有異於常人的眼光與進步的思想而開創女性傳記作品的成因之不同與差異。

第三章則以列女形象為主體核心，分析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中的立傳標準、女性角色形象群的分類，並進而比較兩書列女形象群之差異性與演變的趨勢及時代背景之成因，以了解漢代女性在封建儒家思想薰陶中的傳統婦女角色特點。

第四章分析劉向《列女傳》，在編輯上之進步的政治與思想傾向，突破了單一的節烈標準中獨特與創新之處。並討論《後漢書·列女傳》在史學體裁、內容、方法上的突破與史學史上不朽的地位。接著研究劉向《列女傳》對後世廣大且深遠的影響，以及分析受《後漢書·列女傳》所影響的後代正史中，所撰列女的取

材標準之異同，藉以總結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對後世的影響。

關鍵詞：劉向、《列女傳》、范曄、《後漢書·列女傳》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之比較研究

目 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摘要	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6
第三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22
第二章、劉向與范曄所處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25
第一節、劉向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25
第二節、范曄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35
第三節、劉向與范曄的比較	44
第三章、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56
第一節、劉向《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56
第二節、《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74
第三節、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比較	82
第四章、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影響	91
第一節、劉向《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價值	91
第二節、《後漢書·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價值	100
第三節、劉向《列女傳》的影響	109
第四節、《後漢書·列女傳》的影響	119

第五章、結論.....	133
參考書目.....	13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古代傳統男權社會下的傳統女性備受忽視，關於女性的文獻記載與男性相較而言也屈指可數，而正史為我國古代記載社會歷史的重要文獻之一，雖然同樣是在以「男權政治為中心」時代角度下編纂而成，但其中卻不少關於女性的文獻記載。諸如《皇后本紀》、《后妃傳》、《公主傳》、《列女傳》等一些女性獨立傳、紀及一些附載於其它傳、紀中的文獻紀錄，它們共同建構了對中國古代婦女社會系統而齊備的記載，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女性寫入史冊，從先秦、秦漢就有，《史記》、《漢書》中均有關於女性人物事蹟的記載，如《史記》中的《呂后本紀》、《外戚世家》，《漢書》中的《高后紀》、《外戚傳》和《元后傳》。但是可從中發現，這些傳記記載的女性皆是皇親貴族，並非一般民間婦女，而她們的事蹟，若不是父系權威的附庸，就是做丈夫事蹟的點綴，很難有能真正表現自己的位置。而劉向《列女傳》的成書，將女性從寄附他者的傳記中分別出來，獨立而撰之。

劉向（前 77 年—前 6 年），字子政，原名更生，漢朝宗室，沛縣人。著有《別錄》、《新序》、《說苑》、《列女傳》、《洪範五行》等書，並且編訂了《戰國策》、《楚辭》。劉向曾官中壘校尉，故世稱劉中壘。明人張溥輯有《劉中壘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有賦 33 篇，今僅存《九歎》一篇。

在《列女傳》以前，古籍中雖然也有關於「哲婦輔國」、「美色禍國」等等女性角色的零星記載，但直到劉向才有目的地將它們統整歸納、分類編撰成傳記總集。除了將女性（《列女傳》）、男性（《列士傳》）分成專書記載外，劉向的第二層分類概念就是將女性形象再加以「分門別類」，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等，劉向將事蹟相似的同類女性人物集結成一傳，再透過這些人物的德行操守，闡明自己的對於社會的道德理想。

《列女傳》為第一部專只描寫女性的雜傳文學，劉向不但對書中所記載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加工和改變，並自成一套關於女性傳記的敘事結構：先清楚地說明傳主的國籍、姓字，其父、其夫或其子為何許人，之後再挑選一兩件足以稱譽的行蹟，再旁徵博引，文末仿春秋三傳的「君子謂」¹、「頌曰」之評論贊語。這體例成為後世女性傳記書寫的模範。女性傳記的書寫模式經過歷來的發展，在劉向的《列女傳》中成為固定型式。

自從劉向《列女傳》出現之後，魏晉以來有女性傳記陸續的問世，而將《列女傳》列入體例齊全的紀傳體史書中的，則始於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范曄（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劉宋政治家，歷史學家，宋左光祿大夫范泰之子。曾任秘書丞、新蔡太守和尚書吏部郎。官場多磨，後因謀反被殺。《宋書》本傳稱他：「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任宣城太守時，博采魏晉以來各家關於東漢史實的著作，刪繁補略，撰成《後漢書》紀傳九十卷（十志未及完成），為我國史學名著。

關於專為女性設立一歷史場域，嚴格說來並非始於《後漢書》。在此書之前，《史記》、《漢書》中也有專屬於女性的範圍。《史記》的《呂后本紀》與《外戚世家》即有不少女性入傳，《漢書》則有《高后紀》、《外戚傳》與《元后傳》，但這些女性都是皇后嬪妃，並沒有平民百姓的婦女入傳。此後《三國志》專記女性的是《后妃傳》，也是與皇室相關的婦女才有紀錄。《後漢書》無《外戚傳》，范曄則把皇后、公主列入《皇后紀》中，貴族勢家的婦女若值得立傳者就併入各家傳，有賢德的女性則置入《列女傳》中。章學誠頗贊成范曄的做法，認為「女性宜分傳例也」，他說：

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為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

¹ 非獨《左傳》專美，《公羊》、《穀梁》稱引君子評論以解經亦所在多有。黃翠芬，〈《左傳》「君子曰」考證〉《朝陽學報第一期》（1996），頁4。

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為定則。²

自此開始，性別被作為一種分類方式，在紀傳體史書中，女性形成個別性質的列傳，而且擁有身份的歸類意義。其後《晉書》、《魏書》、《隋書》、《北史》、《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及《清史稿》，諸史隨之，皆設有《列女傳》。

而且，在正史中紀錄女性社會生活的主要文獻資料裡，《列女傳》也是我們能獲得古代社會女性觀及道德觀、倫理觀等最好的史料之一，因為它們描述的對象主要是以社會中中下層女性為主，而與《皇后本紀》、《后妃傳》、《公主傳》等所載女性相較而言，與當時的大眾生活更為貼近，代表的女性群體也更具一般性和現實性。而文學界對這部分的研究早已引起了不少重視，尤其是在婦女史研究方面，不斷從中發展，研究視角及材料等各方面進一步拓展深入之後，對正史中《列女傳》研究更是繁多，成果亦相當豐厚，範圍擴及到了史學、文學、社會學、美學、倫理學等各個領域，除此之外，仍有不少範圍尚未涉獵，尚待我們繼續探討。

「列女」之名，源於何處，成書何家，何時成書，這是進行女性傳記研究需要首先搞清楚的問題。前段提及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的說法可知《列女傳》乃劉向之首創，據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記載，《列女傳》編撰於西漢成帝永始元年（西元前 16 年）³，其內容將女性具體分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大類，共 104 篇，記載了上古至秦漢時期 110 名女子的事蹟。在每篇之首，都設一段簡短的序言，用以說明作者在撰寫此類女性的取材標準和歸類的原因。七個分類中，除了《孽嬖傳》外，其他皆為頌揚讚美之意，這樣的分類基本上顯現了劉向「善惡兼收」的原則和取材標準，突出了他以「戒天子」為主的編撰目的。

劉向《列女傳》中有不少獨特的寫作手法和風格特色。一方面，劉向在書中

² 章學誠撰，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82。

³ 錢穆撰，王雲五主編，《漢劉向、歆父子年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36。

會先略述其傳主的一生，然後突出傳主的某一典型事蹟加強描繪，別的部分只用一句或數語簡單交代，具有鮮明的小說特點，為我國古代人物小說的雛形。另一方面，劉向寫《列女傳》，文風「清而婉」，各篇簡短精悍，清麗簡約，樸實明達。各傳形制短小，最長的 1387 個字（《母儀傳·魯季敬姜》），最短的一篇僅僅 90 個字（《母儀傳·湯妃有新》），一般 200 至 400 個字左右，但卻收到了文約事豐的效果。

劉向為西漢末期的碩儒，以校勘群書而享譽青史，他傑出的文獻學成就，從兩千年來一直澤被學林。他一生對於漢室十分精忠，思君報王。一生中入獄三次，雖然政治上沒有太高成就，晚年居清要之官，也離政治中樞越來越遠，但因領校中秘書，而開創了中國目錄史。他以「戒天子」為目的而編纂的《列女傳》創立了中國古代各種女訓類書籍的先河，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以專載女性事蹟為主的傳記作品，更是我國的第一部婦女專史專書，在我們瞭解西漢以前婦女的社會生活和精神樣貌之概況時，提供了有用可信的資料。劉向的《列女傳》充分顯現了儒家重人倫、倡教化的中心思想，傳中每個女子的記載中都有他宣揚儒家教化的影子。因此劉向特殊的寫作用意及取材標準，自成書之後，歷代研究者就相當重視。如果我們仔細、客觀解讀《列女傳》的女性形象，就可以發現不少珍貴的劉向的婦女思想，可以看出那些女性所散發出的奇特光彩，這些都會與後代的研究者以啓迪與影響。

探討劉向《列女傳》對後世史學作品的意義和影響，最首要的當稱其「首創」之功。傳記的基本形式到《史記》已發展成熟，但以傳記的形式將女性事蹟表現獨立成書，《列女傳》卻是史上第一部。《列女傳》讓婦女得以像男子一樣，在史書中爭得一席獨立表現的地位，對女性傳記的後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南朝范曄是繼劉向之後為婦女正位正名的又一人。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沿用劉向列女列傳的體例，在《後漢書》列傳裡增立《列女傳》，使女性史在史學上第一次被納入了正史的記載。且范曄的《後漢書》是第一部將中下層女性的德行、事蹟以類傳的形式寫入歷史的正史，在此也具有首創之功，而范曄也

曾在其《後漢書·列女傳》小序中提到過「賢妃」、「哲婦」、「高士」、「貞女」等幾大類是其主要表彰的對象，可見劉向的《列女傳》對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是有一定的影響的。在《後漢書·列女傳》取材標準上，范曄只提出了一條核心標準，即：「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⁴」。范曄把在才德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婦女分別建立類傳，這是《史》、《漢》所沒有的。西漢劉向撰《列女傳》，但那是作為專著以獨立成書的樣貌出現。在紀傳體史書中設女性類傳，是從范曄開始。可見劉、范二氏之《列女傳》在體例方面並不完全相同。但就內容而言，卻有其共同之處，即取材的女性行蹟範圍比較廣，注意到了各方面的婦女人才。因此，《明史·列女傳序》中說：「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為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⁵」注重婦女才學及德行，不專主於強調節烈，這就是劉、范二人著書的共同宗旨。

以歷史編纂學的視角來看，范曄所撰的《後漢書》雖不如司馬遷所著《史記》，創造出紀傳體史書的宏規，也不如班固所撰《漢書》，建立起紀傳體斷代史的範例。但是在完整齊備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卻立下了很大的貢獻。這主要表現在增加其類傳的設置。《史》、《漢》類傳比較少，一方面是社會文化現實反映還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創作之初，無法顧及到如此全面。例如劉向在西漢末撰寫了《列女傳》，《漢書》如要多設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而班固卻沒有注意到這點，直到南朝范曄才達成了這一符合社會的客觀需要。從《後漢書》以後，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幾乎就已齊備了。後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類目有所增減外，基本上已固定下來，可見《後漢書》的關鍵與地位。

歷來雖然學者們都注意到了劉向《列女傳》和范曄《列女傳》的重要地位，兩書各自之專門研究也很多，但在已有成果中，用比較之方法來分析兩《列女傳》之差異的研究卻略顯欠缺，而且運用比較研究法這一研究方法，恰恰又是最能清楚而完整呈現兩《列女傳》整個時代背景與女性形象的方式。

⁴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頁 4715。

⁵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7689。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期待能從劉向與范曄兩人開始分析，了解其生長環境、仕宦過程與社會背景，探討兩人能成就出首創其《列女傳》的箇中原因，試圖藉由兩作者的比較得到完整的了解與認識。其次主要要分析兩《列女傳》中，傳主的女性形象，是用什麼思想去分類與取捨的標準，並比較在兩個不同的朝代中，被劉、范二氏所記載下來的列女形象，有何差異性與時代的意義。再者，是分析兩本首創《列女傳》之學術地位與對後世的影響，兩書雖然在內容取材上，有接近與共通之處，但劉、范二氏之書在體例方面並不完全相同，因此兩書對後世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本論文將就此深入分析探究。

《列女傳》是我們當今研究古代社會婦女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因此這樣的研究既有重大的學術價值亦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從中深思並借鑒其中積極的道德思想，希望能達到古為今用並推動現代社會婦女事業與生活能良好發展的效用。因此，本文旨在以分析作者背景、書中之女性形象與對後世之影響為切入點，通過比較研究，期望能從中窺探一斑。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古代對劉向《列女傳》之研究狀況

劉向《列女傳》書一出之後，即受到古人之重視，東漢時期有班昭作注(即曹大家注)，馬融為之作訓解。三國時曹植、虞貞節作注，晉代有皇甫謐、綦母邃注本。唐代劉知幾、宋朝葉大慶對劉向《列女傳》皆有研究，北宋嘉祐年間王回著有《古列女傳序》，南宋蔡驥、明黃魯曾均有作序，清代中期乾嘉學派興起，更加重視了校注的部分，出現了王照圓、梁端、蕭道管三大注本。另《隋書·經籍志》、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等大著均引用有關文章，段玉裁、王念孫、孫貽讓、顧廣圻等學者都為它做過注釋或校勘⁶。古代劉向《列女傳》研究情況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⁶ 詹曉青，〈劉向《列女傳》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高等教師碩士在職班，2008）。

（一）劉向《列女傳》撰寫內容與史實相同與否的研究

因劉向《列女傳》是雜采眾家之言，因此劉知幾評論劉向《列女傳》為「廣陳虛事，多構偽辭⁷」，在他的《史通·雜說下》中寫道：「……非其識不周，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⁸」劉知幾舉《左傳》懷嬴的例子，認為懷嬴是個淫婦，《列女傳》卻視她為貞節的女子；《漢書》記載懷南王因謀亂而被滅族，《列女傳》卻說他成僊而登上天堂，劉知幾認為劉向如此，是不尊重左丘明與班固所做的史書。宋人葉大慶亦認同劉知幾的看法，在他所著《考古質疑》中，對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中所載之古史傳年代、人名、事實進行整理，駁正了其中錯誤的地方⁹。

當然也有完全持相反的意見的，如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內編》的「劉揚優劣論」一文中，認為「此乃秦火之後，舊籍無稽，據傳聞之異詞而筆之書，非學術之疵也¹⁰」，且全祖望還認為劉向思想正統，所著的書對後世也有不小的影響。嚴可均認為：

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牴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說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見多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¹¹

他們認為「多聞闕疑」是因時代久遠和文獻已無可考，但無論是「切中其失」，還是「多聞闕疑」，他們都有共同之處，都是基於一種嚴格的史學意念。

（二）對於《列女傳》及其頌義之作者的爭辯

《列女傳》為西漢劉向所作，《漢書》所載已經很明確了，但羅根澤等認為

⁷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頁79。

⁸ 劉知幾著，朱恆夫、姚松譯注，《史通·外篇》（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2002），頁362-364。

⁹ 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二、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7）

¹⁰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九》（台北永和：文海，1987）

¹¹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說苑〉後》（上海市：上海古籍，2002）

此書為先秦人所作，劉向只有整理、校堪及序次而已，不能算劉向所編撰。這種說法當然仍需商榷，考證劉向父子所著《別錄七略》（輯本），直接寫劉向所校書為「某書幾篇」，然後介紹作者，例如在《晏子》稱「臣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¹²」。而劉向只唯獨在所編的書前面，加「臣向所序」四個字，例如在《新序》則寫「臣向所序《新序》三十篇」，在《說苑》寫「臣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在《列女傳》寫「臣向所序《列女傳》八篇」，顯示了《列女傳》是劉向根據古籍所記載的史料編次而成，以及《漢書·藝文志》中的諸子之儒家類，就列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¹³」，又列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¹⁴」，既然肯定「揚雄所序」是為揚雄所編，那「劉向所序」自然應該就是劉向所編，並非只有校勘序次而已。

《列女傳》各傳後所附頌部分的作者是劉向、劉歆，還是三國時曹植，歷來一直頗為議論。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注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說明劉向所寫的《列女傳》還有頌有圖，《漢書·楚元王附劉向傳》記有劉向作《列女傳》「凡八篇」，就是七篇本傳之外應該還有什麼。北宋嘉祐年間王回在《古列女傳序》中解釋八篇為：「《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¹⁵然而在《顏氏家訓·書證篇》提出不同看法：「《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¹⁶因此很多人就後來認為頌義部分為劉歆所作。

曾鞏在《古列女傳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

¹² 施之勉，《漢書集釋·藝文志》（臺北市：三民書局，2003），頁4263。

¹³ 施之勉，《漢書集釋·藝文志》，頁4322。

¹⁴ 施之勉，《漢書集釋·藝文志》，頁4327。

¹⁵ 施之勉，《漢書集釋·藝文志》，頁4323。

¹⁶ 顏之推著，周復剛、陳絨譯注，《顏氏家訓譯注》（臺北市：建安出版社，1999），頁205。

明非歆作也。」¹⁷南宋蔡驥也認為「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鞏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¹⁸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認為「偽傳頌為歆作，始於六朝」。其實劉歆應實際作有《列女傳頌》，在李善注之《文選·思玄賦》中引用了劉歆的《列女傳頌》：「材女脩身，廣觀善惡。」的句子。但今本《列女傳》中的頌義部分並沒有這一句。而《隋書·經籍志》在劉向《列女傳》十五卷下，載有劉歆《列女傳頌》一卷，可見劉歆所作應是另一篇。《列女傳》問世後，為它作頌贊的人為數不少。《隋書·經籍志》另記載有曹植撰的《列女傳頌》一卷，還有繆襲撰之《列女傳贊》一卷，徐堅《初學記·卷十》引用曹植的《母儀賢明頌》，歐陽詢《藝文類聚·第十五卷》引用劉柔妻王氏《姜姬頌》、《啓母塗山頌》等頌文，但都不同於今本劉向《列女傳》的頌¹⁹，因此我們可以明確《列女傳》的傳、頌、圖都是劉向所作。

二、現代以來對劉向《列女傳》的研究概況

現代對劉向《列女傳》的研究，學者們主要研究的方法接續著古代學者的模式，研究焦點在於注釋、考證及對劉向身世研究幾方面，主要學者有余嘉錫、王國維、錢穆以及日本的下見隆雄等。在此我們主要探討近二三十年來對劉向《列女傳》的研究概況。

張濤是中國開放以來，在劉向《列女傳》的研究方面整體取得較為突出成就的學者，他利用前人的研究基礎，統整編注了《列女傳譯注》，並撰寫不少學術論文探討《列女傳》的思想與學術價值，內容關於《列女傳》的政治社會思想、婦女的倫理觀、史學價值、文學成就、版本等方面，為後人的研究《列女傳》提

¹⁷ 劉向著，張濤譯注，《列女傳譯注·曾鞏目錄序》（濟南市：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350。

¹⁸ 劉向著，張濤譯注，《列女傳譯注·蔡驥跋》（濟南市：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351。

¹⁹ 歐陽詢編《藝文類聚·第十五卷》寫道：「晉劉柔妻王氏姜姬頌曰：英英姜姬，寔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歧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玄朗悟機，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與劉向《列女傳》之《棄母姜姬·頌》和《啓母塗山·頌》內容完全不同。

供了很大幫助。吳敏霞的〈《列女傳》的編撰與流傳〉²⁰是較早研究劉向《列女傳》的專篇文章，文章內容對《列女傳》的作者、名稱等許多議題都做足了考證。吳敏霞的專題文章可以說是《列女傳》研究很重要的基礎。隨著近代研究理論的多方發展，出現了更多研究《列女傳》的論文。葛志毅的〈《列女傳》與古代社會的婦女生活〉²¹廣泛擴充了《列女傳》研究的內容，雖然文章的些許論點的論述還不很充分，但還是有所開拓和深化。近代對《列女傳》的專題研究主要著重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學方面的研究

田中和夫的〈《列女傳》引《詩》考〉²²和李寅生的〈《列女傳》引《詩》得失當議〉²³這兩篇文章對於《列女傳》的引用詩經的部分展開非常詳細的論述，他們從《詩》的研究角度出發，著重在考證《列女傳》中引詩的內容與《詩》之本義的相符程度。李寅生在其中認為，《列女傳》引詩用意是「借詩以言志」。焦慶艷的〈《試論《列女傳》的語言藝術》²⁴則以研究《列女傳》為目的，論述引用《詩》的情況在文中起的效用。

邢培順的〈《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材料來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²⁵一文否定了《列女傳》為「虛構」一說，認為部分與史料不符合的內容，源於劉向在校書過程中積聚下來的異文傳說，非刻意為之。作者也否認了《列女傳》應屬於小說類的論點。可見研究者的論述多集中在《列女傳》的材料蒐集與加工和語言寫作技巧方面，較少從整體上把握和研究《列女傳》的女性形象。

（二）政治社會思想方面的研究

²⁰ 吳敏霞，〈《列女傳》的編纂和流傳〉《人文雜誌》，（1988年3月）

²¹ 葛志毅，〈《列女傳》與古代社會的婦女生活〉《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3月）

²² 田中和夫，李寅生譯，〈《列女傳》引《詩》考〉《河北師院學報》，（1997年4月）

²³ 李寅生，〈《列女傳》引《詩》得失當議〉《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3月）

²⁴ 焦慶艷，〈《試論《列女傳》的語言藝術》〉《西安石油學院學報》，2003年5月）

²⁵ 邢培順，〈《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材料來源及加工取舍方式探索》〉《濱州師專學報》，（2004年3月）

董曉瑞、李淑梅的〈從《列女傳》到《烈女傳》看婦女地位的變遷〉²⁶和薛麒麟的〈從《列女傳》到《烈女傳》——兼論漢唐婦女地位的變遷〉²⁷，這兩篇文章都帶有濃厚的批評色彩，指出「漢代婦女實際生活和儒家禮教的運行之間存在相當的差距」。薛麒麟則進一步的認為《列女傳》是漢朝時禮教束縛和婦女之反禮教束縛下的產物，漢朝的婦女們在新舊文化融合的空隙獲得了部分的自由。邢培順、王琳的〈試論劉向著述的思想傾向〉²⁸一文中提出新的觀點，認為《列女傳》中婦女最著重的品德是「仁而有禮」，雖然沒明確論述，但強調《列女傳》的創作把婦女問題視為一重大社會問題單獨提出來討論，認為劉向有意圖用儒家思想統一全社會的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將劉向編撰《列女傳》的目的和意義有較完整的交代的論文。宋仁桃的〈漢代婦女婚姻觀念的演變〉²⁹是對葛志毅所提出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道德」觀點之延續和發展。劉淑麗的〈漢代儒家正統婦女觀的演變〉³⁰針對這個問題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探究。總之，近代無論是考察「女教」理論、還是儒家禮教下的婚姻觀、婦女觀，都呈現了縱深發展的態勢，讓我們在研究當時女性的同時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背景。

（三）史學方面的研究

張慧禾的〈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³¹和熊明〈劉向《列女》《列士》《孝子》三傳考論〉³²張慧禾對其中個案的分析較仔細。熊明則對劉向「三傳」開創的「雜傳體」的「小說品格」進行了深入的論述。近代以來的史學專題研究表明今人已將《列女傳》的研究歸入正史研究之列。

整理古今劉向《列女傳》的研究狀況可以發現，古代研究者多側重於校注和

²⁶ 李淑梅，董曉瑞，〈從《列女傳》到《烈女傳》看婦女地位的變遷〉《邯鄲師專學報》，（1991年10月）

²⁷ 薛麒麟，〈從《列女傳》到《烈女傳》——兼論漢唐婦女地位的變遷〉《益陽師專學報》，（1991年10月）

²⁸ 王琳，邢培順，〈試論劉向著述的思想傾向〉《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3月）

²⁹ 宋仁桃，〈漢代婦女婚姻觀念的演變〉《蘇州大學學報》，（2003年4月）

³⁰ 劉淑麗，〈漢代儒家正統婦女觀的演變〉《社會科學輯刊》，（2003年6月）

³¹ 張慧禾，〈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浙江師大學報》，（1998年5月）

³² 熊明，〈劉向《列女》《列士》《孝子》三傳考論〉《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5月）

史實方面的研究；當代的研究者則著眼於專題研究，從文學角度和政治社會思想角度進行分析，論述多數集中在《列女傳》的政治思想方面。隨著研究理論的發展和深入，對劉向《列女傳》的研究從部分的批判轉為整體的考察，並在歷史與文學結合方面取得不錯的進展。整體而論，研究者們對《列女傳》的女性形象從整體上把握和研究者不多見，要研究《列女傳》女性形象，討論「列女形象」的精神內涵、文化價值或是社會意義，就必須對其性質、社會背景進行考察和分析。但無論是史學專題還是文學專題，對劉向《列女傳》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大多數不夠深入，對這些形象背後蘊涵的深層的文化意義還沒有進行系統的研究，有待本研究詳加探討。

三、古代對《後漢書》的研究狀況

從劉宋到清末，古代《後漢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章句訓詁、史實考證與補遺輯佚等方面，與劉向《列女傳》有相同之處。依時代先後，著重之處皆有不同，以下將其分列為幾點說明。

（一）隋唐之前，《後漢書》地位緩慢上升

范曄倉惶伏誅，他所撰寫的十志，本已經「搜次垂畢」，與他合作寫書的謝儼害怕被受牽連，便毀掉《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志稿，消失在不露面了³³，成為一大損失。但一時之間，范曄《後漢書》也成為禁區，乏人問津。直到梁代，劉昭採班彪《續後漢書》舊志，彌補范書之不足，注范書一百二十五卷。從此，《後漢書》得以用較為完備的面貌開始傳播。正因劉昭如此的功勞，六朝時期，對范曄《後漢書》音義方面的研究進入了黃金時期。據文獻可證的有：後魏劉芳《後漢書音》一卷、韋機《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臧兢《范漢音訓》三卷、蕭該《范漢音》三卷。這些音義訓詁的工作，使《後漢書》日益普及，得以廣泛傳播，終在唐代時躋身於「前三史」行列，取代了《東觀漢記》在東漢史書中的地位。

³³ 王族，《紙上城池：古書的故事》（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91。

（二）唐代為《後漢書》研究的第一個時期

此時期的重點是《後漢書》列為「前三史」地位確定和李賢《後漢書》注的產生。李賢注的流傳，是《後漢書》傳播史上的重大盛事。與此同時，還有劉知幾《史通》從史學探究的角度，對《後漢書》進行了很全面的討論和研究。雖然有些評價和論點，尚有需商榷之處，但至今對學者皆有不少啟發。如他稱「范曄理切而多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³⁴，又說：

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³⁵

他褒獎范曄《後漢書》的撰寫內容和文章剪裁的功夫之奇，亦非泛泛之輩能及。雖然對於《後漢書·方術列傳》和《後漢書》中的諸多蠻夷傳所收錄的人物稍有微詞，但大體上是肯定的。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後漢書》與《史記》、《漢書》一起被稱為「三史」，並列入考試的科目。

（三）北宋起，對《後漢書》否定的評價

北宋神宗對范曄的人品頗不欣賞，且曾經試圖命人改作《後漢書》³⁶，因此後來的不少士大夫因循了神宗的這種好惡。但，在否定當中也有不少肯定的。如葉適說：

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

³⁴ 劉知幾，浦起龍釋，《史通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88。

³⁵ 劉知幾，浦起龍釋，《史通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230。

³⁶ 後錄卷九條云：「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關漢紀，久之不得。」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三，頁 632。

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³⁷

可見，葉適仍能在反范的聲浪中，表達出自己對范曄較客觀的見解。綜觀整個宋代，對《後漢書》的評價毀譽參半，褒貶不一，但那些否定的評價，對後世《後漢書》的傳播卻造成極不佳的影響。

金、元兩朝的反應多承襲自宋朝，對《後漢書》的評價仍是如此。金代則以王若虛為代表，他在《滹南集》說：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概董宣於酷吏，概鄭眾、呂強於宦者，概蔡琰於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眾、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³⁸

又說：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為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³⁹

王若虛對范曄的評論，尚沒有脫離宋人否定的論調中，仍然帶有不小的偏見。

元代以劉因為代表，他在「敘學」一文當中說：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⁴⁰

³⁷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370。

³⁸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二十諸史辨惑》（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4），頁122。

³⁹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議論辨惑》（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4），頁187。

⁴⁰ 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一敘學》（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4），頁3-5。

這些理學家注重的是「文如其人」，對《後漢書》會作出如此的評價，勢在必然，時必如此。

(四) 明代以後

1. 《後漢書》的評價漸高

對《後漢書》看法有明顯改觀，與明代對史家的尊崇有很大關係。如張志淳說：

范曄《後漢書》蓋出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之。論者譏其贊辭佻巧，又創為《皇后紀》，復采王喬等詭事入列傳。朱子又非其不錄《胡笳十八拍》而載《悲憤》二詩，蓋曄極無行義之人也。其傳琰之初，意已自有在，而何能深探哀怨發中之旨哉？⁴¹

他不贊成評論者說《後漢書》「贊辭佻巧」的說法，也不同意朱熹稱范曄是「極無行義之人」的批評，認為范曄在傳寫蔡琰等列傳自有其「精深意旨」。從這些論點可以看出，張志淳已開始對宋人的研究展開反思。這種反思，亦是明代研究《後漢書》的一個顯著的特徵。

也因如此，明代《後漢書》的文學研究出現了空前的盛況。陶宗儀《說郛》中記載很多相關史料，如卷 22 記廖明略語「范曄之文，秀整溫繹⁴²」，對《後漢書》文采，作出不錯的評價，敘前人所未言。鐘惺的《史懷》，可以說是明代一部研究《後漢書》的力作，他的許多看法，至今仍為學者所看重。沈國元的《二十一史論贊》，整理收錄了學者對《後漢書》論贊的大量評價，其中不少是對其文學特色的評論，亦頗有可觀之處。

2. 《三國志》與《後漢書》優劣論

明代中後期以後，隨著羅貫中之《三國演義》家喻戶曉，《三國志》也因此風行，學界開始有了對《三國志》、《後漢書》優劣高下的爭論。

⁴¹ 張志淳，《南園漫錄·卷八》（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91）叢書集成續編第十八冊，頁 98。

⁴² 陶宗儀，《說郛》（臺北市：新興書局，1963），頁 719。

一說是認爲范書優於陳書。如范光宙《史評》中，谷應泰作序說：

史首龍門，次班范。即周漢史敘事不如吳魏，然子玄有言矣。張衡不閑於理，陳壽不習於文，五代以前多文勝，五代之後，多理勝。⁴³

又如陳深也說：

史莫盛於《國語》、《戰國策》，司馬遷其聖乎？文者乎？敘事則化工之肖物也。班固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矣。范曄宛繻詳至，亦屬亞旅。……其《三國》以旋，則《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膺古本也。《五代史》，學究史也。《宋、元史》，冗朝報也。⁴⁴

陳深認爲《國語》和《戰國策》才是史書中最佳的，司馬遷、班固和范曄都算在第二位，其他《三國志》以後的史書，皆無可謂。由此可知，此類學者仍然延續唐宋以來「三史」爲史學之圭臬的說法。

另一說認爲，陳書與范書互有優秀，但也各存瑕疵。如王世貞《藝苑卮言》：「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繻詳至，大不及也。」⁴⁵明人的這兩種意見，基本上成爲後人評論的框架。後世在比較陳、范二書時，多延續這些說法並再作進一步深化。

（五）清代，《後漢書》獲得推崇

清代的三大史學家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對《後漢書》的研究，也都非常有建樹。特別是王鳴盛，他對《後漢書》特別的喜愛和推崇，好像到了不能允許別人批評的程度。他說重修後漢史的翟公巽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重修」，又說：「王氏妄載之何為，無識甚矣⁴⁶」，不但嘲遣翟公巽，而且連作《困學紀聞》記載這件事的王應麟也難逃被他詈罵。他認爲：

⁴³ 范光宙，《史評》（清順治十五年（1658）刻本）

⁴⁴ 陳深，《凡例·諸史品》（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刻本）

⁴⁵ 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頁127。

⁴⁶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市：樂天出版社，1972），頁202。

蔚宗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為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并，可以想見蔚宗之為人。⁴⁷

獲得後世廣泛贊同。也正是因王鳴盛的發聲，為范曄平反的呼聲，就因此越來越大，如陳澧《東塾集·申范》、傅維森《缺齋遺稿》中的《讀〈宋書·范曄傳〉後》、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後漢書》等⁴⁸。尤其是李慈銘，更是別具用心，為後世留下了許多閱讀《後漢書》的日記所得。

另外，在清朝樸學風氣之下，《後漢書》的考據、校注、輯佚之學亦達到空前的高潮。有輯佚年表的，如熊方《集補後漢書年表》、高嶧《後漢書鈔》、諸以敦《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萬斯同《東漢諸帝統系表》、《東漢諸王世表》、《東漢外戚侯表》、《東漢宦者侯表》、《東漢雲台功臣侯表》、《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東漢九卿年表》、黃大華《東漢皇子王世系表》、《東漢中興功臣侯世系表》、《漢志郡國沿革考》、《東漢三公年表》、華湛恩《後漢三公年表》、練恕《後漢公卿表》、沈維賢《後匈奴表》、徐紹楨《後漢書朔閏考》、周明泰《後漢縣邑省并表》、錢大昭《後漢郡國令長考》、丁錫田《後漢郡國令長考補》⁴⁹等等。

其他，仍有輯佚藝文志的，如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并考》、錢大昭《補續

⁴⁷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市：樂天出版社，1972），頁191。

⁴⁸ 清人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謀反誅》中，力為辯白，說「蔚宗不反」。陳澧特作《東塾集·申范》一卷，替范氏申雪「千古之至冤」。陳澧、傅維森和李慈銘等所著之文章，以為范曄必不反，所執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幾點：一、范曄與文帝君臣之際相處甚歡，文帝愛其才，故深加委任，恩寵備加，以至於有過不罪，所以范曄不可能忽持戈相向，甘冒不韙，參與謀反。二、當日義康執政，范曄以飲食細過為所黜逐，其怨義康必甚，故不可能再效忠義康，身殉其事。三、謝綜與孔熙先秘議謀反，告於范曄，范輕其子兒，故不以上聞，非同為逆亂。其身陷大戮，以反判罪見殺，實群小嫉才傾陷所致。《宋書》依據當時鍛煉之辭書之，不足深信。四、范書貴德義、抑勢力、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多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故犯上作亂必不為也。他們的動機，如《申范》所說：「三代以下，學術風俗莫如後漢，賴有范書以傳之，……其書大有益於世，而著書之人，負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

⁴⁹ 鍾書林，《〈後漢書〉研究史概述》《唐都學刊》第25卷第2期，（2009），頁34。

漢書藝文志》等等。

另外，有校注、考證的，如林茂春《後漢書拾遺》、《後漢書校語》、杭世駿《後漢書蒙拾》、吳壽暘《後漢書注校》、姚之駟《後漢書補逸》、錢大昭《後漢書辨疑》、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沈欽韓《兩漢書疏證》、侯康《後漢書注補》、惠棟《後漢書補注》、王先謙《後漢書集解》等等。其中，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是迄今《後漢書》考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總體來說，古代《後漢書》研究走過了起起伏伏的階段，或許各個時期的狀況並不均衡，但也都體現出其鮮明的特色。可以說，在《後漢書》文獻的整理上，經過歷代的研究考證，到清代時已盡趨完備。不足的是，古代《後漢書》研究總體看來仍較零亂，多體悟式批評論斷，其系統化、統整性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四、現代對《後漢書》研究狀況

(一) 現代《後漢書》研究

近代研究，以陳述首先發聲。1919年，陳述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發表了《陳范異同》一書，這是迄今為止，用系統的方式比較研究《後漢書》、《三國志》異同的專書著作。30年代，還有劉咸忻《四史知意》之《後漢書知意》⁵⁰、李景星《四史評議》之《後漢書評議》相繼問世。40年代，朱東潤所撰之《後漢書考索》。另外，在此時期特別值得多加注意的，是戴蕃豫的兩部巨作《范曄與其後漢書》、《稿本〈後漢書〉疏記》。在戴蕃豫之後，竭力研究《後漢書》文學方面之書，有2003年程方勇的博士論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⁵¹，文中從戴蕃豫之後，從文學角度專門探討《後漢書》，並肯定《後漢書》的文學成就，肯定它超越其

⁵⁰ 《四史知意·後漢書知意序》云：「庚申年秋讀《後漢書》，有所評議，記為一冊。……體例悉如前二書，其稍異者，間有論事語，以東漢史勢人多不詳也。然亦取足與書法相發明，不濫入史斷語。馬、班體例之精，不容議矣，范則多失，故今之所說，兼有糾彈，然仍名之曰知意者，讀史終應恕作者之用心也。」大體上劉咸忻在《後漢書知意》中重在糾其意，使欲讀《後漢書》者更有益於了解。劉咸忻著，楊家駱主編，《四史知意並附編六種·後漢書知意》（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頁615。

⁵¹ 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3）

他諸家《後漢書》的文學價值與意義。

當代研究領域中，雖然全面研究《後漢書》的成果不多見，但是對於《後漢書》中一些專門議題的研究，成果挺豐碩的。如張舜徽先生曾經指出「范氏書出，其餘諸家都廢」⁵²的原因；郭預衡先生曾說：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等於一篇自序。但從這些話裡也可看出他對文章是有獨到的見解的。范曄的《後漢書》和班固的《漢書》相比，也確有其新的特色。以他所自負的『序論』而言，其中就有不少出色的文章。

53

他認為光是《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文章，就是很精彩出色的作品，也可從中看到范曄對於撰寫《後漢書》特殊見解。且《後漢書》也比《漢書》更有新的特色。他尚指出范曄的文章，反復論述，搖曳多姿，寫作落墨，確實不同於《漢書》，也不同於《史記》，且對於人物表現的愛恨分明，因此筆端常帶有情感。王錦貴則甚為稱道《後漢書》的體例創新和敘事藝術。他說：

至范曄撰《後漢書》，則根據東漢皇后、外戚地位的上升，索性增設《皇后紀》，刪去《外戚傳》，將有關外戚的事蹟集中反映於《皇后紀》中。很顯然，沒有務實的精神和革新的勇氣，要想有這樣一個切合當時國情的大膽舉措，將是不可想像的。……《後漢書》還特意增設了《黨錮列傳》、《宦者列傳》、《文苑列傳》、《獨行列傳》、《方術列傳》、《逸民列傳》和《列女傳》等七個類傳。這七個類傳都是范曄根據東漢社會的特點增設，並且都是以前的《史記》、《漢書》、《三國志》中所從來沒有過的。

另外，在敘事上，王錦貴談論了《後漢書》的三種敘事方法：主從法、互見法、單載法。他從文學藝術的角度，稱讚《後漢書》是紀傳體文獻中的佼佼者。⁵⁴

⁵²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83。

⁵³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558。

⁵⁴ 王錦貴，《中國傳記體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二）中國文學史對《後漢書》研究

中國文學史中，對《後漢書》的研究相較之下很少。40年代，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多次稱道《後漢書》的文學藝術。他說：「范曄論史，化偶為排，跌宕以盡勢」。他還將《漢書》、《後漢書》進行比較說：「班固瞻茂而能適肆，其力勁；而曄整瞻而未駿發，其氣窳。」又說：「范曄《後漢書》特整瞻，衍班固之遺。」⁵⁵另外，游國恩等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中對《後漢書》還設有專節的論述，他們對《後漢書》的看法是：

這部書從創作價值來說，遠不及《史記》、《漢書》，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績，並不在班固之下……論述政局世風的變化，思致也相當周詳。筆勢之擒縱開合，詞句之麗密精練，和《史》、《漢》相比，也有不同特色。⁵⁶

可以說，這樣的評價還是比較中肯的。可惜的是，之後的文學史，關注到的便很少了。80年代，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在「餘論」部分對《後漢書》有所提及，但到90年代，新版的《中國散文簡史》和郭預衡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對《後漢書》皆未提及。到了21世紀，在趙義山、李修生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中，更是連一席之地都沒有。所有綜觀這些，可見《後漢書》的地位每況愈下。清代以前，人們對《後漢書》只是多少有所貶毀，但現代的漠視和淡忘，是比貶毀更可怕的。

（三）年譜和選本等的研究

相較之下，此範圍的研究在近代則較有起色。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張述祖的《范蔚宗年譜》。這已被公認為考察范曄生平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獻。他是最早對范曄的生平作出了仔細完整的考察，至今仍為學者所推崇。選本的出現，起於1927莊適選注的《後漢書》。以後陸續有束世澂《後漢書選》、瞿蛻園《後漢書故事選》、黃華強《後漢書選注》、王興康《後漢書菁華》、章義和《〈後漢書〉

⁵⁵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88。

⁵⁶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第六章第二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290-291。

選評》等等。至於全譯本，以章惠康、易孟醇主編之《後漢書今注今譯》，篇幅最巨。專門的工具書也很多，如李裕民的《後漢書人名索引》、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編的《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張舜徽主編的《後漢書辭典》、王天良編的《後漢書地名索引》、廖盛春編著的《〈後漢書〉成語典故》、李波主編的《後漢書索引》。此外，語言研究類的專著，也開始出現，如楊小平的《〈後漢書〉語言研究》⁵⁷等等。所有這些書籍的出現，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強化了《後漢書》的傳播和普及。

總之，近代的《後漢書》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超越前人的不小貢獻，但對於《後漢書》的全面系統性的研究卻顯然不足，尤其是今人對《後漢書》的重視程度，比起古人不免頗有下降。所以，我們要更進一步瞭解《後漢書》，加強對《後漢書》的研究。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說：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耳。

58

力求能與《漢書》並尊，是范曄創作《後漢書》的理想。有這樣宏大的志向和遠闊的抱負，再加上自己的精心追求，終究獲得了與《漢書》並肩的殊遇。不少學者高度肯定《後漢書》的文學成就，將它與《漢書》相提並論。

清代著名文藝家劉熙載說：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⁵⁹

可見在劉熙載眼中，自《史記》之後，班、范兩家各自開創了兩大史學流派，有

⁵⁷ 鍾書林，〈《後漢書》研究史概述〉《唐都學刊》第25卷第2期，（2009），頁34。

⁵⁸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1830。

⁵⁹ 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如涇渭之水，平分秋色，難分高低。

現代史學家金毓黻曾說：

如以批評文學之態度，持論班范兩書，一則極博瞻淵雅之能事，一則有奇情壯采之可味，誠未知其孰為後先。而執筆之為記事文者，倘由范書入手，又能別具心裁，自出手眼。⁶⁰

可見金毓黻對范曄是有些偏愛的。此外，一生熱愛《後漢書》的戴蕃豫，更是對它推崇備至。他說：「蓋兼子長孟堅之博瞻，咀華嶠袁宏之菁英，有其長而無其短者，厥為范氏乎？故其流風餘韻，衣被辭人，非一代也。」⁶¹

回顧一千多年來研究《後漢書》的歷程，我們可看出以下大致輪廓：劉宋至北宋之前，是《後漢書》接受傳播的首次高峰；北宋至明代以前，《後漢書》的影響與接受有所下降；至明清時期，《後漢書》研究達到第二個高峰，為《後漢書》研究的黃金時期；至今，特別是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後漢書》進入近乎全面、系統的研究時期。可惜的是，當代以降，《後漢書》研究則不免停滯，甚至出現走下坡的趨勢，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局限在范曄是否謀反的議題上。在古代史散文研究的範疇，甚至已很少談及《後漢書》，這更讓我們意識到加強《後漢書》研究的迫切性。儘管古今不少學者充分肯定了《後漢書》與《漢書》並肩的成就，但對其成就的發揚光大，則還有待於我們進一步地探究。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論文所引《後漢書·列女傳》文本為國立編譯館出版《後漢書紀傳今註》，為范曄作、韓復智、洪進業註本；《列女傳》文本為三民書局出版的《新譯列女傳》，劉向著，黃清泉注譯、陳滿銘校閱為準，此書是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

⁶⁰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⁶¹ 戴蕃豫，《范曄與其〈後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

校以《古書叢刊》所收的建安余氏本、明嘉靖本、清王照圓《補注》本、梁端《校注》本。班昭、綦母邃、虞貞節三家注已佚，但仍有片段和字句散見於《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詩正義》、《史記正義》、《史記索隱》、《太平御覽》等，也皆有加以比勘。凡與底本字句有較大出入的，均有注明。

爲求能切中劉向和范曄二人創作《列女傳》的原意與歷史發展脈落下的價值意義，並且進一步將二人《列女傳》做一分析比較，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取下列五項方法爲主：

一、原典分析

本文研究方法擬從對劉范二人《列女傳》之基本文獻分析出發，文獻分析並不是翻譯劉范二人的《列女傳》作品，而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忠實呈現二人這本《列女傳》文獻的原貌。

二、歸納整理

除了原典的分析之外，進一步將原典論述之列女形象重新歸納與整理，對二人的思想特色做分析與探討，這是本論文偏重運用的方法之一。

三、參考文獻

前輩的研究成果亦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本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或參考或分析比較前人的研究成果，理其優劣得失，擷取其中菁華，是本文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再者本論文涉及的範疇廣泛，對照前賢研究的研究成果，對本文觀點的呈現，更是裨益良多。

四、歷史研究

對照劉范二人的時代環境與思想的發展態勢，本文擬析究在此歷史背景之下，如何建構其自身的女教思想及其取捨，成爲值得探討的課題。除了歷史發展的外緣因素，劉范二人的身家背景與成長遭遇，乃至於人格個性等重要內緣因素，也是探究與比較劉范二人《列女傳》寫作內容時，值得關注的部分。

五、比較分析

除了文獻的歸納整理，並對照歷史發展的脈絡，本論文希冀透過綜合分析與比較劉向二人《列女傳》中列女形象的分類與比較，或承襲前賢之論或有個人創見，更能突顯出二人《列女傳》的創見之處。

以上是筆者撰寫本論文時所運用的幾項方法，由於兩人分屬不同的時空背景，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因此差異性極大，然而在衝突之中仍存在著許多和諧的共通點，呈現出文學的開放性與普遍性。有鑒於此，筆者將就兩人《列女傳》的作品加以深入探討後，再從中擷取交會點，以相互比較的方式來探討、分類，在歧異處分述，在相同處合議，以期能完整剖析出劉范兩位在《列女傳》當中所呈現出的不同女性形象與面貌，進而探討兩《列女傳》對後世的影響，以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

第二章 劉向與范曄所處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本章將研究劉向身為西漢宗室後代與南朝官宦世家子弟范曄兩人之生平與時代，以分析兩人能寫出《列女傳》和《後漢書·列女傳》兩本影響後世之巨作的個人成因，並比較兩人生平經歷與思想理念之差異。

第一節 劉向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一、劉向之家族世系

劉向（前 77—前 6），¹字子政，原名更生，沛（今江蘇省徐州沛縣）人。出身於西漢宗室，曾祖父曾為漢高祖劉邦的同父異母少弟，就是楚元王劉交。劉交是魯詩的重要傳人，「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²」，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³」。劉向的祖父劉辟彊則以「好讀詩，能屬文」、「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⁴」著名，父親劉德更是一位「修黃老術，有智略」的人物，武帝謂之「千里駒」，為人「寬厚，好施生」。⁵

二、劉向之仕宦過程

劉向生於漢昭帝時，經歷了昭、宣、元、成四個朝代。由於父親劉德的保任，12 歲時擔當了輦郎（隨侍天子的御輦）。成年時，「以行修飭」⁶擢升為諫大夫，剛好宣帝招選名儒俊材，因此通達經傳、善屬文辭的劉向與王褒、張子僑等進見而對詔命，獻賦頌幾十篇，而就此嶄露頭角。因宣帝好神仙方術，劉向 22 歲時

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導讀》（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

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6），頁 1921。

³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2。

⁴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6。

⁵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8。

⁶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8。

把父親劉德治淮南獄時獲得的《枕中鴻寶苑秘書》（內有煉金之術）獻上朝廷，結果花費甚多，而方術卻鑄黃金不成，劉向被劾以鑄造假黃金的罪名，為死罪。其兄長願獻出一半封邑替劉向贖罪，宣帝也珍惜他的才華，寬大其刑得以免死。第二年，宣帝剛立「穀梁春秋」，劉向應詔傳授《穀梁》。27 歲時，劉向在石渠閣與儒家學者們一起講論「五經」，重新官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元帝時，劉向在輔政四人組中，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及外戚史、許集團的亂政失利，劉向再次被逮入獄，且被廢為庶人長達十餘年的時間。

成帝即位後，劉向再次被重新任用，改名為「向」，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後遷為光祿大夫。成帝幾次想立他為「九卿」，都遭帝舅王鳳與丞相御史阻撓，但終因劉向為三朝老臣，且還是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便詔其為校中秘書，劉向前後為官三十多年，官終中壘校尉，72 歲時去世。

三、劉向撰《列女傳》的動機

《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記載：

（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⁷

這裡所謂「趙衛之屬」指的就是當時擅權的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和衛婕妤等嬪妃。趙飛燕姐妹之所以能起「微賤」是在鴻嘉三年（前 18 年）後，成帝一直打算立趙飛燕為皇后，但太后認為她出身卑微，所以不同意立后一事，史書上記載：「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⁸」。於是她在爭寵時誣告許皇后和班婕妤，成帝廢了許皇后，班婕妤也因趙氏姐妹得寵而被迫自求去長信宮供養太后，因此趙飛燕於永始元年（前 16 年）六月丙寅被立為皇后，成為漢朝舉足

⁷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57。

⁸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佞幸傳》，頁 3730。

輕重，炙手可熱的女人。原本成帝得到飛燕姊妹時就「從此君王不早朝」，且之後飛燕姊妹恃寵而驕的大封特封其家族。飛燕被立為皇后以後，「起微賤，踰禮制」的事實更加嚴重。劉向日睹了帝王的淫奢荒亂，發自內心對劉姓皇室的忠誠和對政治現實的不滿，強烈擔心國家的存亡與安危，在飛燕立后年即永始元年編撰了《列女傳》「以戒天子」。

由此可知，劉向成書的時間有它的政治成因，劉向身為漢室皇家之後，衷心政治、關心政治，且坎坷又漫長的政治生涯使劉向更傾心專注於國事的發展，他希望通過一己之力能永保劉氏天下，學識淵博的劉向後來擔任校中秘書，整理石渠閣藏書時，雖然早被排擠出朝廷的政治權力中心，但他依舊關心著國家的情勢與前途，多次上封事疏、著書等方法，言朝政得失，告誡成帝外戚專權的後果劉氏必危。由《漢書·楚元王傳》的劉向傳中可見他上的奏書內容，言辭痛切，發於至誠。他受召見，力勸苦諫，語重心長。在他整理皇族藏書時，《漢書·楚元王傳》中云：

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⁹

成帝時常有日蝕、地震等天災異相，劉向認為這是上天不滿外戚王氏擅政而降變示警，所以編集自上古至漢代的各種符瑞災異之事，一一與世間政治狀況對應，用天人感應的觀點推廣《書·洪範》五行之說，以徵人事得失，企圖以此引起成帝對王氏專權的警惕。

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50。

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¹⁰

劉向於永始元年眼看著「起微賤，踰禮制」的趙飛燕被立為皇后，希望能實行王教，「以戒天子」，因而編撰了《列女傳》。

四、《列女傳》成書的背景

劉向一生中很長的時間從事於編撰工作，他從漢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年）起，受詔「校中秘書」負責校經傳、諸子、詩賦等，主要為編目和撰寫內容提要，至逝世前後長達 20 年之久。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劉中壘集題辭》中認為：「子政苦口，終生不倦。年餘七十，惓惓漢宗。感災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¹¹劉向成書時間約於成帝永始元年間，此時的劉向早就是一位「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嶮出諸儒的文史大家」，校書至今已有十年之久，且身上背著坎坷的經歷和深厚的學術修養，全然有能力「取《詩》、《書》所載」，將自古以來婦女的歷史事蹟自如地編撰成書。

考察劉向所處的時代、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與主要的思想文化，可以找出當時引發劉向創作《列女傳》的四個可能因素。

（一）劉向崎嶇的政治遭遇

漢元帝、成帝在位時期，內政上由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忠賢才士不能盡其用，政治局面十分混亂，漢氏政權處於四面楚歌、腹背受敵之危急存亡中。劉向年輕有為，忠心漢室。一心想挽救劉氏政權，他和其他輔政大臣共同與禍國專權的外戚、宦官進行了數次交鋒。《漢書·楚元王傳》云：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¹⁰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58。

¹¹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第 6 卷》（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頁 230。

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潛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¹²

因為這次政治策略的失敗，給劉向帶來了第二次牢獄之災。但是，他仍舊不屈不撓，沒因此被打倒。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¹³

劉向託付其親戚上書，指陳宦官專權為禍，懇求皇上罷免弘恭、石顯等，進用賢能忠士。但他卻因此再次入獄，遭免官，長期被貶為庶人。

直到成帝繼任皇位，劉向再次獲得任用。當時仍有外戚王氏秉政，劉向又與之進行對抗。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¹⁴

成帝雖知劉向赤膽忠心，無奈外戚勢力過大，而無法用其所獻之計。劉向當然被

¹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9。

¹³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30。

¹⁴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49-1950。

王氏排擠出朝政中樞，難以在仕途上有所作為與發展。

劉向為校中秘書期間，使他有機會博覽群書，為編撰《列女傳》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來源。劉向的一生著述數量頗豐，亦是得益於此¹⁵。而歷次崎嶇的政治爭鬥與仕途的不順利，使劉向體會到僅憑自己一腔赤誠去撥亂反正、匡濟時艱的艱難。他便將他的忠心與後半生的精力付諸於學術的治理，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主張和學問論著做緊密的結合，引古諷今，把其著述當作「諫書」，間接參與朝政，實現他批評時弊、諷喻政治的目的。當他在搜整、編次歷朝古籍的過程中，他懷著對於劉漢王室滿腔忠心，強烈的政治使命和社會責任，精心搜集整理材料，以借古諫今、勸戒統治者為總體精神思想，對原有材料進行改造、加工、潤色，甚至創新，編撰而成《列女傳》一書，用以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反對女子干預政治，以與外戚集團進行間接的奮戰。

（二）漢成帝的奢侈荒淫

劉向仕宦過程經歷西漢宣、元、成帝三代君主。漢元帝在位時期，宦官、外戚交替掌權，政治局面黑暗，危難重重。至成帝時，更是腐化奢侈，身陷酒色，荒淫墮落，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位昏庸無道的國君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成帝是個罕見的貪色之徒。據《資治通鑑·漢紀》中記載，「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¹⁶。即位之初，他寵愛的是許皇后和班婕妤，「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¹⁷，之後，「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¹⁸。

成帝還有時常微服出行，尋訪美色的嗜好。他「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¹⁹。他迷戀趙飛燕，將其封為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

¹⁵ 馮利華，〈劉向《列女傳》試論〉（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論文，2007），頁9。

¹⁶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海：中華書局，1976），頁958。

¹⁷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996。

¹⁸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996。

¹⁹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996。

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²⁰，導致許后被廢。成帝冊立趙飛燕為皇后，封其女弟為昭儀，「有白后奸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²¹。

「勸戒天子（成帝）」，諷喻統治者，戒除貪戀女色是劉向編撰《列女傳》的最根本目的。「趙、衛之屬」，按顏師古注，即指成帝寵愛的趙飛燕姐妹、衛婕妤。他標舉《詩》、《書》和《論語》之義理，將歷代品行節操高潔之婦女的事蹟，編成「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傳，認為其「興國顯家可法則」，為後世婦女之楷模；又將「孽嬖亂亡者」的故事編為「孽嬖傳」，認為此類女性的敗類禍國殃民，望能引起統治者的警醒。

（三）儒家倫理觀念的傳播

儒家歷來主張「仁」與「禮」，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²²，注重「禮」對社會的道德規範作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男女夫婦之間的倫理道德，是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的根基。故《詩》以《關雎》始；《易》以《咸》、《恆》對《乾》、《坤》。孟子則認為「君臣有義，夫婦有別」²³，荀子亦提出「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²⁴。儒家思想的「貞節觀」也出現在先秦諸典之中，如《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²⁵。在《周易》〔恆卦〕中就有清楚的說明²⁶。〔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²⁷而〈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與制義，從婦凶也。」²⁸闡述了婦人操守貞節則利，符合從一而終道理。若以婦德來約束男子，則意遭凶險。在《易經》

²⁰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996。

²¹ 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1002。

²² 楊伯峻，《論語譯注》（上海：中華書局，2004），頁 128。

²³ 楊伯峻，《孟子譯注》（臺北市：華正書局，1986），頁 125。

²⁴ 梁啟雄，《荀子簡釋》（上海：中華書局，1983），頁 370-371。

²⁵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814-815。

²⁶ 柯香君，〈論《周易》思想對中國悲劇之影響〉《人文社會學報》（2007），頁 14。

²⁷ 劉瀚平，《話解易經·下經》（臺北市：五南，1996），頁 15-17。

²⁸ 徐子宏注譯，《周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頁 264。

經文中便已清楚地規範了身為人婦應有的操守。《儀禮》言：「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²⁹這些倫理學說皆成爲了傳統社會統治者壓迫婦女的思想基礎。

漢初，在酈食其、陸賈和叔孫通的努力下，儒家學說開始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得到迅速發展。³⁰儒學不僅在民間廣泛傳播，而且還引起了一些朝廷重臣和諸侯王的興趣，「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³¹。當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的主導地位，更加速了它的傳播和地位。經過碩儒董仲舒的用心整合，新儒學宣導著等級秩序，倡導「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的觀念，將「三從四德」化爲婦女應有的行爲規範。

劉向的思想雖儒道兼有，但仍以儒家爲主，贊同儒家的倫理思想。《列女傳》中得到劉向歌頌的女性都把「禮」、「義」作爲自己的價值取向³²。既然「禮」是倫理道德規範，那麼對女性社會行爲的要求和評價，當然也離不開「禮」。《列女傳》中那些作爲正面形象的女性，她們的言行都以「禮」爲標準。另外，《列女傳》中的女性，她們有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爲，多是出於對「義」的遵守。如不嫁二夫就是爲了不違背「義」，即從一而終才符合「義」。正因爲以「禮」、「義」爲價值取向，《列女傳》中那些具有正面形象的女性在履行自己的各種責任和義務時，在道德的兩難困境中作艱難的選擇時，她們才能表現出俯仰無愧的坦蕩心胸和義無反顧的凜然氣概。董仲舒雖然提倡「三綱」，但對「夫爲妻綱」並沒有特別強調。劉向卻大力提倡婦女節操，他主張「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³³。劉向之所以編撰《列女傳》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宣揚儒家的女性道德規範，強調男尊女卑的觀念。因此，儒家道德倫理觀念的廣泛流傳，是《列女傳》產生的

²⁹ 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490。

³⁰ 馮利華，〈劉向《列女傳》試論〉（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論文，2007），頁 8。

³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2。

³² 吳全蘭，〈論劉向《列女傳》中的女性倫理思想〉《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頁 67。

³³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蔡人之妻》（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92。

思想根基。

(四) 利用文學之諷喻功能

劉向所生活的時代而言，文學思想尚未能脫離社會思潮而取得其相應獨立的地位。文人還未能深刻體會「文以載道」的內涵，更無人能將文學達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³⁴的程度與地位。但是，他們似乎已意識到文學的社會教育功用和政治諷喻作用，其認識的來源之一便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

「詩」是文學的較早形式。《尚書》提出的「詩言志」³⁵，提及到詩的認識和教育力量，體察到詩對人在感情上的影響以及道德上的規範。《論語·陽貨》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³⁶這是先秦儒家對詩的社會作用較早的界定與表述。《毛詩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³⁷，又言「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³⁸，這皆是漢代儒生對詩的政治社會功能的闡述。班固師承劉向，其文學思想與劉向有一定的延續。其《漢書·藝文志》曰：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寤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³⁹

以上可見，班固認為古代賢能志士因失志而作詩、辭和賦，肯定了文學作品的諷喻作用。

³⁴ 蕭統，《文選》（上海：中華書局，1977），頁 720。

³⁵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79。

³⁶ 楊伯峻，《論語譯注》（上海：中華書局，2004），頁 185。

³⁷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0。

³⁸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

³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藝文志》，頁 1756。

作為當代碩儒，本身又歷經仕途的曲折波瀾，劉向自然能體認到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教育功用與對政治的諷喻功能：

即在潛移默化的藝術感染中完成其政治教化作用。文學將道德準則與行為規範融於創作當中，以感悟的形式啟發人們的認識，從而自然地使人們生成辨別是非、區別善惡的能力與標準。⁴⁰

他深知「以古為鑒」、「引古諷今」的道理，希望上位者可以從古人的事蹟中，吸取經驗及教訓，成為當時的統治者的借鑒。根據《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在諫言中云：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⁴¹

劉向認為如果外戚專權的狀況沒有善加處理，就會如同戰國時，田和放逐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為國君，被周安王冊命為齊侯。後來，齊康公死，姜姓齊國絕祀的故事一般重演。在編撰《列女傳》之初，劉向心理秉持著一個明確的目的，「言得失，陳法戒。」⁴²，即希望能發揮文學的「勸世」功能，將自己的政治主張、道德思想規範等融入對史料、傳說的加工、綴合與潤色之中，藉以規勸統治者。班固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⁴³稱道劉向對於當

⁴⁰ 李莉，〈劉向文學思想淺探〉《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⁴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1962。

⁴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1958。

⁴³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1972。

朝之世的諷諫是很有見地的。

第二節 范曄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一、范曄之生平

范曄生於東晉安帝隆安二年（西元 398 年），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 445 年）。⁴⁴《宋書·范曄傳》在指出范曄家族、籍貫時，還簡略的敘述了他出生時的情況。他是在廁所裡出生的，當時額頭撞到磚頭，家人就以「磚」作為他的小字。根據范曄傳，「（范曄）兄（范）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⁴⁵」，後來范曄就刑時，「曄所生母泣曰：……」，可見范曄有嫡母，也有生母，也就是說，他的生母是范泰的側室，他是范泰的庶子。近代有學者認為范曄庶出的身份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註定他會受到屈辱，以導致他異端思想的產生，也間接影響到了他後來的人生⁴⁶。這種說法是不太準確的。

《魏書·劉裕傳》中錄有軍府錄事參軍周朗啓駿向宋孝武帝反映宋世風俗的一段話：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⁴⁷

周參軍講這一段話時，雖然是在元嘉之後的宋孝武帝時代，但由此可知范曄的時代，雖然士人們極為看重門閥，但同姓之間、家族之間人情淡薄的風俗應該與此相異不大，而且在劉宋以後，這樣的程度還更加重一些。《宋書·范曄傳》云：「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

⁴⁴ 章義和，《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8）

⁴⁵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820。

⁴⁶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范曄》（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31-132。

⁴⁷ 魏收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劉裕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2142。

冬無被，叔父單布衣⁴⁸」。沈約或許對此事的敘述有些許誇大的成分，但也並非全無根據，顯示范曄可能對家人、親屬缺乏體恤之情。總結可見，在范曄當時，出生的嫡庶對個人的命運並無一定的決定作用，士族之間亦是如此。范曄後來出仕即擔任劉裕之相國掾，文帝時更深受所用，這說明了他庶出的身份對他影響不大，同時也說明他並無因庶生的身份而被另眼相看或侮辱。

二、范曄之家族世系

南陽范氏起於地方下層官吏，興起的時間稍晚，受西晉時上層社會所流行的浮華風氣的影響也較不大，保持傳統的儒家學風亦較多，他們關心時政，關心下層民生，且尊崇儒學，弘揚儒學。東晉以後，范氏家族也隨著過江，因參與朝政始創，其政治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學術思想上也隨著接納玄學、佛教，但仍以儒家作風為主流思想，范汪、范寧等皆不願與當權者苟合，因此東晉後期，范氏為政不顯，也在此同時，范氏將他們多年以來研究儒家經學的累積成果化，於是范寧率領其子侄們編寫《春秋穀梁傳集解》。

由晉入宋，范泰讓范氏在政治上有了第二次崛起，但實際的政治管理能力也開始退化，政治態度更是趨於溫和保守，個人性格則更加任達，又十分信佛，他的順世傾向更濃⁴⁹。范曄其實完全是另一個全然不同的個體，性格上受時代影響，任性多欲，才高氣傲；學術思想上承襲范氏家學內涵，卻反佛、反鬼，逆於時風；政治上受其父蔭護，雖無經國之大略與實力，官位卻較顯達，終以判斷不明，貿然躁進而喪命。總之，范氏家族是一個重經學的文化家族，傳統儒家的精髓意識、人格修養、處世哲理都得以學習、傳戒；同時也是一個頗受時代影響的家族，東晉南朝的政治變化、宗教信仰、學術思想都在范曄的人生發展中留下較深的印記。

三、范曄的仕宦經過

⁴⁸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1829。

⁴⁹ 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系，2003），頁22。

雖然籍貫屬於南陽，范曄實際上是在建康出生、長大的，他的家庭早已隨族南遷到南朝的都城建康⁵⁰。史籍中關於范曄少年成長過程的介紹十分簡略，現在的研究者要想精確的勾勒出他少年生活的歷程，是很困難的。我們只能以研究的角度，順著范曄一生的經歷，從他的時代、家族、同事，以及他的才華、學問、個性，去反觀他的青少年時期，他的成長期。南朝時代具有相當重文藝、重才華的社會風氣，范曄家族又有尊崇儒學的傳統，祖父范寧為當時大儒，父親范泰亦好為文章。少年范曄即「好學」，不僅「博覽經史，善為文章」，而且還「能隸書，曉音律⁵¹」。也正因為他的博學與他的才華，范曄年輕時就已經引起了不少人們的關注，受到了當時社會的重視。

范曄一生歷經晉、宋兩朝，他二十二歲以前的成長過程是在東晉期間度過的，自二十三歲（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開始，范曄也展開了他在劉宋一代的仕宦經歷。范曄入仕應該是比較順利的，二十一歲進仕，一踏進仕途就成為當時重要人物宋武帝劉裕的幕僚，為炙手可熱的「相國掾」，迅速踏入了當時的政治中樞。范曄能夠有如此順利的入仕，主要得利於他父親范泰。因范泰已深得劉裕及宋文帝的信任與倚重。父榮子寵，范曄承襲父親劉宋功臣的功勳事跡，顯然很輕鬆自然的登上了南朝新政權的政治舞臺。當然，劉裕欣賞范曄，除了他的家族原因，當然還有范曄本人多才多藝，能善屬文的理由。在知悉范曄參與謀反後，文帝對他說：「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⁵²」。可見劉宋王室非常青睞范曄的文才。父親的功業與本人的才學，是范曄一生仕宦的兩個基本基礎。

范曄的仕宦經歷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仕（義熙十四年—元嘉六年）、宣城之貶（元嘉九年冬—元嘉十六年）、再升至終死（元嘉十六年—元嘉二十二年），他初仕之起點很高，以後則漸次黜降，元嘉九年，被貶為宣城太守，這一事件顯示了他狂躁不定的性格，同時也推動他完成了《後漢書》的編撰。

⁵⁰ 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系，2003），頁23。

⁵¹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1819。

⁵²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1825。

范曄的入仕相當順利，他第一任官職「相國掾」的任期並不長，兩年之後，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他進入彭城王劉義康幕府，任彭城王「冠軍參軍」，並在同年跟隨劉義康進號右將軍而轉「右軍參軍」⁵³。劉義康在劉裕七個兒子中排行第四，劉裕死後，繼位的少帝被弒，廬陵王又被殺，除了即位的文帝，劉裕諸子中就數劉義康最長，因此，他頗得文帝的重用。加上劉義康本人「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⁵⁴」，又加上司徒王弘之表薦，所以，他很快就能由地方入居京師，經略軍政，輔佐文帝。元嘉初年的劉義康可稱是劉宋炙手可熱的權臣。從相國掾到王府參軍，由帝府到王府，范曄的職階雖有所降抑，但他所跟隨的是劉義康，所以其降抑的幅度並不算大，總體看來，不能算是仕途的失敗。

另外，《宋書·范曄傳》記載，在擔任劉義康右軍參軍後，范曄接著又「入補尚書外兵郎」，因此，范曄再度進入劉義康幕府，擔任「荊州別駕從事史」。不久，范曄又任秘書丞，元嘉五年因父憂去職，元嘉七年，任征南將軍檀道濟之司馬，領新蔡太守。時檀道濟北伐，「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為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⁵⁵，此為范曄初仕的大概情況。從入仕到元嘉九年，范曄歷經相國掾、王府參軍、將軍司馬、地方太守，最後是尚書吏部郎，又回到京師。相國是武帝劉裕；親王為當時權貴劉義康；將軍更是當時名將，號為「長城」的檀道濟，范曄跟隨的，都是當時顯赫一時的人物，在一般士人眼中，這樣的仕宦經歷是非常令人欣羨的。

但范曄不同，他恃才傲物，《宋書·范曄傳》中記載文帝曾評范曄：「亦知卿意難厭滿」；當其和孔熙先、謝綜等謀劃成事時，綜、熙先笑他說：

詹事嘗共疇昔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

⁵³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1819。

⁵⁴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彭城王義康》，頁1789。

⁵⁵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1819。

顏可以生存。⁵⁶

以上諸點顯示范曄內心志向非常高遠，要求突顯自己的意圖非常強烈。此後，他身入近侍，同樣看不起身邊的朝中大臣，還撰《和香方》一一將他們加以譏諷，而自比為「沈實易和⁵⁷」，具盡中庸之美。儘管他沒有李固那麼高尚的德行與情操，但當朝的權臣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能與胡廣等在李固心中的位置所差不多。從帝府、王府、將軍府以至於地方任職，官職似乎略呈下降趨勢，在他的心中自然難以得到滿足。深厚的家學與時風造就了范曄滿身的才學；士族的背景卻使他遠離仕宦的艱辛，將他塑造成貴游公子，既無法瞭解耕稼的艱苦，對人生社會的艱辛與險惡更缺乏充分的認識，因此，儘管他在劉宋獲得了蠻高的政治起步，儘管他的初仕歷程平順，但他本人並沒有體認得到。在他心中，這一切離他想要的還很遠。

元嘉九年冬，彭城王劉義康生母去世將下葬，范曄的弟弟范廣淵當值，范曄與弟等人「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⁵⁸」。使劉義康大怒，貶范曄為宣城太守。而范曄一生的仕宦歷程陷入了最低潮期。初仕未能完全讓范曄如願，此次貶謫更讓范曄有「不得志」的感觸，於是他轉移自己的心力，著手編撰了《後漢書》。元嘉九年的事充分暴露了范曄輕佻、不羈的個性。范曄本人也承認自己的「狂釁」⁵⁹，而謀反被誅則是其狂妄自恃的最後、最大之敗局。

元嘉十二至元嘉十四年間，范曄被遷為長沙王義欣的鎮軍長史、寧朔將軍，其職務又開始提升，這也表示他走出了仕宦最低谷。元嘉十六年范曄為始興王劉浚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十七年，跟隨劉浚調任揚州。元嘉十九年，又升調左衛將軍、太子詹事，這是范曄一生中最後的職務，他死在此任上。元嘉二十二年，他因附和劉義康謀反被誅，結束他輕躁的一生。

四、《後漢書》的成書背景

⁵⁶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 1828。

⁵⁷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 1829。

⁵⁸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 1820。

⁵⁹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 1829。

（一）重文藝、重才華的時風

晉宋之際，重才華、重文藝的態度日趨成風。文學方面，因劉宋王室出身寒庶，皇室子孫多粗鄙無學，所以武帝、文帝比較重文，《文心雕龍·時序篇》有言：「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宋文帝於元嘉十五年立儒學，十六年，《南史·文帝本紀》中記載：

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⁶⁰

文帝立玄、史、文三館，選師任教，這是中國歷史上文學首次被列為官學。對於善於文學的士人，文帝亦頗為賞識，例如謝靈運、范曄等。

宗室臨川王劉義慶「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⁶¹，他編寫著名的文學作品《世說新語》，文帝給他下詔時，也總是特別斟酌。王室中這種重視文學的態度，客觀上有促進了當時文學創作繁榮的作用。當時著名的作家有陶淵明、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等，鍾嶸《詩品》評謝靈運為上品，餘三人為中品⁶²，實際上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最大，但其餘三人對南朝的文學創作影響更大。《詩品》記載齊王融曾言范曄、謝莊頗識音律⁶³，范曄也自稱「性別宮商，識清濁」⁶⁴。這種重文藝、才華的文學風氣，也深深的影響當時的范曄。

（二）史傳文學的盛行

南朝騁才學，重文藝的作風反映在史書的著作上。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之史學界》中指出：「兩晉、六朝，百學蕪穢而治史者獨盛，在

⁶⁰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文帝本紀》（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37。

⁶¹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臨川烈武王道規 子義慶傳》，頁 1477。

⁶² 鍾嶸，《詩品》（臺北市：台灣書房，1996），頁 42。

⁶³ 鍾嶸，《詩品》（臺北市：台灣書房，1996），頁 166。

⁶⁴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337-339。

晉尤著。」⁶⁵魏晉南北朝著史之風非常盛行，史學著作的數量異常驚人。《隋書·經籍志》曰：「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⁶⁶」。這些史書大部分是魏晉南北朝時所作，兩漢及兩漢以前的史書只占極小的比例。這個數字與經部書籍「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的數字相比，部數略少，但卷數卻是經部書籍的兩倍更多。⁶⁷其中與史傳有關的正史、古史、雜史、起居注、舊事篇等加起來總數約有 486 部，這還不包括後來亡佚之書，各書全加起來的總卷數就更令人驚訝讚嘆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幾乎代代有史，國國有書有錄」⁶⁸，士人學者們不僅為同時代作史，也為前代作史，如後漢書、紀就有十家，六朝史風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史學能如此興盛的原因很多，主要因素為：

1. 造紙術與字體的進化：漢代以後造紙術的進步，書寫字體多樣化，漢字書寫較以前更簡潔，更迅速，著書出書也較以前更為容易，所以，書籍的數量空前上升。⁶⁹
2. 朝廷重視著史立史：從東漢至南朝的劉宋，政治情勢非常混亂，國家難以統一，民族關係變換複雜，各個政權有些為了吸收前代的經驗與教訓，有些則為了批評其他政權為非正統，因而紛紛著史、編史。據《史通·古今正史》，魏文帝、孫權都曾專令修本朝史⁷⁰。又根據同書中《史官建置》，自漢朝而後，政局雖然動盪不安，但各朝均有專門記史之官吏，負責採集史料素材，「資以草傳」。

朝廷重視寫著史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南朝諸皇室多出自普通門第，著史

⁶⁵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頁 16。

⁶⁶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經籍志》（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992。

⁶⁷ 高敏，〈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盛及其特徵和原因〉《史學史研究》（1993 年第三期）。

⁶⁸ 同上注

⁶⁹ 朱仲玉，〈魏晉南北朝時期史籍散論〉《史學史資料》第 4 期，（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編印，1979）

⁷⁰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346-347。

立史，能夠記錄下來他們的功績，並將他們的言行傳之後代，有助其名照汗青，流芳百世。劉宋出自卑微，又處於重視門閥的時代，所以對著史修史更加看重。宋文帝於元嘉十六年立史學館，由何承天負責教授，又因《三國志》記事太過簡略，特命裴松之爲之作注。從士人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政治變化迅速，參政士人多無得善終，名士中亦罕有全者，不如專心作學，無論文史，避入另境，至少可以捍衛自己獨立的人格，保住性命的安全。東晉南朝，士族與庶族之間的分野差異越來越大，種姓幾乎成爲一種信仰，史書正可載錄高門望族的語言、交際和行事作風，專門的家傳在此期大量產生，正史中家譜的味道也日趨濃烈。

（三）學術變遷及社會風氣的影響

金毓黻先生在分析魏晉私家史學發達時曾道：

兩漢經師，最重家法，至後漢鄭玄，而結集古今學之大成。魏晉以後，轉尚玄言，經術日微，學士大夫有志撰述者，無可發抒其蘊蓄，乃寄情乙部，一意造史，此原於經學之衰者一也。⁷¹

他認爲經學的衰微乃是史學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魏晉士人抒發胸中之蘊蓄並不一定要靠著史，可用的途徑很多，如文學、清談、書法、繪畫或彈琴等等。事實上，兩漢經學家法相傳的傳統日漸消失，社會思想逐漸開展，個性漸張，特立獨行的現象與日遽增，個人無須專循一家一例之言行，重個人、重本體、重今生、重知識的風氣日盛，寫作史書正其一枝，愛史者自然肯一展長才。六朝雖皆立史官，但朝代興替快速，王權衰微，王室對史學的壟斷也不比漢代強烈，這也給士人們著史修史提供了一個較寬鬆的政治背景。

（四）時代與個人的因素

⁷¹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頁 105。

曹丕以爲，人生百年，要傳名後世，他在《與王朗書》中也曾說：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⁷²

春秋時早有立言不朽之說。漢代如司馬遷、揚雄等都對此懷有強烈的欲望。但他們所重視的是學術著作，曹丕卻是在重視學術著作以及服務於政治的實用文章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詩賦。從《典論·論文》和《與王朗書》均可看出，他所謂「不朽之盛事」是包括那些一般的抒情詠物的詩賦在內的。

儒家之三大德，立言居其中之一，如果能夠立言傳於世，自可千秋百世不朽。爲文、著史，都是立言，史書的傳承似乎更久遠、更綿長，那些「疾沒世而無名」的士人很多會選擇著史以立名。宋文帝就曾稱讚過裴松之，誇獎他所撰的《三國志注》「此為不朽矣⁷³」。著史的興盛也反映了魏晉之後，士人創作之風日益消退的趨勢，當時的士人，專務清談，如王夷甫之流，鮮少能有所創作。自魏至陳，開創之風，代代減退，溫軟之習，代代積累，一直至梁代時，江東世族子弟，竟然視馬爲虎，弱不禁風，生活之面狹隘不堪，人生閱歷平順簡單，逐日生活，僅書籍典章，忘卻征戰，不知刀槍，不識公務，不達世事，故所作詩文，亦僅於風花雪月，兒女情長，毫無剛健之氣，學術上缺乏新創。而當時的史學著作，與文學創作相比，對於獨創性的要求較低一些，史書創作者的功力主要在於對各種典籍、材料的掌握、編輯和整理上，作者自己額外創作的成分不多，這或許也促使史家進行史學著述的作用。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范曄積聚了諸家後漢史書的精華，編成了《後漢書》。

⁷² 陳壽撰，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魏書·文帝曹丕紀》（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88。

⁷³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裴松之傳》，頁 1701。

第三節 劉向與范曄的比較

以上探討過兩人之時代與社會背景，可比較發現有很多相同及相異之處，兩人雖生活的時代不同，但所經歷的人生發展及思想觀點有不少相同和相異之處，以下分列幾點加以說明：

一、出身不同

(一)劉向為漢宗室之後

劉向生於漢宗室，是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根據《漢書·楚元王傳》中所載，劉交少時曾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⁷⁴。高帝六年，劉交受封為楚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文帝時，申公以精於治《詩》，被立為博士，並開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愛好《詩》，其《詩》傳號為《元王詩》。當時，漢室公卿皆以武力著稱，而唯獨劉交崇尚儒學，為漢王室中文化修養最高的人，因此倍受尊重。在劉交死後數年，其孫劉戊與吳王劉濞共同起事謀反之後，景帝並未誅連其族，且立宗正平陸侯劉禮為楚文王。文王之弟休侯劉富，即劉向之曾祖，也因數諫劉戊勿反，而被景帝更封為紅侯，並獲准留住京師，其子辟強等人亦供事於朝。

辟強就是劉向之祖，他「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淨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⁷⁵。到大將軍霍光秉政時期，辟強因蒙受先帝恩寵，拜為光祿大夫，守長樂尉。當時辟強已八十歲，後徙宗正，數月後就死了。

劉向之父劉德，字路叔。霍光召用辟強時，劉德當時「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⁷⁶，「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⁷⁷。昭帝時，劉德官居宗正丞，常持《老子》知足不辱之計。當他妻子死後，霍

⁷⁴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1。

⁷⁵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6。

⁷⁶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6。

⁷⁷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7。

光想以其女許配給劉德，但劉德不敢，以盛滿之故拒絕這件婚事。不料因此以誹謗之罪被彈劾，免為庶人。後又以霍光之意守青州刺史，當年末復為宗正。宣帝時，劉德被賜爵官內侯，後又封為陽城侯，「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⁷⁸。德之二子，長為安民，次為劉向，所以，劉向在如此儒學修養與政治淵源深厚的漢宗室家族中，可了解其為「諫天子」而寫下《列女傳》的家庭背景與影響。

《列女傳》成書當時，正值西漢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期，政治腐敗，朝紀不振，外戚宦官專權亂國，劉向身為漢室宗親，眼看劉氏江山將要毀於后妃、外戚之手，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他說：

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紮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⁷⁹

於是，他懷著中興漢世之義，屢次上書，針貶時弊，雖多次引來宦官、外戚的打壓，而終究不肯退縮。後來，他利用受詔領校中秘書的機會，根據豐富的古籍資料，精心編撰《列女傳》一書，因此，《列女傳》充滿劉向一種自覺的政治意識，目的不僅止是為婦女寫作教科書，更是要給帝王和士人作借鏡，矛頭直接指向的是漢成帝后宮荒淫無度的生活。

(二) 范曄為官宦世家之後

范曄出身五代儒學官宦世家，家學深厚，地位顯赫，他的父兄與他本人皆為劉宋當朝重臣，當然盡力維護劉宋王朝的正統地位。劉裕建宋時，范曄的父親范泰有功。范泰初為東晉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他受排擠，後起兵於京口（今江蘇鎮江），桓玄被殺，劉裕掌握東晉大權。東晉末年，他協助劉裕鎮壓孫恩、盧循農民起義。之後，范泰得到劉裕的格外賞識，官拜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為

⁷⁸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27。

⁷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頁 1958。

劉宋開國功臣，皇上對他「恩禮甚重」⁸⁰。范曄兄范暉為宜都太守，范晏官至侍中、光祿大夫，范曄本人也官至太子詹事。更為重要的是，范曄家學深厚，其祖父范甯在晉孝武帝時拜為中書侍郎，對經學非常精通，曾作《春秋穀梁傳》集解，「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⁸¹。范曄父親范泰在東晉時為太學博士，曾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以學義自顯」⁸²。劉裕建宋後，國家籌劃建立最高學府——國學，范泰遂被任命為國子祭酒，他當時上書朝廷，全面陳述「辦學」的理想和意義。由此可見，范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⁸³范曄自幼受到前輩的教誨和陶冶，更是「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⁸⁴。所以，范曄身處這樣特殊的政治、文化及家庭環境中，當然對於他撰寫《列女傳》有一定的影響。

劉向身為漢代皇族之後，他家世代為王，出身於這樣的王侯世家，他的家族文化基礎很高，皆通經書。維護漢朝大一統是作為漢朝宗室應盡的義務，對於漢室的情勢危殆，劉向有著因宗室關係而衍生的敏銳感和高度的憂患意識⁸⁵。在多次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中，他都堅定不移的本著漢朝的立場，顯現出極力維護漢權大統的強烈觀念。相較之下，范曄生長於東晉，仕宦於劉宋時代，歷經動亂的士人們，眼見迅速更替的朝代，一方面，出於對政治事件和當權者的畏懼，不敢輕易得罪權貴，多半選擇隨波逐流，對於一家一姓的忠貞觀念也漸漸消退。另一方面，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對於君權神授的天命不再迷信，面對漸趨脆弱的政局，缺乏治國大略的君主，士族們開始覺得皇帝並不是永遠達不到的神話，只要機會來臨，也是有可能掌握住天下大權的⁸⁶。雖然范氏家族在劉宋王朝中屬於得意的一派，但范曄出身士族，其本身的態度也是如此。⁸⁷由此可知，出身的身份不同，

⁸⁰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泰傳》，頁 1621。

⁸¹ 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范汪 子甯》（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989。

⁸²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泰傳》，頁 1629。

⁸³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泰傳》，頁 1623。

⁸⁴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范曄傳》，頁 1829。

⁸⁵ 劉駿捷，〈劉向的憂患意識與學術實踐〉《齊魯文化研究》第九輯，頁 257。

⁸⁶ 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3），頁 6-7。

⁸⁷ 朱東潤認為范曄編寫《後漢書》的動機是感於江山的分裂，中原的陸沈。參見朱東潤，《史記

兩人對國家皇權的認同感和使命感是有不小的差異的。

二、政治環境不同

(一) 劉向時西漢由盛轉衰

西漢後宮生活的淫奢是劉向撰寫《列女傳》的主要原因。西漢王朝雖然經過昭宣中興，但仍一步步的步入衰敗。班固就認為「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⁸⁸」其原因主要為人禍，即統治者的奢侈無度。漢元帝雖為人恭儉、寬弘，也有心解除百姓生活的困苦，並改正了一些奢侈的制度，行了一些寬恤民力的事情，但由於大臣與宦官之間政治爭鬥愈烈，許多措施並不能實行。在元帝時，王皇后非常受寵，期間「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⁸⁹」，公元前33年，元帝死後，子成帝即位。成帝是個荒淫無度的人，性格又優柔寡斷，朝政大權完全落入外戚王氏一門手中。王氏一門五侯，爭相營造府第，相競奢華，在朝堂之上打壓忠良，根本不顧百姓的死活，成帝相較於元帝，只有更加昏庸不堪，不但大權旁落，還整日沉醉於趙氏姐妹的「溫柔鄉」中，根本不理朝政，而趙飛燕姊妹恃寵而驕，恣意為亂後宮。而太后王政君樂得見兒子不理朝政，自成帝即位起，王氏一家才是西漢王朝真正的統治者。王夫之認為「女禍之烈，莫如王氏。⁹⁰」、「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⁹¹」指出後宮亂政對漢室的頹傾有重大的影響和危害。班固認為西漢之所以滅亡的理由是：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⁹²

可知班固亦認為趙飛燕姊妹在後宮之為害作亂，王氏家族之專擅朝政，而導致之

考索·後漢書考索·范曄作書的動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頁351-372。

⁸⁸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佞幸傳》，頁3741。

⁸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外戚傳》，頁3973。

⁹⁰ 王夫之，《讀通鑑論》(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70。

⁹¹ 王夫之，《讀通鑑論》(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75。

⁹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成帝紀》，頁330。

後王莽篡漢的終局。主要原因起於婦人亂政，導致天下沈淪至無法挽救的地步。

劉向撰寫《列女傳》時，正當西漢由盛轉衰的時期，朝政衰敗，皇綱不振，國庫空虛，百姓困苦，外戚宦官擅權誤國，劉向日睹劉氏江山即將毀於后妃、外戚手中，當然不可能不動聲色。他說：

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系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⁹³

他深感劉氏之危殆，以身為漢宗室為己任，加上皇上對他的厚愛與禮遇，對漢朝更有忠貞不二、直言直諫的勇氣和義務。徐復觀曾說：「劉向起，大家窮力盡氣以爭得失的，主要都是環繞這種『婦人』問題，此外便無所謂國家大政，也不能有國家大政。⁹⁴」此話道出了漢室最核心的「婦人」問題，也是劉向所以撰寫《列女傳》的原因，旨在勸誡皇上，並給當時的女性應有的道德倫理規範。

（二）范曄時宋文帝元嘉之治

西元 420 年，劉裕以宋代晉。朝代的更替，並沒有讓整個時代帶來光明，相反的，劉宋皇室只有爲了自己的權力，更著力於加強自己的統治。宋文帝在位期間，是著名的「元嘉之治」，推行繁榮經濟文化的各項政策，從而出現了短期內經濟終於有所恢復，人民生活較爲安定的政治局面。雖然文帝掌權之後，先是消滅了權臣徐羨之等，接著冤殺功臣檀道濟；在軍事上，凡是命將出師，都「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⁹⁵，甚而特派徐愛隨軍，「銜中旨，臨時宣示」⁹⁶，因而喪師失地，使得國家元氣受挫。太子劉劭曾說過北伐之失，但無人敢說「御前指揮」之失的，可以想見其強權統治的程度，所以文帝強化統治與

⁹³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劉向傳》，頁 1958。

⁹⁴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57。

⁹⁵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文帝紀》，頁 103。

⁹⁶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恩倖傳》，頁 2307。

其父劉裕相比有過而無不及。⁹⁷置身在如此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想要免遭禍害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朝臣們的命運通常朝不保夕，昨日方為座上之客，今日即落為階下囚。在野的名士接連受到牽累，或者被猜忌，甚至被捲入政治漩渦之中而慘遭殺害。如此教訓，不得不讓范曄警惕恐懼。范曄在《樂游應詔詩》中說：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樑協孔性，黃屋非堯心。
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鑿音。
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嶮嶽。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
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⁹⁸

「山樑協孔性，黃屋非堯心」的范蔚宗，希望「謝丹黻」歸隱山林以躲避災禍。所以當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請范曄擔任州主簿時，范曄去而不就，而且他還以好飲酒、善音律等放任達誕，恣情不羈的習氣為護身符，力圖避免陷入爭權奪利之漩渦中。在《後漢書》裡可以看到，他對古人因權力爭奪而遭來殺身之禍深表感慨：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驚、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⁹⁹

李景星曰：「范氏論及於此，未免有餘痛焉」¹⁰⁰，此話真是一語中的。另外，范氏論馬援則曰：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

⁹⁷ 高尚志，馮君實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頁36-40。

⁹⁸ 李善，《文選：附考異·第1卷》（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1991），頁515。

⁹⁹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鄧禹傳》（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頁1120。

¹⁰⁰ 李景星，《四史評議·後漢書評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280。

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¹⁰¹

此話正為馬援所痛也，哀嘆之苦，溢於言表。理解范曄的縱酒、無禮等行爲的背後原因，可能也是其主體人格與國家、社會現實撞擊的沉痛反響呢？又何嘗不為心中鬱積之苦悶與憂憤的試圖解脫呢？

劉向時正是西漢走向滅亡之路的開始，皇帝荒淫、后妃為禍、外戚擅政，他極力著述以上諫天子，以期能挽回頹勢，守住漢室江山，劉向對漢室的忠貞與付出，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反觀范曄雖處於歷史上南朝宋文帝「元嘉之治」的經濟復甦時期，但帝握強權，政局多變，士族們各個只求自保，范曄雖也曾多次跟隨高官任要職，內心也只能處於保守消極的態度。

三、仕途坎坷之原因不同

（一）劉向與宦官外戚對抗的仕宦過程

劉向歷經西漢昭、宣、元、成四個朝代。因父親劉德的保薦，12歲時擔當輦郎的工作。成年時，「以行修飭」¹⁰²擢升為諫大夫，又正當宣帝選名儒俊材，因此通達經傳、善文屬辭的劉向與王褒、張子僑等應詔進見，獻賦頌幾十篇，得以嶄露頭角。因宣帝好神仙方術，劉向22歲時把父親劉德治淮南獄時獲取的《枕中鴻寶苑秘書》呈上朝廷，結果因方術鑄造黃金失敗，劉向被劾以鑄造假黃金的罪名，為死罪。因其兄長獻出一半封邑為他贖罪，加上宣帝也憐惜他的才華，才得以免死。第二年，宣帝立「穀梁春秋」，劉向應詔傳授《穀梁》。27歲時，劉向在石渠閣與儒家學者共同講論「五經」，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時在與宦官弘恭、石顯及外戚史、許集團的交戰中，劉向再次被逮入獄，且廢為庶人長達十餘年。成帝即位後，劉向獲得重新任用，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後遷為光祿大夫。成帝幾次想立他為「九卿」，卻屢遭帝舅王鳳阻撓，但終因劉向是三朝元老，又是學識廣博的名儒，詔其為校中秘書，經歷四帝王之

¹⁰¹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馬援傳》，頁1597。

¹⁰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劉向傳》，頁1928。

間，劉向前後爲官三十多年，官終中壘校尉，72歲時去世。

（二）范曄因性格驕慢而起伏不定的仕宦經歷

范曄在仕宦上有賴父親的功勳庇蔭，初始之路較順，但因他性格輕躁，元嘉九年冬天，竟然在彭城王劉義康母親去世之日，開窗聽挽歌作樂，結果被貶至宣城。也正是在宣城這段時期，他完成了鴻篇巨作《後漢書》。但他性格輕躁，范曄對上司心高氣傲，和同事們很少同心，平時交遊且十分不慎，最終陷入了宋文帝與劉義康激烈對抗的旋渦中，成爲皇族內鬥的犧牲品。而范曄的悲劇人生正反映了南朝士族階層的退化。范曄出身自士族家庭，學有一身才藝，卻無奈心志高狂，縱情任性，但既缺少經略軍政的實際能力，又沒有成就大業的勇氣，最終的悲劇顯然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由此可見，范曄和劉向皆曾歷經幾代皇帝的仕宦過程，雖然兩人皆未擔任過極高的官職，但卻也先後被貶官、再復用，如此的官場載浮載沈，而且范曄還終於謀反被殺的命運，劉向的晚年發展相較之下相對平和又受重用許多，更不至於如范曄一般，引起後世學者爲了爭論他到底是否有意有謀反而掀起口水大戰。

劉向一開始因父親保薦擔當輦郎的職務，後來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得以嶄露頭角，其仕宦過程終究都是爲漢室盡忠職守的，不管是受到宦官或外戚的打壓欺侮，他總能越挫越勇，奮鬥到人生的最後一刻。范曄在父親的功勳庇蔭之下，一開始就從事「相國掾」，迅速進入權力中樞。後來雖然也是仕途不順、不得志，但其原因顯然跟劉向不同，例如他在北征時辭以脚疾被牽，還在劉義康生母去世將下葬時聽挽歌爲樂被貶，同樣是屢遭貶謫的仕途不順，但劉向和范曄被貶的原因和背後對國家、社稷的使命感和用心有極大的差異。

四、以儒家為正統思想

（一）劉向注重儒家仁、德思想

劉向一生的著述中，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幾乎了大部分，貫穿其中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與仁政思想。劉向所撰之《新序》、《說苑》、《列女傳》三傳以

宣揚儒家思想為主。而劉向所認同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現為儒家的仁政思想、德治思想兩方面。

1.仁政思想

劉向常在其著作中宣揚儒家思想的中心「仁」。認為君主要師行仁政，講求誠信。劉向在《新序·雜事五》「周文王作靈台」中曰：

周文王作靈台，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¹⁰³

從中可見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周文王作靈台之事」說明了只有仁民愛物的君主才能使「天下歸心」。西漢從元、成帝起，百姓安和樂利的盛世景象已不見，封建社會深陷於經濟破產、政治腐敗、苛稅徭役繁重、人民流離失所、怨聲載道等危機。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下，作為一個忠貞直諫的大臣，劉向藉由儒家的政治理論和倫理道德規範表達政見，以此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除《新序》之外，《說苑·貴德》中也以「景公遊於壽宮」、「晉平公春築臺¹⁰⁴」等故事，來說明儒家思想中統治者需加強自身修養並施行仁政的重要性。

2.德治思想

劉向對於儒家之德治思想著重於實行德行之教化，對於不義之戰表示反對。儒家思想中，對待周邊民族，最根本的方式是德化四夷，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劉向在所編《新序·善謀下》中以不少的篇幅敘述了武帝與將軍王恢、安國稽等大臣討論馬邑之戰的始末，後來武帝採納了王恢的意見，親自率領大軍，埋伏在馬

¹⁰³ 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664。

¹⁰⁴ 劉向著，《說苑·上》（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頁 214。

邑，「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樵車相屬，冠盜滿山，天下搖動¹⁰⁵」因不斷交戰，結下冤仇，而引此無窮的災禍。

（二）范曄注重賢君之寬和政治

范家曾作《春秋穀梁傳集解》，對於儒學可說是代代相承，而《穀梁傳》的特點正在「指歸校正」¹⁰⁶。「指歸校正」的意思是說《穀梁傳》所傳述的儒學思想比其他二家更為正統。范曄著《後漢書》自然會沿襲家學，用正統儒家的角度來撰述歷史事件，評論歷史人物。歷來學者也認為范曄是尊崇儒學的，他所持的觀點與所在的立場以儒家為主。邵晉涵在《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中說道：

《儒林傳》考傳經源流，能補前書所未備，范氏承其祖甯之緒論，深有慨於漢學之興衰，關於教化，推言終始，三致意焉。¹⁰⁷

汪榮祖曾說：

子長著論，徘徊於儒道之間；孟堅獨崇仲尼，見乎字裡行間；蔚宗則以儒教為精神血脈，融合於著論之間，以史事彰儒義，以儒義貫史事。其論東漢一代得失，幾與儒學之盛衰、儒士之榮辱，息息相關矣。¹⁰⁸

他認為與馬、班相比，范曄更注重儒學。范曄尊崇儒家寬和的仁政，而寬和的仁政有賴於賢明的君主來保障。范曄認為君主必得賢明，而東漢一朝的君主，他認為光武帝、明帝、章帝這三個前期的皇帝比較賢明，因此他稱讚道：「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¹⁰⁹」。又言章帝時做到「氣調時豫，憲平人富。¹¹⁰」和帝時，「雖頗有強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聞土世廣。¹¹¹」當時，東

¹⁰⁵ 劉向著，《新序·善謀下》（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頁 505。

¹⁰⁶ 劉熙載著，徐中玉、蕭華榮校點，《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頁 7。

¹⁰⁷ 劉咸忻，《四史知意》（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738-739。

¹⁰⁸ 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比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08。

¹⁰⁹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明帝紀》（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頁 148。

¹¹⁰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頁 256。

¹¹¹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頁 330。

漢朝廷甚至以偏師出征，一舉打敗了北方匈奴，功績遠勝於西漢強盛的武帝時代。和帝能夠取得這樣的功績，主要亦是基於前三位君主長年的政治積累。安順以後，朝政日趨腐敗、昏亂，原因在於當朝君主不是短壽就是昏庸無道。其中，安帝在位時，和帝鄧太后專主朝政，當時：

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¹¹²

范曄極為反對女主專政，因此他認為這個時期正是東漢喪失根基的開始，事實也確實是如此。對於東漢衰敗的原因，雖然後世的結論很多，大家的總結其實相差無幾，多認為東漢滅亡在於宦官專權、外戚把政及羌戰的耗費¹¹³。范曄自己也有這樣的理解¹¹⁴，但是范曄主要認為東漢之所以潰敗的最初原因是女主專政。女主專政，才重用外戚與宦官，最後導致外戚與宦官權力的無限增長，因此他認為安帝時，鄧后主權是東漢衰敗之始。

此後的君主，有的為宦官輔立，如順帝，或太后臨朝，如沖帝、質帝，幾乎沒有一個可以稱賢明的，安帝「計金授官，移民逃寇」，順帝則多僻，桓帝與靈帝之昏庸更不勝枚舉。沒有明主的政治必定是失敗的政治。安順以後的「失」就在於缺乏明主上，只有賢明的君主才可開創開明、興盛的治世。所以，對安、順以後諸帝的朝政，范曄總體上是否定的，其所持的態度主要為批判、責備。在范曄眼裡，光武帝、明帝時的國家、社會所以能夠穩定、和平的發展，主要是因為他們採用了儒家寬仁的政治理念與王道的政治精神，政治眼光高遠、措施合理。

范曄認同儒家寬和簡約的政治。他在《王劉張李彭盧列傳》中論道：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

¹¹²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頁420。

¹¹³ 汪榮祖以為范曄揭示東漢亡國因為宦官與羌戰。（見其《史傳通說》之關於范曄與《後漢書》的論述）朱東潤先生以為「後漢的國力，一大半破壞在對於羌人的戰爭裡」。（《史記考索》354頁）。李景星則以為「東漢之亡也，以閹豎」。（《四史評議》347頁）何焯認為「東都則黃巾蟻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義門讀書記》）401頁）

¹¹⁴ 范曄言「東都緣閹尹傾國」（《宦者列傳論》4391頁），在《西羌列傳》中言道「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西羌傳論》4869頁），意即羌戰嚴重削弱東漢之根基。

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¹¹⁵

他認為漢朝能夠得以順利建立，是由於西漢高祖、文帝等寬和的政治「深結人心」，以致天下百姓難以忘懷，正所謂「寬則得人」的道理。在他看來，也只有寬和的政治才能使朝廷的長久綿延。他以為東漢前期的政績主要來自光武帝等的寬和的仁政。總而言之，范曄在思想上以儒家為主，力舉儒家的王道思想，頌揚君主的教化政治，稱頌寬容待民的仁政策略。在這基本原則上，他的思想基本上是貫串一致的。

雖然兩人皆以儒家為正統之思想，但可見同中有異，劉向在《新序》、《說苑》中多舉仁德之君主事例，藉以諫上，希望當時西漢末年，奢靡荒淫的統治者能回歸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仁德之政。范曄鑑於西漢、東漢治世的賢君名主，皆是以寬和的政治贏得人心，相較於魏晉和南朝宋的專制強勢君主，以及害怕動輒得咎而消極退縮隱匿的士人們，所以主張賢君需以儒家的寬和治世才是建立朝政的基礎。這就是兩人不同之處。

¹¹⁵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盧芳傳論》，頁 837。

第三章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本章將以母親、女兒、妻子三種角色分析劉向《列女傳》中百餘名女性的列女形象，以及分類探討范曄《後漢書·列女傳》中十八名女性之列女形象，並比較兩書之列女形象群之間的差異。

第一節 劉向《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劉向《列女傳》選取百餘名女性入傳，描寫了不同類型不同德性事跡的女性，從多方面展現了古代社會中的女性生活，同時，亦作為一本當時女性的教化書籍，分析《列女傳》，我們可看出劉向仍是從男性角度出發¹，對漢代女性提出了道德規範與要求。以下按照列女基本的家庭角色：母親、妻子、女兒三方面，進行《列女傳》中女性形象之歸類和分析，分類如下：

一、母親形象群

劉向以《母儀傳》作為《列女傳》的首篇，所記載的人物事蹟最早，也都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可見他對母親角色之重視。如棄母姜嫄、契母簡狄、啓母塗山三人，是夏、商、周三朝始祖的母親，在《列女傳》中棄和契均是受到自然的感召而生下第一代男性祖先，劉向都作為母親記載於《母儀傳》中，可見《母儀傳》之名是以身份來做分類的。「母儀」二字，始見於劉向《列女傳·小序》云：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²

¹ 鄧劍萍，〈從女性主義角度看劉向《列女傳》〉（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15。

² 朱國藩，何志華，樊善標編著，《〈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

劉向提出對母親道德標準，需具備智慧、儀態、言辭合義。劉向在《母儀傳》中撰寫了十七位母親之典範的傳記，用以闡述他所認同的為母之道。《列女傳》寫了母親的身教、德教、禮教、辭教、詩教、胎教、政教、遷教等，多層次、多向度的展現了母親「教子」的母德形象，在此，筆者將其綜合論述於下。

（一）天下典範的母親形象

《母儀傳》第一篇的《母儀傳·有虞二妃》，講的是帝堯之二女，嫁給舜，謙恭照料舜的起居生活，恭順服侍舜的父母。值得注意的是，有虞二妃並無擔任母親的角色，卻放在《母儀傳》之首。王照圓在《列女傳補注》中為「元始二妃」作注時曾說：「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為人之大始，劉氏作傳又於此托始也」³。在劉向的價值觀念裡，二妃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二妃作為聖人舜之妻，能以智之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有虞二妃》列入《母儀傳》之首，劉向是以她們作為母儀天下的典範。

從《母儀傳·有虞二妃》中，可發現「母儀」標準不止要有好母親、好妻子的品性，更要具備好女兒而且是好兒媳的道德標準。二妃不僅不因自己是天子之女而驕縱怠慢，反而謙恭孝舜，對舜的父母也是非常恭順，在舜繼位為天子後，「事瞽叟猶若焉」⁴。劉向在傳後贊二妃「思盡婦道」，其中婦道自是包含做女兒和做媳婦之孝道，既承接了父親帝堯通過自己進行對舜的考驗，觀舜治家之道與推斷其治國之方，且不違公公之命，恪守孝道，做為一個好媳婦，維護了家庭內部的和諧。

劉向傳入《母儀傳》中的女性，不僅止是「胎養子孫，以漸教化」的母親，更是具有母儀天下、輔佐君王的王妃。在《母儀傳·湯妃有新》中云：「有新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至王功。」⁵指有新為妃

學出版社，2004），頁13。

³ 劉向撰，王照圓注，《列女傳補注》（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有虞二妃》（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7。

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湯妃有新》，頁19。

之後，在後宮統管眾妃嬪，使內部能禮儀整肅，秩序井然，沒有發現過嫉妒、爭寵、違背倫理的人，終於幫助殷湯統有天下。而傳中「君子謂：『妃明而有序。』」、「頌曰：『質行聰明，媵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慤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對湯妃有新的管理有方、能帶來媵從伊尹，輔助商湯，德澤遍布宮內外，無過無禍「卒致王功」的德行。《母儀傳·周室三母》中提到太姜云：「貞順率導，靡有過失。⁶」指太姜為人貞靜和順，對內事能正確統帥引導，使宮內沒有發生什麼過錯。因此，劉向在《母儀傳》中，除記載母親的形象之外，能夠統領後宮，發揮內治之效的后妃，也是百姓之母，母儀天下的典範。可見這部分的内容反應了劉向寫《列女傳》欲諷諫的主要事蹟「後宮亂政」，他想以此書規範後宮女性的道德行爲，有密切的關係。

（二）教養有方的母親形象

在《母儀傳·棄母姜嫄》、《母儀傳·契母簡狄》、《母儀傳·啓母塗山》三篇中，每篇都有一個極雷同的段落出現。

《母儀傳·棄母姜嫄》：「終生子。……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卒為帝佐，母道既畢」。⁷

《母儀傳·契母簡狄》：「遂生契焉。……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契為帝輔，蓋母有力」。⁸

《母儀傳·啓母塗山》：「既生啓。……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教訓以善，卒繼其父」。⁹

可見這些母親除教養有方，使兒子成就功業，然後因兒子對國家的開創和興盛有輔佐之功而昭顯其德。在傳中的敘述，母親首先要生一個兒子，對其撫養和教育使其德行兼備，成為輔助帝王的優秀人才，或成為繼承父親的傑出兒子，才可謂

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周室三母》，頁 20。

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棄母姜嫄》，頁 9-12。

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契母簡狄》，頁 13-15。

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啓母塗山》，頁 16-17。

盡了「母道」。母與子的親密關係雖被父親或君王的介入而打破，但母親不是被看做生養萬物的化身來崇拜，而是被視為替君育臣、為父養子的順從式人物來看。

也因其有替君育臣、為父養子的重責大任，所以母親的品性對後代來說更是十分重要。作為一個傑出的母親，首先自身要具備優秀的德行。「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慶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¹⁰。所以「姜嫄之性，清淨專一¹¹」、「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¹²」，如此她們的孩子才能「化其德而從其教」。母愛的表現主要不在對子女的撫愛或衣食上之照顧，而在如何將忠孝仁義的道德教養子女。所謂「善於教化，成其令名」，才是母愛最極致的表現，也為了這個政治社會道德目標，母親在各個階段都要做到十足的道德教化。

在《列女傳》中，我們分為胎教、幼教及教子悔過三方面來說明。

1.胎教：《母儀傳·周室三母》中提及太任在懷有文王時，就很注重胎教之法，「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¹³」，因此順利產下文王，「洩於豕牢，而生文王」。因其用心於胎教，所以「文王生而明聖」，皆是其「能為胎教」之功。

2.幼教：《母儀傳·鄒孟軻母》中最著名的孟母三遷，孟母不辭辛勞地為兒子尋找一個最適合居住的地方。孟母考量住所的優劣時並不說「此非吾所以居」、「真可以居吾」等話，其言必為「此非吾所以居處子」、「真可以居吾子¹⁴」等。這說明孟母對選擇住所的考量並沒想到自己，而是以能否有良好環境以教導孟子作為最首要的決定原則，可見其對教導孟子投入了極大的熱忱和用心。孟子年少時求學中途歸來，孟母立刻就用剪刀剪斷織布機上的布來勸誡孟子不要廢棄學業、不可墮於修德，從「孟子懼」可見當時孟母必定是一反常態地面色嚴厲。孟母善用舉例、善於講理，教養小孩

¹⁰ 賈誼，于智榮譯注，《賈誼新書譯注·胎教》（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305。

¹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棄母姜嫄》，頁10。

¹²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契母簡狄》，頁13。

¹³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周室三母》，頁21。

¹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鄒孟軻母》，頁52。

懂得嚴慈並重，恩威並施，可見其善於教化。

《仁智傳·晉羊叔姬》中，羊舌子接受叔姬的建議接受晉人偷盜而送來的羊，想要煮給兒子們吃時，叔姬卻說：

「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¹⁵

她舉出「南方的鳥餵雛鳥時因對肉食不加挑選，而使得它的雛鳥常常不能成長壯大」為例來反對羊舌子這種做法。她認為兩個孩子還只是幼童，孩子將來的品行會學著大人的行事，不能讓他們吃不義之肉，因此她選擇不殺羊，而用瓦甕將羊裝起來，埋藏在屋後，以表白自己沒有參與偷羊的事件。

《仁智傳·孫叔敖母》中孫叔敖還小的時候外出遊玩遇到兩頭蛇，變把牠殺死埋掉了，回家因懼怕會同傳言「見兩頭蛇死」一般而哭泣，叔敖之母安慰他說：

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16

用一段話消除叔敖心中的疑慮，並教育他，德行可以戰勝不祥，仁義可以免除百禍的道理，說明兒子在這件事上符合是道義標準的。這個故事可以感受到母親寬慰兒時的溫情，亦可以看到母親利用機會教養孩子德行的努力。

以上這三位母親，對幼童的教育都是從品德教育方面出發，非常注重道德的培養。孟母勸誡兒子不可「墮於修德」，叔姬認為教養幼童「不可不

¹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晉羊叔姬》，頁 157。

¹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孫叔敖母》，頁 141-142。

義」，叔敖母親的寬慰之詞是要兒有「陰德」，都符合儒家之倫理道德的規範。

3. 教子悔過：《母儀傳·魯季敬姜》裡，文伯對待朋友舉止態度傲慢，文伯之母敬姜把他叫來嚴厲責備他說：

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遠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¹⁷

敬姜利用周武王、齊桓公與周公等二聖一賢的謙恭事例訓勉文伯，文伯聽完母親的訓誡，「文伯乃謝罪」之後，於是他謹慎的擇師選友作學習的榜樣，才有後來的品行和成就。

《母儀傳·楚子發母》中子發在行軍中享樂，雖破秦歸來，但其母「閉門而不內」，派人責備他兒子說：

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¹⁸

可見子發母用越王句踐征伐吳國的例證，與《詩經》中的道理，要子發能和士兵同甘共苦，保持平等和睦的關係之重要，所以「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

《母儀傳·齊田稷母》中田稷子身為齊國的相國，卻私下接受他下屬行賄的百鎰黃金，田母怒曰「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

¹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魯季敬姜》，頁 35。

¹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楚子發母》，頁 49-50。

於是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諸焉¹⁹」。這些母親都懂得匡正兒子錯誤的行爲，教以忠孝、厲以廉潔，讓兒子得以改正符合道德標準。

（三）非親生母親的慈愛形象

《母儀傳·魏芒慈母》中的慈母爲芒卯的後妻，前妻有五子。即使前妻之子無論怎麼特別照顧或特殊待遇，依然不喜歡自己，慈母仍然在前妻中子犯罪被判死刑後，奔走勞碌，力圖挽救他的性命，後來是魏國安釐王聽說慈母之事，看中慈母義舉，才下令赦免兒子的罪，甚至免去全家的賦稅、徭役。後來慈母又逐步以禮義教化，勉勵引導前妻五子和自己三子施行仁義，他們後來都成爲爲魏國的大夫卿士。劉向評論說：「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²⁰」。可見劉向是因爲慈母具有慈惠仁義不偏袒的道德典範作用而將其列入《母儀傳》中。劉向稱讚道：「繼母若斯，亦誠可尊²¹」。身爲一個母親，必然有珍愛幼子的天性，並不應該以幼子是否爲自己親生而有所偏頗。這裡偏重的是女人天生的母愛廣博之情，對待繼子視如己出的慈母形象。

其他傳記中，非親生、血緣關係的母親對待義子的做法就有些捨棄私情、求取公義的傾向，明顯表示了崇公抑私的味道。例如《節義傳·魯孝義保》中宮裡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自立爲魯君，又到處搜求公子稱，準備殺死他。公子稱的保母於是在臨危之急用自己的孩子代替公子稱被殺，然後帶著公子稱逃亡，公子稱就是後來的魯孝公。保母犧牲至此，也不過換來一個「保母若斯，亦誠足恃²²」的評價。這裡蘊含著後世托孤故事原型，對保母的描寫就帶點「盡忠」的意味。

還有《節義傳·魯義姊妹》中婦人遇到軍隊進攻，丟下自己的孩子，無論他如何大哭，頭也不回的抱著姪子逃跑，保住姪子的安全。《節義傳·齊義繼母》

¹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田稷母》，頁 68。

²⁰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魏芒慈母》，頁 66。

²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魏芒慈母》，頁 67。

²²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魯孝義保》，頁 229-230。

中當官府無法判定哪一個兒子犯罪該被處死時，二子之母請求齊相殺掉自己兒子保住前妻之子。《節義傳·魏節乳母》中魏公子的乳母在秦國攻破魏國時，竭力保住公子，甚至在秦君的亂箭中用身體掩護公子，最後與公子同死。《節義傳·梁節姑姊》中的婦人因為在火場之中只救出己子而未能救出哥哥的孩子，竟投火自焚而死。以上諸傳，顯示出這些非親生、非直系血緣關係的母親對待義子的行為，她們捨棄私情、求取公義的義舉，充分顯示出崇公抑私的形象。

（四）仁智聰慧的母親形象

《列女傳》中有一類母親行事仁智堅強，她們常在君王面前，直陳己見。例如《仁智傳·魏曲沃負》中魏大夫如耳的母親，不滿哀王收納太子妃為妃，先是勸兒子向君王進諫，但如耳還來不及進諫，就奉命出使到齊國去，曲沃負就直接叩開王宮大門，上書給哀王欲進諫，並被哀王召進直陳其想法：

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²³

她以夏、商、周朝得以興盛與滅亡的原因，以及《關雎》中之男女之道，諷刺哀王無知踰禮，可見曲沃負之明智知禮。

《仁智傳·趙將括母》趙括母親上書給孝成王，勸諫君王不要任用趙括為將。她認為：

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

24

括母認為括若出兵，必將覆軍，勸阻孝成王不成，只好求自保，果然趙括在長平

²³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魏曲沃負》，頁 173。

²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趙將括母》，頁 177。

吃了敗仗，括被射死全軍覆沒，好在括母有仁智，妻子兒女才得以倖存。

《辯通傳·趙佛肸母》中佛肸反叛趙氏，按照趙氏家法其母將叛死罪，其母在趙襄子面前爲己力爭曰：

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²⁵

佛肸的母親言辭感動趙襄子，使他不遷怒於人，自己和兒子也都能免除災難。

《辯通傳·楚江乙母》大夫江乙因有賊入宮偷盜，令尹將此事歸罪江乙，並請恭王免其官職。後來他的母親丟了布，於是進宮稟報恭王：

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²⁶

其母善以小喻大的才智，指責令尹對丟布亦有責任，言詞適度，進退守禮，巧言替兒子釋罪。

（五）惡母形象

《母儀傳·有虞二妃》中舜的母親，憎恨舜而只愛象，與舜的父親及象一起要謀害舜，導致舜萬分痛苦，「往於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²⁷」。根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

²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趙佛肸母》，頁307。

²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楚江乙母》，頁285。

²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有虞二妃》，頁6。

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舜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²⁸

這裡提到舜的母親是後母，與前文提及的《母儀傳·魏芒慈母》等受到頌揚的繼母們相比，《母儀傳·有虞二妃》中的舜母具備惡毒的繼母的女性形象原型。

此外的惡母形象主要集中在《列女傳·孽嬖傳》中。《孽嬖傳·衛宣公姜》中宣姜謀劃欲殺害太子，結果卻無意中殺掉了自己的兒子。《孽嬖傳·晉獻驪姬》中驪姬是太子申生的繼母但意圖殺害太子申生。《孽嬖傳·齊東郭姜》中的郭姜反對丈夫將崔邑給繼子崔成。《孽嬖傳·趙悼倡后》中倡后作為太子的繼母卻故意引太子犯罪而再廢掉太子。上列這些母親最後都相繼造成國家亂亡或者引來滅室之禍。

二、女兒形象群

（一）替父脫罪的女兒形象

《辯通傳·齊傷槐女》、《辯通傳·趙津女娟》、《辯通傳·齊太倉女》中的女兒們在獲知父親犯錯將被責罰之後都積極的巧言進說，而使其父得以免罪。三個故事都被劉向列入《列女傳·辯通傳》中，劉向在《辯通傳》小序中曰「連類引譬，以投禍凶²⁹」，意即「婦人辯通事理以抗臨時禍凶」³⁰，女兒們在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出現時靠自己的能言善道為解救父親發揮了莫大的作用。這些傳記表面上看來都美化了女兒的形象，父親們犯了過錯無力自救，而女兒們卻能憑藉自己的才辯救出父親們。女性似乎在這部分表現的比男性更強，呈現出顛覆傳統的姿態。但是，如果深入考察這些故事中透露的儒家父權意識的意圖後，這些傳記就不僅只是解救父親危難的故事，而是強調女兒犧牲自己對父親盡孝的行為。

最特出的就是《辯通傳·齊太倉女》中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當自己

²⁸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五帝本紀》（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32。

²⁹ 朱國藩，何志華，樊善標編著，《〈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頁127。

³⁰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1987），頁47。

被拘囚得到長安接受審訊，被逮捕押走時，竟然大罵五個女兒說「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認為女孩子在情勢緊迫時，是無法幫得上忙的。最後女兒歷經波折「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³¹』」，終於實現了父親心中和「兒子」一樣的作用和價值，幫助父親獲得赦免。

家庭或國家灌輸了女兒們「在危急關頭女性不具有任何價值」的觀念，也正是這些觀念使女兒們的行為更具有犧牲的意味，女兒為了盡孝不惜貶低自己：如《辯通傳·齊傷槐女》「靖懼」，跑到齊相晏子的家門口，說：「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³²」，「此『不勝其欲』，乃女子之自媒之詭詞」³³，因此晏子笑談自己偌大的年紀還遇上私奔的人，認為此女子無法如同男子一樣進見國相，只好用這等曖昧詞彙來獲得求見，這也是一種作女兒的犧牲。《辯通傳·趙津女娟》則是直接說：「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³⁴」，解救了無辜的父親。各種犧牲自己的話語，是爲了換取父親們對其自身價值的承認。

（二）好禮執節的女兒形象

《貞順傳·召南申女》中申女雖已許配給豐國的一個男人，但由於夫家沒準備好結婚的「六禮」就打算將她迎娶過去，申女堅持不肯輕易屈服而出嫁，她說：

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³⁵

申女認為樹立人倫的根本，才能產生禮義，女嫁男娶，是爲了嫡傳子孫，繼承祖業，使宗廟祭祀有主。但夫家卻看清禮儀，違背禮制，所以不、願意隨便就過去

³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太倉女》，頁 337。

³²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傷槐女》，頁 291。

³³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內篇·諫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58。

³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趙津女娟》，頁 337。

³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召南申女》，頁 185。

夫家。後來夫家還向理官告狀，想讓她吃上官司，但她仍始終不屈，宣稱只要少一禮物，缺一禮儀，就堅守節義，誓死不去夫家。並作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表明她絕不嫁給如此不當的禮儀，申女守節執義之堅定，真是令人讚嘆。《貞順傳·宋恭伯姬》中伯姬則「以恭公不親迎³⁶」說宋恭公沒有行親迎之禮，但因受父母逼迫，不得不離家前往宋恭公家，三個月後，雖已行過廟見之禮，伯姬還是由於恭公當初沒有親迎而失禮，「不肯聽命」。《貞順傳·齊孝孟姬》中孟姬在未嫁時，「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³⁷」只要齊國人跟她求婚，都因禮數不周，始終不答應。生活中也都遠別男女以避嫌，齊國沒有人能夠做到備禮求婚的，因此稱讚她貞順的美德。《辯通傳·趙津女媧》中趙簡子欲娶女媧，「媧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³⁸」她認為婦人的禮儀，沒有媒妁之言是不能出嫁的。由此可見，女兒們皆為好行禮儀，言行盡在節義之中的女兒形象。

（三）醜陋卻有奇才的女子形象

《辯通傳·齊鍾離春》中鍾離春「極醜無雙³⁹」、《辯通傳·齊宿瘤女》中的宿瘤女者「項有大瘤⁴⁰」、《辯通傳·齊孤逐女》中孤逐女「狀甚醜⁴¹」，但是她們都具備異於常人的聰明才智，對國家的政治情勢及國君迫在眉睫的危難有深刻的瞭解，因而得到國君的賞識，成為王后或者國相的夫人。同時，這些國家也都因此獲得大治或者明顯的成就。將這些女子列入女兒形象群是因其主要事蹟是發生於未嫁之時，尚未轉變為妻子或者母親的角色。醜陋的女子其實等同於臣子的角色，孤逐女說：「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⁴²」。我們看到的是在君王身邊一個勇於直諫的忠臣形象，

³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宋恭伯姬》，頁 186。

³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孝孟姬》，頁 196。

³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趙津女媧》，頁 303。

³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鍾離春》，頁 314。

⁴⁰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宿瘤女》，頁 319。

⁴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孤逐女》，頁 324。

⁴²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孤逐女》，頁 325-326。

而不是一個追求愛情的女子形象。

其中《辯通傳·楚處莊姪》描述的也是在君王配偶當中的一個未婚女子形象，未提及樣貌，但她與這些醜女子們擁有共同一個特徵，就是「奇」，因其被立為夫人之時年僅十二歲，便能以「五患」、「三難」勸諫楚王，只能說她還是個女童，見識卻與眾不同，積極高舉旗幟為見君主，直陳國家的禍凶，使楚國得以復強立下大功。在劉向的敘事中，君王也具有超凡的能力，能夠當下就發現這些奇女子在外表之下的不凡才識，事實上是更偉大更具有非凡才能的人。

劉向他重德不重色，較不著重於「四德」中「婦容」的部分，甚至認為美色禍國，將焦點回歸於「禮治」的部分。「四德」出於《周禮·天官冢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九嬪」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其中職位較高的九嬪則需教導婦學，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婦德」指的是道德品行，「婦言」是需擇辭而說，不出惡語，「婦容」指的是相貌端莊賢淑，「婦功」則指治家之道，劉向《列女傳》中強調「婦德」，對「婦言」、「婦功」部分也多有論及，但對於「婦容」卻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鍾離春、宿瘤女、孤逐女等因面貌過醜而被世人幾乎嫌棄的女性，大力撰寫她們過人的奇才與極高的膽識智慧，甚至僅一次對話就打動君王，成為后妃，國家得以大治。醜女在劉向筆下，得以扭轉乾坤，憑藉治國之才改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不靠美色一樣得到君王的寵愛。

三、妻子形象群

妻子形象群是劉向《列女傳》中比重占最多的一個形象群，劉向尤為重視夫婦關係之和諧，他認為「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⁴³」，是對於「三綱」中特別是「夫為妻綱」的具體說明。在《列女傳》中，劉向塑造了很多妻子的形象，非常仔細的從各個角度去說明了「妻子」的理想特質與道德品行。以下分為幾類作為代表：

⁴³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楚平伯嬴》，頁 205。

（一）仁智的妻子形象

這類妻子具有很高的才智和德行，能夠以道匡夫、幫助丈夫成就功業。《賢明傳·周宣姜后》中「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⁴⁴」，引過自責，匡輔周宣王讓宣王醒悟，終成中興之名。《賢明傳·晉文齊姜》中齊姜通過說明成就霸業的道理，強勸公子重耳回國，「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⁴⁵」最後公子重耳果然統有了晉國，使晉文公得以稱霸。《賢明傳·周南之妻》中周南大夫的妻子不停地告誡丈夫勉勵王事不要懈怠。《賢明傳·齊相御妻》中晏子馬車夫的妻子通過舉例說道理，勸勉其夫不要自滿自驕，匡其丈夫學道謙虛。《賢明傳·楚接輿妻》中接輿妻安貧樂道，主張丈夫遠離家園、避開時亂，勸勉丈夫不要羨慕榮華富貴，丈夫聽從了妻子的意見，改名易姓，終不逢難。《賢明傳·楚老萊妻》中老萊子的妻子勸丈夫謝聘辭官，不要接受官祿，爲人所制，老萊子聽從了妻子的意見，隨其妻而居保安康。《賢明傳·楚於陵妻》中楚於子與妻子商量後拒絕出仕，沒有應聘赴任，亂世以避禍爲先。

《仁智傳·曹僖氏妻》中僖負羈的妻子慧眼識英雄，勸夫君好好對待落難公子重耳，等到公子重耳成就霸業後帶兵攻打曹國時，只有僖負羈所住的里巷受到刻石表彰，且家族都受到保護，可見其妻之遠見卓識，能明哲保身。《仁智傳·衛靈夫人》中衛靈夫人能聞聲而知人，懂得幫丈夫衛靈公辨別賢才。《仁智傳·晉羊叔姬》中叔姬勸丈夫埋了別人偷取送來的羊，最後得以避免禍害。《辯通傳·齊管妾媵》中妾媵善解〈白水〉詩，幫丈夫解析智者所說的隱喻，能參與謀事，使齊國大治。《辯通傳·晉弓工妻》中弓匠的妻子進見君王據理力爭，解釋丈夫做弓的辛苦以及射箭之道，使丈夫脫罪並且獲賞，其妻患難與共，救夫脫難。《辯通傳·齊威虞姬》中虞姬用言辭向惰政不理事的丈夫齊威王表白，反而害自己身受煎熬，在她忠心規諫列舉故事和道理以後，終於洗清自己的冤屈，威王也終於醒悟使齊國強盛。

⁴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周宣姜后》，頁 74。

⁴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晉文齊姜頌》，頁 84。

（二）賢明的妻子形象

在《列女傳》中，記載了很多發現丈夫行為不當，說理匡正其失，使之改過向善，成為婦德的楷模《賢明傳·周宣姜后》，因「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⁴⁶」姜后跟宣王說，因為她無德無才，才使得君王失禮而晚朝，顯得君王喜愛女色，而忘了德行。追究起因都是姜后自己的過失，所以在永巷聽候處分。宣王也因此開始把心思用到政事之上，成為中興之主。

《賢明傳·齊桓衛姬》中，「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因為桓公喜歡淫逸貪圖享樂，衛姬為勸勉桓公，便很注重自己的修養，不聽鄭、衛兩地不雅正的音樂。在《賢明傳·晉文齊姜》裡，齊姜勸勉已經灰心喪志的公子重耳返國，說：

《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

齊姜告訴重耳，一個人要是放棄追求，又如何達到目標呢？晉國的亂世總有一天可以平治，重耳一定可以保有晉國。後來雖然重耳還是不聽，不過齊姜設計使公子重耳返國，也就是後來的晉文公。文公最後迎接齊姜回國立為夫人，如果沒有齊姜，就沒有當時的晉文公，齊姜言行不懈，重耳才有後來的局面。

另有些賢明的妻子是在丈夫死後，讓丈夫的德行發揚光大的如《賢明傳·柳下惠妻》中柳下惠的妻子在丈夫生前與其談論在亂世如何自處才是符合君子的言行，並在丈夫死後為其作誄文，因為瞭解丈夫的長處和才德品行，文采之豐，「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⁴⁷」身為妻子能利用文筆讓已逝的丈夫的功德發揚光大，甚至連柳下惠的門生想改她的誄文作自己的，也無法改動其中一個字，可見柳妻所寫祭文之佳。著名的還有《賢明傳·魯黔婁妻》中黔婁的妻子在黔婁去世時，對曾子說「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

⁴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周宣姜后》，頁 73。

⁴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柳下惠妻》，頁 107。

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說黔婁為人安貧樂道、不求豐美，為丈夫諡號為「康」，十分符合仁義之道，曾子稱讚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⁴⁸」。也只有黔婁那麼有德行的人，才会有這麼有德行的妻子，可見黔婁妻也是能安貧樂道的賢婦代表。

（三）貞順節義的妻子形象

1. 從一而終：《貞順傳·衛宣夫人》中衛宣夫人嫁給衛宣公，到了衛國城門時，衛宣公就去世了，但她仍堅持嫁進衛國，並拒絕不改嫁後君。《貞順傳·蔡人之妻》她出嫁後才知道丈夫身患惡疾，她母親準備將她改嫁，蔡人之妻堅持不改嫁。《貞順傳·黎莊夫人》中黎莊夫人與丈夫沒有情投意合，興趣愛好也都不同，從出嫁後就未再見過面，雖然很不得意但是仍然不改嫁。

《貞順傳·息君夫人》息君夫人不和掠奪丈夫國家的楚王結婚，跟丈夫同日自殺。《貞順傳·齊杞梁妻》中杞梁的妻子在丈夫戰死沙場後痛哭十天，最後投淄水而死。《貞順傳·楚平伯嬴》中伯嬴在後宮被侵入時持刃護身，堅貞不從，冒死守節，拒絕被敵國國君所佔有。《貞順傳·楚白貞姬》中貞姬在丈夫死後辭退豐厚的聘禮，堅持守寡不改嫁。《貞順傳·魯寡陶嬰》中陶嬰主動作歌表明自己不再改嫁的決心，於是人們不敢再向她求婚。《貞順傳·梁寡高行》中高行容顏美好，丈夫死後，追求者眾，她割掉自己的鼻子，毀容守節，表示堅決不改嫁梁王。《貞順傳·陳寡孝婦》中陳寡孝婦用自殺來表示不嫁，專心養姑，守信、行義、立孝的美德。此外，還有堅守節操的《節義傳·蓋將之妻》，國家被滅亡後丈夫自殺被人救起，妻子卻堅守忠君的禮儀而自殺，潔而好義，不以私愛而廢公義的品德。

2. 以死守禮：《貞順傳·宋恭伯姬》中宮中著火，伯姬仍然嚴守禮儀，因保姆傅母不在而謹守宮內婦女的規矩，夜晚不出內室不肯逃亡，最後被火燒死。《貞順傳·齊孝孟姬》孟姬在遊玩時因車子狂奔而跌落，派來接送的

⁴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魯黔婁妻》，頁 110。

馬車又不符合禮法而試圖自殺。《貞順傳·楚昭貞姜》在江水猛漲淹沒貞姜所在的漸臺，而來接貞姜的使者又未帶上符信之時，貞姜嚴守禮儀、遵守誓約，最後被水淹死。

（四）維持家庭團結的妻子形象

1. 與夫家和娘家的關係良善：《賢明傳·齊桓衛姬》中衛姬望色請罪，勸阻桓公討伐衛國，實際上也保護了自己的娘家。《賢明傳·秦穆公姬》中穆姬設法解救被丈夫俘獲的晉君，也正是她的弟弟。我們可從中發現，很多婚姻都是國與國之間政治聯姻的結果，其中的政治意味非常明顯。以《仁智傳·許穆夫人》為例，許穆夫人就希望自己不要嫁到小小的許國而能嫁到強盛的齊國去。《節義傳·晉圉懷嬴》中懷公要逃回晉國，懷嬴在丈夫和父親之間怎麼做都不是，最後只好不跟隨丈夫回國但也不洩露丈夫逃跑的計策，這種方法被劉向用「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⁴⁹。可能作為政治聯姻中夫家和娘家之間的夾縫角色，也許最好的解決方式就只有這種方法了。

2. 與妻妾關係良善：《賢明傳·楚莊樊姬》樊姬薦進美人，與自己同處。《賢明傳·宋鮑女宗》中宋鮑女宗的丈夫另又娶妻，她仍舊不為變己，不僅繼續孝事婆婆，還送禮物給丈夫的新妻表示不妒嫉。《賢明傳·晉趙衰妻》中趙衰的妻子不但不嫉妒偏房，還讓偏房的孩子為嫡子。《貞順傳·衛宗二順》中妻和妾互相推讓的美德。《節義傳·周主忠妾》是唯一一篇描寫到妾的生存處境，主父妻子的隨嫁婢女知道夫人要在酒裡下毒害死主人，於是打翻杯子不讓夫人毒死主人。她夾在主人與正宮之間，想忠心保全主人性命，又不想損害夫人聲譽，結果自己反而受到鞭打的處置。

（五）惡妻形象

⁴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晉圉懷嬴》，頁 236。

惡妻形象全部集中在《列女傳·孽嬖傳》中，從《孽嬖傳·夏桀末喜》到《孽嬖傳·趙悼倡后》共十五個女性，作為君王和大夫的妻子，她們煽起動亂或導致一個國家毀滅敗亡，是最需要提防和隔離的女性角色。開頭三篇是禍害三王朝的末代王室的女性：末喜、妲己和褒姒，之後便描述一些不守禮儀、干預朝政導致動盪以及行為不檢、內亂、淫通等，淫亂禍國的妻子形象。在劉向《列女傳》這本首部為女性專門列傳的作品中，專列了這一章講述如此之惡妻形象，但後世的列女傳都取消了《孽嬖傳》的入傳，從這點上我們更可以說《列女傳》最大的特色就在於擁有《孽嬖傳》。

《列女傳》其他篇章中，除了宮中皇室女子之外，都還羅列了很多民間百姓的女性，可是單就《孽嬖傳》中只記錄了權力階層的女性，她們因為專擅後宮的行為造成權力鬥爭而至於讓國家陷入混亂，更甚至於造成亡國。雖然從表面上看是記錄這些女性違背禮儀的惡德醜行，但是我們卻能從文章中感受到，真正批判的是這些女子當時圍繞著政權所進行的爭權奪利。《孽嬖傳·魯莊哀姜》中哀姜驕淫危魯與慶父私通，甚至想要立慶父作國君。《孽嬖傳·晉獻驪姬》中驪姬想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太子，處心積慮設計讒毀太子。《孽嬖傳·魯宣繆姜》中繆姜與宣伯私通，與宣伯謀劃要專擅魯國朝政。

《列女傳·孽嬖傳》中的傳記都相當程度的簡化了惡妻的淫亂生活，因為重點並不在於關注她們為什麼要和別人私通，最重要的是描寫在惡妻所帶來的社會動亂以及權力鬥爭，對劉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寫出由女性介入權力所帶來的社會混亂與禍國殃民。

《列女傳》為古代婦女立傳之始，劉向將這些婦女羅列分類成七種類型，經過本節區分為母親、女兒和妻子三種家庭角色之綜合分析後，可知劉向對於「婦德」的高度重視，他撰寫了德行高超的賢女、輕己重義的義女、恪守禮法的貞女等，另外對於「才智」的女性也頗為稱道，其中有視見高明的才女、危難時辯才出眾、膽識過人、策略高超的智女等，對於「美女」的部分，則主要描述了她們

在道德上的缺陷以及所帶來的禍患，顛覆了一般對美女形象的期待，採用反面塑造的寫作方式，將美女與禍害合而為一，劉向對於「美色」是抱著相當警惕的態度。相反的，對於醜女雖然天生外貌不佳，卻因德行、才能突出而改變自己和他人，具有獨特、高尚的美德。總而言之，劉向對婦女這種多元女性形象的價值取向，包括她們的內治效應、道德修養、聰明才智、教育功能等，表明了婦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不是只有單純的家庭、婚戀角色而已。

第二節 《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

范曄的《後漢書》是首部將中下層女性的品德、行蹟以類傳的形式載入歷史的正史，具有首創之功，但在他之前，西漢劉向早已完成婦女專著《列女傳》，在立傳標準上劉向將「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類作為個別分類的立傳標準，每類選取一定的事蹟與人物加以闡述，而范曄在其《後漢書·列女傳》小序中云：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⁵⁰

范曄因一般典籍缺乏記載賢妃、哲婦、高士、貞女的事蹟，所以這幾大類是其《後漢書·列女傳》欲表彰的主要對象，從內容中也可見劉向的《列女傳》專著對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有不小的影響。在《後漢書·列女傳》入傳標準中，范曄雖然只提出了一條核心原則，即：「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但具體而言其立傳之女性形象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貞節類形象群

⁵⁰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列女傳》（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頁4715。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很早就對女性的貞節提出了規範和要求，而且是時間越久對貞節的要求越嚴苛，這點我們從以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⁵¹此類本文主要又分爲守貞、節烈兩種情況：

（一）守貞

指已婚的女性守貞的行爲，如自殘拒嫁的劉長卿妻桓氏，當她兒子五歲時丈夫去世，兒子十五歲剛行過冠禮後卻夭折，她說：

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已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52

她爲了避免遭受再嫁的窘境，就事先割下自己的耳朵表示決心，終身不再嫁。

（二）節烈

許升妻呂氏，其夫年少時早是賭徒，不務正業，操行欠佳，呂父多次勸其改嫁，呂氏都拒絕「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⁵³」丈夫終在其感化下力學成名，但又死於上任途中。後來呂氏遇賊寇，賊想要侵犯她，呂氏「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⁵⁴爲保持貞節而慘死於賊手。

二、孝順類形象群

雖然在很多正史《列女傳》中，均含有「孝順」類女性形象群，但具體的入傳事蹟類型又是隨著時間的演變而不斷變化的⁵⁵。在此類的女性形象中，一記述的孝婦、孝女可分爲以下兩種情況：

⁵¹ 劉燕，〈正史《列女傳》〉（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9。

⁵²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劉長卿妻》，頁4739。

⁵³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許升妻》，頁4735。

⁵⁴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許升妻》，頁4736。

⁵⁵ 劉燕，〈正史《列女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史學碩士論文，2011），頁9。

（一）以死殉親

如孝女曹娥，其父原是一個會祭祀占卜的巫祝，在一次迎神祭祀活動中不幸溺死，且屍體也沒有找到，當時「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⁵⁶」以她自己的死為父親殉道。還有孝女叔先雄，她的父親：

乘船墜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墜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⁵⁷

叔先雄為了父親的事故難過的連命都不想要，加上父親的屍體一直沒有打撈到，她把黃金珠寶首飾放在做好的繡花香袋中掛在三歲、五歲的幼子胸前，果然在百餘日之後在父親掉落之處投江而死，或許是孝感動天還是叔先雄真有神力，竟能找到父親的屍體，父女互相攙著浮於江上。這兩位孝女無論是已婚婦女或是未婚少女，皆是因父親死於江上，而哀痛投江自盡的孝女形象。

（二）為父報仇

如龐涓母趙氏，她父親被同縣豪強李壽所殺害，當時她的三個兄弟都已因病去世，仇人竊喜以為她只是名弱女子，無法替父報仇，於是趙氏飲恨十餘年：

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

⁵⁶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孝女曹娥》，頁 4734。

⁵⁷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孝女叔先雄》，頁 4743。

終於找到機會手刃仇人替父報仇，她砍下李壽的頭，拿到縣長面前，認罪伏法，緩緩步入監獄，縣長還因其義行，不忍心給趙娥判罪，棄官離去馳法縱之，趙氏仍堅持不肯苟且偷生的堅定意志。

三、恭順類形象群

在兩漢時，無論在家庭還是在社會中的女性，都擁有一定的地位，獨立性也比較強，而將這類女性的列入傳中，正也反映了當時及後世男權社會的需求。在此類傳中描述的恭順類女性主要可分為兩種：

(一) 恭順丈夫

鮑宣妻桓氏，雖然她娘家非常富有，但父親卻將她許配給自己的窮學生，結婚時桓家贈予豐厚的嫁妝隨行，但卻讓丈夫鮑宣擔心與不悅，桓氏知道後馬上表示：「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⁵⁹」，表示其願意侍奉丈夫聽從其意之心，隨即將侍女、衣服、飾物全部歸還並從夫穿著粗布短衣，提甕打水、下地勞作。

(二) 恭順公婆

姜詩妻龐氏，她先生姜詩是位有名的孝子，《列女傳》中云：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托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

⁵⁸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龐涪母》，頁 4738。

⁵⁹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鮑宣妻》，頁 4738。

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龐氏爲了婆婆出門汲水遇大風不能即時趕回，就因使婆婆口渴而被休掉，但即使如此龐氏仍借住在鄰居家，恩養孝敬婆婆更是用心，直到被召回。他們唯一的兒子因幫忙取水溺死，龐氏悲痛之餘，擔心婆婆哀傷而編了孫子到外地求學的理由。爲了婆婆愛吃切細的魚和肉，夫婦奮力勞作烹調供養，也是因此的孝心，房子旁邊竟然湧出像江水一樣味道的泉水，每天還有兩條鯉魚可以讓婆婆和鄰母吃。後來因其孝名傳到盜賊耳裡，整個村子因此逃過一劫。對於婆婆的特殊喜好，好飲江水、嗜魚鱸等，龐氏都是盡可能的滿足婆婆的要求，孝順婆婆的至真至誠感動婆婆、鄰里、盜賊和天地神明！

四、忠義類形象群

在所有正史《列女傳》中，很多史家都將其列爲了立傳標準之一，不過所收錄的事蹟類型卻並不相同，有的是爲國家、民族之大義而捨己爲人者，即大忠義；有的是爲丈夫、家庭或家族而捨身取義者，即爲小忠義；此處范曄撰寫的這類女性主要是屬於後者。

如危難時刻以己命換夫還的盛道妻趙氏，她丈夫盛道聚眾起兵事敗之後，夫妻倆被囚禁於一室之中，趙氏深明大義，告訴盛道說「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⁶⁰」她認爲依照的法律的刑責，一定沒有存活的希望，因此爲了保全家庭，她協助丈夫帶著兒子逃脫，而自己留守，等到盛道逃離走遠之後，據實告訴官吏，因而被殺。後來父子遇到大赦回家，盛道感念妻子的義氣，終身不再娶妻。

五、才賢類形象群

此類入傳者在《後漢書·列女傳》中無論在人數上還是所占比重上，均是第一，可見兩漢時期的才女能得到男權社會的充分肯定，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而

⁶⁰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盛道妻》，頁 4742。

這一點也是《後漢書·列女傳》與後世立傳標準的巨大反差。在此傳中一撰述的才女，她們充分利用自己的卓見才學、聰慧賢明，有的成爲丈夫的賢內助、有的則巧言維護了自身及家族的尊嚴、有的得到了世人的尊崇和後人的景仰，《後漢書·列女傳》中的班昭、蔡琰都是文學史上頗負盛名的才女，且范曄特別將班昭所做《女誡》七篇及蔡琰因感傷亂離，追懷悲憤所作之詩二章《悲憤詩》列入《後漢書·列女傳》中。

范曄著墨最多的就是中國第一位女歷史學家班昭。《後漢書·列女傳》中云：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當時人們把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婦女稱爲「大家」，因爲班昭爲曹世叔妻，所以世人稱之爲「曹大家」。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卻因爲竇憲案牽連，死於獄中，奉漢和帝之命，班昭在東觀藏書閣和馬續繼續整理、撰寫《漢書》的任務，班昭補撰了八表，和《天文志》，終於完成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但《漢書》完成後，因內容多用古字，不易閱讀，班昭在東觀藏書閣講解《漢書》，當時很多儒者知士奉詔跟她學習。和帝頗爲讚賞班昭的學識，多次被召入宮中，教授皇后和貴人們誦經讀史。後來和帝駕崩，皇子年幼鄧太后臨朝執政，班昭以師傅之尊，參議朝政，備受寵信。班昭之子也因此得到受封，官做到齊國的宰相。范曄在《後漢書》中列入班昭所做《女誡》七篇，本來是用來教導班家女兒的家教文字，不料京城世家卻爭相傳抄，不久之後風行各地。才學出眾的班昭真可謂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著述傳世的女學者，也是東漢女性的奇葩。

另外像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⁶¹」；又如袁隗妻馬倫—馬融之女「少有才辯」，與袁隗成婚當日，袁隗按當時禮俗刁難道：「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指馬倫姊姊尚未出嫁，妹妹先嫁是否會成為世人笑話？於是馬倫巧言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說姊姊只是尚未遇到好配偶，不像某些鄙陋之人，隨便找人就嫁。袁隗然後又用其父收受貨財遭到屬下彈劾其貪污這事問她，馬倫答道：「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察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她舉了孔子被毀、子路被控訴為例子，這回答也使得「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⁶²」袁隗終於因不能使妻子理屈而默不作聲，在帳外聽到的人也感到慚愧。此類所佔篇幅之大，可見范曄對才賢類形象的女性著墨甚多。

六、母德類形象

這分類撰述的重點是女性在母親角色中的品德體現，而前幾類均是女兒、妻子角色品德的表現，同時至此，女性一生中會經歷的「女兒、妻子、母親」三種角色的體現才一算真正的完備。雖然范曄這類女性品行記述的著墨不多，但卻同樣代表了對社會的宣導、及時代的特色。

程文矩妻李氏，她丈夫去世時給李氏留下了兩男和前妻的四子，李氏對四子格外溫厚、慈愛，衣食供給也常多於自己已兒子數倍，但四子仍總是憎恨詆毀她。有的人勸她說那四子如此不孝，何不到別地居住，遠離他們呢？她回答說：「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⁶³」後來前妻所生的長子病危，李氏親自調配湯藥照顧，使其病得以痊癒，最終能感化了他們，使他們改過自新成為了賢良之士。

經過上面的分析，《後漢書·列女傳》立傳標準為：「貞節」、「孝順」、「恭順」、「忠義」、「才賢」、「母德」六項，並列成以下簡表。

⁶¹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曹世叔妻》，頁 4730。

⁶²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袁隗妻》，頁 4736-4737。

⁶³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程文矩妻》，頁 4730。

女性形象	貞節	孝順	恭順	忠義	才賢	母德
人數	4	3	2	2	6	1
比率	22%	17%	11%	11%	33%	6%

(注：在歷代史傳中，史家記述的女性事蹟並不僅止於某一單項，因為同一人物可能存在交叉現象，但本文為彰顯特色之便，按個人看法取其所著重之主要人物形象，歸為某一類中。)

從上面的分析和表格當中，可以簡單看出《後漢書·列女傳》中女性形象不僅豐富多樣且活躍，「貞節」、「孝順」、「恭順」、「忠義」、「才賢」與「母德」等兼備，並且在部分程度上仍沿襲了劉向《列女傳》的女性形象，例如對於才華、賢智者的頌揚，對守貞、節烈的倡導，對為人子女孝順、為人妻之恭順、為人母親儀德的稱頌等。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從各類的人數及所占比重上相較之下，這一時期「母儀」類的女性形象並沒有占絕大多數，反而卻是「才賢」的女性形象佔有絕對優勢，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此時代的特點。

在兩漢時期，對婦女的貞節要求尚未十分強烈，婦女在婚姻中並沒有處於絕對附屬地位，丈夫重病、早亡或離婚後，婦女改嫁不僅能夠得到社會認同，且是為一件習以為常的事。當時上至皇室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普遍存在著嫁娶寡婦或離婚婦女的現象，如漢高祖的薄姬、漢武帝的生母皆有改嫁行為，但還是出現了很多婦女不願改嫁、再嫁或被其家人逼迫的現象，這點在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中也有明顯反映出來。

相反的，《後漢書·列女傳》對女子才學、賢智的稱讚和尊崇所占比重卻很突出，從整個《後漢書·列女傳》來看，這十八位女性中，除獨立因「才賢」入傳的王霸妻、樂羊子妻、袁隗妻馬倫、妻妹馬芝、蔡文姬、班昭之外，其他像是因為「忠義」入傳的盛道妻、因「貞節」入傳的陰瑜妻荀采等，在傳中更是多處提及其才華與智慧，如果以這樣算來，因才學、智慧而被稱頌者就幾乎占到一半左右。可見於兩漢時期，「女子有才便是德」，而「才女」也成為史家撰為列女的

女性形象之一，這一點相較後世《列女傳》女性形象來說，是有明顯差異的。（詳參第四章第四節相關論述）

第三節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列女形象比較

劉向《列女傳》以品行道德為標準，從上古以來至西漢的女性分為七大類，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其中前六類是正面意義的，最後一類是負面意義的。《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女性並沒有明確加以分類，范曄選擇女性人傳的標準大致上是承襲劉向《列女傳》的，且其傳序言「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⁶⁴」，可見也是以某一種道德品行為取捨標準的。詳加分析，便能見出二者在女性形象上的差別。

一、「母儀」類形象的比重不同

（一）劉向偏重后妃、母儀形象的描寫

劉向《列女傳》中設立「母儀」這一類，而且將它置於七大類之首，不僅只如此，在其他六類女性形象群體當中，母親形象群體所占的比例也相當大。「母儀」者，乃天下母性之表率，儀則為天下之典範。《母儀傳》中十七位女性，有君王將相之母，如姜嫄、簡狄、周室三母等，也有市井平民百姓之母，如孟軻母、芒慈母等，但無論是屬於哪一種身份地位的女性，她們共同特徵都是「善於德教」。她們有高尙的道德素養，寬宏的胸襟氣度，更重要的是她們用心於相夫教子，「胎養子孫，以漸教化」，如契母簡狄的「教以事理，推恩有德⁶⁵」；啓母塗山氏的「明教訓而致其化⁶⁶」；孟母三遷的「善於漸化⁶⁷」、「處子擇藝，使從大倫

⁶⁴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列女傳序》（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頁 4715。

⁶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契母簡狄頌》（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5。

⁶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啓母塗山》，頁 16。

⁶⁸」；魏芒慈母的「慈惠仁義，扶養假子⁶⁹」……都是此類自身道德修養高尚且又「善於德教」的偉大母親群體培育出歷代明君、賢相，聖人、君子，成就他們開疆闢土、太平天下的宏偉功德。在《列女傳》裡，劉向對於母親類群體的撰述，儘管仍舊是將她們置於帝王將相、聖人君子的背後，將她們的自我價值實現依附於這些人的價值基礎上，但卻也客觀的肯定女性特殊、獨立的人格，並且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二）范曄偏重賢明、節義形象的描寫

相形之下，《後漢書·列女傳》中，「母儀」類形象群體卻消退了，取而代之的「賢明」類形象群體和「節義」類形象群體顯得突出。《後漢書·列女傳》共列敘了十八位東漢時期的特殊女性，其中涉及母親形象的僅一人（漢中程文矩妻），且也完全可以將其列為「賢明」類形象群中，然而可列入「賢明」、「節義」類的女性數量卻達十餘位，幾乎佔全部入傳女性的三分之二。「母儀」指的對象是母親形象群，而「賢明」、「節義」、「貞順」所指的對象卻主要是妻子形象群。

70

二、「節義」類形象群的表現不同

（一）劉向著重能深明大義，捨己為人

在劉向《列女傳·節義傳》中的女性多深明大義、能為公義而捨私利，乃至於有「殺身成仁」的形象。如《楚成鄭瞽》、《楚昭越姬》、《蓋將之妻》中，這三位女性為國家大義、君臣之節而以死勸諫丈夫；而《魯孝義保》、《魯義姑姊》、《梁節姑姊》中，這三位女性則在生命極為危殆時「明不私己」、大義滅親，毅然而然捨棄自己的親生小孩以保全別人之子；另外在《邠陽友娣》、《京師節女》當中，兩位女性在孝義不能兩全的困境下果敢赴死，真正的捨命求全……總結而論，劉

⁶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鄒孟軻母》，頁 53。

⁶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鄒孟軻母頌》，頁 59。

⁶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魏芒慈母頌》，頁 67。

⁷⁰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頁 368）。

向《列女傳·節義傳》中的女性都具有全義守節的道義精神。當義和節受到侵犯，或者與孝道、仁道產生衝突時，這些女性能展現出至剛至烈的自我犧牲之精神。

（二）范曄著重「殉父」、「殉夫」的犧牲精神

《後漢書·列女傳》的傳主類型當中，最有人格色彩和悲情意味的就屬於「節義」類型。且「節義」類形象群在《後漢書·列女傳》中所占的比列相當大，十八位女性裡有七位可劃歸其中。

《後漢書·列女傳》中的「節義」類形象相較於劉向《列女傳·節義傳》產生了很大變化。在七位節義女性中，只有周郁妻（因婦道和孝道之間的衝突自殺）和皇甫規妻（誓死捍衛國家大義和人格的尊嚴被誅）是劉向《列女傳·節義傳》中曾出現過的女性形象類型，其他五位女性的節義的表現則體現在「殉父」、「殉夫」等行為舉措之上——如手刃父親、丈夫的仇人（龐母、許升妻），或追隨父亡投江而死（孝女曹娥、孝女叔先雄），或者以死代替丈夫受牢獄之禍（許盛道妻）。

因此兩者比較之下可以看出，劉向《列女傳·節義傳》中多節義類之母親形象，她們的義行主要在於她們能深明大義，捨己為人。而《後漢書·列女傳》中多節義類之女兒形象，他們的義舉是在於至貞至孝，願意捨命以守護父親、丈夫的尊嚴。死亡對於這些節義女子而言，不僅顯現出其人格的至剛至烈及行為的豪情悲壯，更體現著傳統社會中女兒對父親、妻子對丈夫的單方面的奉獻和無條件的犧牲。表面上，死亡因其崇高性和悲劇性雖然突顯了「孝行」和「義舉」，但實際上是強化了「孝行」和「義舉」背後隱含的父權、夫權的絕對合理性和無可動搖性⁷¹，或者是《列女傳·節義傳》中的節義類母親形象群表現的較為隱蔽，而《後漢書·列女傳》中的節義類女兒形象群表現的較為明顯罷了。

三、「才辯」類形象群的方式不同

⁷¹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頁 368）。

（一）劉向偏重巧辯解危困與以辯才治國

《列女傳·辯通傳》中的女性以「善辯」著名，以「隱喻」解決難關，不僅伶牙俐齒又膽識過人，常常是靠逞口舌之「辯」而得以進退從容，替自己及家人（常是「父」、「君」——國君、夫君和兒子等）消災解禍，如楚江乙母的以小喻大使兒子得以恢復官職，晉弓工妻據理力爭救夫脫難，楚野辯女以辭免去自己被鞭打之苦，趙津女媧進諫趙簡子勿殺無辜以救父，佛肸之母用言辭感動趙襄子救子，齊傷槐女奔走說理救父，齊女徐吾因家貧會燭夜績善用辭令感動臨婦一起合作不加嫌棄，齊太倉女以一言而廢除父親肉刑之苦等。

另一種《列女傳·辯通傳》中的女性為有德有才，文辭辯通，能撥亂反正，為國為公現身說法。如齊管妾媵參與謀事使齊國大治，齊威虞姬譏刺齊威王惰政使齊國大治，鍾離春為宣王陳述國之四種危機使齊國大定，齊宿瘤女進諫閔王以仁義自飾，一年間就讓強國震驚，齊孤逐女進見齊襄王縱談國政，才三天四方賢士多歸向齊國，楚處莊姪以「五患」、「三難」勸諫楚頃襄王使楚復強等。

（二）范曄偏重文才

沿襲劉向《列女傳·辯通傳》中「才辯」類女性群體的分類方式，《後漢書·列女傳》收錄了六位「才賢」類別的女性。但十八位女性中，除獨立因「才賢」入傳的王霸妻、樂羊子妻、袁隗妻馬倫、妻妹馬芝、蔡文姬、班昭之外，其他像盛道妻、陰瑜妻荀采等，在傳中亦有提及其才智，所以在《後漢書·列女傳》因才學、智慧而被稱頌者就幾乎占到一半左右。但《後漢書·列女傳》中的「才賢」型女性與劉向《列女傳》中的「才辯」類女性有很大的變化，她們不僅止有「辯」才，更勝於文才，像班昭和蔡琰均因為文學上傑出的才華而被當世所器重，《後漢書·列女傳》亦不惜篇幅和筆墨的專錄了她們的傳世作品，可見范曄對其在文學上的表現和影響是充分肯定的。

四、「才辯」類形象群的範型比較—以緹縈、班昭、馬倫、蔡琰為例

(一) 緹縈

劉向《列女傳·辯通傳》中至今最耳熟能詳的就是緹縈救父的情節，台灣已故著名作家高陽改編成小說《緹縈》，添加了很多豪俠色彩，將弱女子冒險犯蹕的歷史盲點描述得有聲有色。1970年李翰祥導演將之改編搬上大銀幕，當年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主演的甄珍也在稍後的亞洲影展裡奪得最佳女主角獎，可謂將緹縈的孝順與機智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劉向《列女傳》中，緹縈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⁷²

她以「人死不能復活」、砍斷手腳就「無法改過自新」等論點，加上她願意入身為官奴，為父親換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因為她的膽識與真烈的情懷，以及其上書之文辭中句句懇切，靠言語的力量感動漢文帝施加仁德，永久廢除殘忍的鑿頭、抽肋骨、砍腳等肉刑，以剃髮、鞭打、束鐵圈替代，使平民百姓皆大歡喜，用一言就把事情處理得兩全其美，因此緹縈能萬古流芳，成為後世孝道的典型。班固《詠史》詩讚曰：「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⁷³」值得注意的是才十幾歲的「少女」緹縈就能上書帝王，並且言語得體，文辭感人的事實。如果緹縈完全沒有文化，她的上書對皇帝就不會形成這麼大的感染力，更不可能使漢文帝被她至情打動，劉向《列女傳》中寫出緹縈不僅能讀書，而且還能寫作的史例。

另外，在《後漢書·列女傳》中入傳的才女班昭、馬倫和蔡琰這些都是漢代立經學博士以來，儒學世家之中，因家學淵源深厚所薰陶出來的女子——馬倫和馬芝的父親馬融、班昭的父親班彪與哥哥班固、蔡文姬父親蔡邕都是當代大儒，

⁷²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齊太倉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337。

⁷³ 曹道衡選注，《兩漢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87。

雖出身高貴、家教良好，但在她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個性特質卻迥然不同。

（二）班昭

班昭是賢妻良母的典範，她的存在顯示封建社會儒家禮教對於女性合乎理想的規範效果⁷⁴。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⁷⁵

指婦女必備的德行、言辭、容貌和技藝，這是班昭的女教著作《女誡》中提出對女性的道德規範，是「四德」最早出現的雛形。作為「三綱五常」的儒家禮教傳統中浸潤出來的女性，她自己能深合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儒教體系下成功教導出來的優秀女性代表。

父權的鞏固使得那些具有文化素養的上層婦女思考生活的新策略，她用自己的經驗諄諄教導女兒輩如何在既定的生活空間中適應生存，在不利的環境中以謙德忍道在丈夫中站穩腳跟。⁷⁶

顯然的，班昭的表現不止在夫家站穩了腳跟，也能在傳統封建社會中站穩腳跟——不僅接續並完成父兄未竟之修史工作，且被漢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

⁷⁴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頁 369。

⁷⁵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曹世叔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頁 4727。

⁷⁶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頁 369。

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⁷⁷」。

（三）馬倫

與班昭形成顯著差異的是另兩名才辯型女子——馬倫與蔡文姬。馬倫富有辯才，學識廣博，機靈犀利，面對丈夫的詰難表現得不卑不亢，應對從容且氣勢凌人，與班昭所期望的「卑弱第一」格格不入。班昭強調夫婦之道應：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⁷⁸

「夫婦之道」是人倫之大節，關係重大，影響深遠，丈夫若是沒有德行，就無法引領妻子，失去威嚴；妻子若不賢德，就無法輔佐丈夫，失去道義。所以男子教育雖然重要，但女子的道德教育更是迫切必須的。在《後漢書·列女傳》中馬倫的丈夫無力「御婦」，馬倫也不賢於「事夫」，二人是並不合於班昭所謂的「夫婦之道」，但是《後漢書·列女傳》卻謂「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⁷⁹」，可知馬倫見重於當世，乃是由於其才辯之長，並不涉及婦道。

（四）蔡琰

如果說馬倫對丈夫的挑戰是在言語與威儀層面，那麼蔡琰則是在表現於倫理層面。

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⁸⁰

⁷⁷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曹世叔妻》，頁 4720。

⁷⁸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曹世叔妻》，頁 4725。

⁷⁹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袁隗妻》，頁 4725。

⁸⁰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董祀妻》，頁 4744。

蔡琰有過兩次婚姻，又被胡人虜獲為妻且生下二子，於道德倫常不合，但因其「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⁸¹」依舊為當時和後世所敬重推崇。

在《後漢書·列女傳》中班昭與馬倫、蔡文姬三位「才辯」型形象群的衝突，隱現的是漢代，儒家正統思想與民間遺風習俗間的衝突與矛盾，還有范曄的女性觀之開放性。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改革政策提出之後，在孝武帝的支持下開始實行。此後，儒家思想就成為漢代官方的正統思想，但是思想要改變、觀念要普及向來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況且已生根於民間、在百姓生活當中，加上歷朝留下的遺風習俗的普遍，它們不時衝突著新思想的接受。因此，儒家女性觀才剛成形的兩漢社會，女性的空間還是比制度所訂定的還寬裕。

五、婦女觀之比較

在劉向編寫《列女傳》的初衷「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⁸²」，當時宮中風氣都如此，更何況是民間？劉向本身為「獨尊儒術」的實踐者，當然無法忍受這種風氣日盛，因此將國家的興亡和女性的「賢貞」和「孽嬖」之關係加以連結，而隻字不提皇帝自身應有的作為和責任，正是劉向身為漢代大儒在維護漢朝統治之基礎時對於女性的利用方式——

試圖將女性從儒家象徵性社會秩序中驅逐出去，將她們安放在家庭和閨房之中，以此來穩定兩性關係的地位，並確保封建血緣宗法制統治的穩定和長治久安。⁸³

劉向以提倡婦女「三從」、「四德」，是對婦女進行儒家思想「禮治」的最現實、最直接的手段。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桎梏的道德行為。它強制婦女絕對貞順，所謂「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⁸⁴」，《列女傳·貞順傳》、《列女傳·節義傳》就有

⁸¹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董祀妻》，頁 4744。

⁸²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楚元王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6），頁 1957。

⁸³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頁 369。

⁸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宋鮑女宗》（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95。

這樣的貞女順婦。它還強制婦女主「內治」、盡婦職，即「精五飯、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等等，可見劉向侷限的婦女觀。

比起劉向，身處劉宋時代的范曄則較寬容。如前頁所分析的，班昭與馬倫、蔡文姬三人道德行爲頗有差異的女性均列入《後漢書·列女傳》，足見他在婦女觀上的多元和開放性，這可能是受魏晉以來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口號引起之社會風氣所造成——正統儒家思想受到挑戰，老莊思想中追求個性與自由的人格被大力推崇，成爲當時的任誕習氣——范曄在這種風氣中成長，他雖然博學多聞，且善於談理，但也繼承了魏晉士人任性行事與恣情作風，從范曄每次的貶謫遭遇都顯出他個性的拮据不羈和風流狂放。以儒家思想爲基礎的儒家禮教受到質疑，自然對婦女觀有相對的影響，因此馬倫對丈夫言辭上的反駁不會被認爲是不合夫婦之道，蔡琰再嫁再生也掩蓋不了文學上的表現。

總之，范曄對於女性儘管擁有較多元的婦女觀，但當然不可能沒有限度，不會因此就全然拋棄儒家正統禮教對於女性的角色規範。漢代的女性們雖然擁有了較多的生存空間，也以更多樣貌的女性形象表現於世，但「三從」、「四德」似乎是她們永遠無法逃開的枷鎖，這就是劉向和范曄在女性形象上的最大共通處。

第四章 劉向《列女傳》與《後漢書·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影響

本章將分析劉向《列女傳》的學術成就與在史學和文學上的價值，以及范曄《後漢書·列女傳》的在史學、文學上的學術成就與賦予女性的歷史地位，最後，分別探討兩人之《列女傳》對後世廣大深遠的影響。

第一節 劉向《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價值

劉向編撰的《列女傳》是一部專門記述女性事蹟的傳記類小說作品，由於其開創了中國古代各種女訓類書籍的先河而著稱於世。《列女傳》之學術成就很高，且具有不小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以下分爲幾點作研究與探討。

一、創立獨立且單行於世的人物傳記體例

劉向《列女傳》的最大貢獻，就是對於正史編撰體例的突破與創新¹。劉向編撰的《列女傳》對司馬遷《史記》中所創立的紀傳體作了很大的突破與創造性的發揮。眾所周知，司馬遷《史記》屬於紀傳類數一數二的歷史著作，其紀傳體不僅僅是「列傳」，還包括本紀、世家、表、志共計五種類型。劉向編撰《列女傳》時，不是僅止仿效《史記》的「列傳」體例，而是有意識地把「列傳」從正史中抽出並剝離開來，使其成爲一種單獨而獨立記述人物的文體。這種編撰方式的獨創意義在於：劉向首次突破《史記》五種體裁不可分割的整體模式，讓紀傳體能夠單獨成爲一部書，從而得以單行於世。「他應是第一個運用此新體裁及敘事方式，脫出補續《史記》的範疇而別辟新領域者，所著《列女傳》——第一部婦女通史——即是代表。²」雷家驥先生對於劉向創立《列女傳》如此新穎且獨

¹ 陳東林，〈劉向《列女傳》的體例創新與編撰特色〉《明清小說研究》第80期（2006），頁139。

² 雷家驥，〈兩漢至唐初的歷史觀念與意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5。

特的單行本人物紀傳體例，深表贊同。

中國歷史中的傳記包括兩大主要類型：一是正史列傳，二是雜傳。如果我們詳細加以區分，相對於正史的列傳而言，劉向《列女傳》當屬於雜傳。從傳記類文體的編撰與發展史來看，《列女傳》確實是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部雜傳。劉向的大膽突破與創造，造就了雜傳文體樣式的最終形成，且直接促成了人物傳記創作的興起。由於記述人物的傳記能夠單獨刊行於世，這樣豐富了史傳文學的表現能力與方式。「從漢代正史列傳的輝煌燦爛到魏晉南北朝雜傳的興旺發達，劉向的《列女傳》起了橋樑作用。³」

劉向《列女傳》共 105 篇，各自以婦女之名命篇，自成一獨立個體，所記載的婦女故事，成為脫離經、紀而能獨立成書的單行傳體新體裁，這種單行傳體新體裁很受後來史家的喜愛，它通過對人物生平事蹟的描寫及對其思想性格特色的剖析，反映當時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並表現出作者的政治思想，從觀念上啓示人們即使不上朝參政，也可通過史書的編撰對社會和歷史發展產生影響與發生作用，因五，該書一出現，就受到大多學者的重視和推崇，如班昭爲之注釋⁴，馬融爲之訓解⁵。這種單行傳體新體裁後來還得到統治者的青睞，因爲它便於統治者褒獎人物，推行禮教制度，所以，此書出來不久，遂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提倡，各種單行傳體史書不斷湧現，據《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的各種單行傳體史書共 217 部，1286 卷⁶，這些雜傳有列女、先賢、良吏、高士、名士、文士、高僧、集仙等，它們有些以地域爲限制，專記一區域人士，又有些以言行爲分類，專錄某一類人物，如嵇康的《聖賢高士傳》、皇甫謐的《高士傳》和《列女傳》以及葛洪的《神仙傳》等都是非常著名的雜傳，可見，劉向《列女傳》對後世史書影

³ 張慧禾，〈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1998），頁 83。

⁴ 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錄云：「《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曹大家即班昭，班昭注今亡。

⁵ 根據《後漢書·馬融傳》云：「融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⁶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頁 151。

響之大，單行傳體成爲中國古代史籍的一個重要體裁，單行傳體史書也成爲中國古代史籍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一點劉向編纂之《列女傳》功不可沒。

二、具有進步的政治思想

劉向的《列女傳》在思想上，以歷代史實爲鑒，勇敢針貶時弊，具有進步的政治傾向和思想傾向。劉向的時代，正是西漢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階段，一方面統治階級與廣大群眾的矛盾日益激烈，另一方面朝廷內部亦是政治昏暗，由於宦官、外戚的專權，皇室大權旁落。劉向是皇族後裔，因出自對劉姓皇室的忠心和對當時政治的不滿，他多次上書直言，抨擊宦官與外戚的不當，希望能夠鞏固及捍衛劉氏政權，因此在政治上受到了當權者的打擊和迫害，而被誣陷入獄，更還險遭不測。但是劉向並沒有因此被擊垮，眼看自己在政治上已難以施展抱負，劉向便將心力轉而治學，希望透過自己的著書立說，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對現實社會產生有益的影響。

基於這樣的寫作動機，劉向《列女傳》在思想內容上具有很多的進步因素。例如，在《列女傳·辯通傳》的人物描寫中，劉向特意寫了一個相貌醜陋但卻有治國才能的醜女鍾離春：

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讎，流棄莫執。⁷

可以看出，鍾離春既高且大，還有喉結，具有男性的特徵。她還脖子粗大、頭髮稀少、弓腰、雞胸、皮膚像漆一樣黑，真可說是一個「極醜無雙」的女子！因此，年已四十，想要出嫁卻沒有人要，到處流浪也沒有人管。劉向採用了鋪排的手法，極力刻畫了一個醜到極致的女子，在相貌描寫注重筆法精簡的整個《列女傳》中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就是這樣一個相貌醜陋無比、嫁不出去的女人，卻能夠當著齊宣王的面，痛陳國難，指斥時弊，抨擊腐敗，使齊宣王幡然悔悟，採取強國安民、抑制腐敗的政治措施，最終實現了國泰民安。劉向因此在書中稱讚

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314。

道：「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⁸」這則故事，帶有理想化的色彩，體現了劉向希望任人唯賢、禮賢下士和唯才是舉的政治主張，也表明了劉向對腐敗政治的不滿和反抗。《列女傳》一書，類似這樣有進步政治思想傾向的作品還有很多。如《辯通傳·齊管妾媵》，寧戚擊牛角而商歌，並說了句「浩浩乎，白水！」⁹齊相管仲不知是什麼意思，齊管妾媵就告訴他這是古代的「白水之歌」，寧戚的意思是想在齊國求官。她向管仲提出「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的識才、用才標準，並且通過伊尹、呂尙、皋子等人的故事，講了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道理，使管仲深受啓發，使寧戚得到重用，收到「齊國大治」的效應。這樣的聰明才智，並不比一國之相差。他經常藉由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表現儒家仁治與德治的治國理想，強調重教化、省刑法，反對統治者對下層人民進行殘酷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和軍事鎮壓，主張緩和階級矛盾，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營建一個國家安定、民有所樂的社會環境。正如有研究劉向的學者指出的：「今考向言禮，主於儒家德治，而反對用法家苛暴之政，於儀文制數，殆罕言之。而所著詩書，特重躬行踐履之實，此禮之大者也。」¹⁰」這是雖然就劉向的《說苑》而言，但在《列女傳》裡，仍可發現劉向深厚的儒家治國理想。

劉向《列女傳》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思想，對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政治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因而此書受到了歷代學者和思想家的稱讚，備受文人學士的重視和推崇，故歷代均不乏仿效《列女傳》的著作問世。

三、多元化的婦女角色標準

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以女性為題材的傳記類小說作品，「劉向所著的《列女傳》，兩千多年以來，對人們的思想及社會倫理道德觀念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¹¹」《列女傳》有其獨特的進步意義，這不僅與劉向進步的思想觀點有直接的關係，而且也與劉向對於「列女」的取材標準有關。

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316。

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280。

¹⁰ 許素菲，《說苑探微》（臺灣：太白書局，1989），頁 31。

¹¹ 任芬，〈劉向《列女傳》及其現實意義〉《中華女子學院學報》（1998 年第 3 期），頁 62。

劉向在《列女傳》中雖然主張婦女必須遵守封建禮教，但卻並沒有把遵守封建禮教強調到十分絕對化的地步。例如，劉向在編撰《列女傳》的過程中，大膽拋棄了名目繁瑣的封建道德教條，突破了單一的封建道德標準，只要婦女有一善之舉或一技之長，都可入傳，都可以加以歌頌，並不要求婦女對繁瑣的封建教條事事遵循、條條守規。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劉向對封建的貞節觀和節烈觀並不怎麼重視，書中《貞順傳》、《節義傳》兩篇只收錄節烈婦女十餘人，僅占全書人物的百分之十左右，這在封建禮教高高在上的社會環境中，是難能可貴的。劉向將入傳的婦女分類為七種類型，即「母儀」（匡夫教子的賢妻良母）、「賢明」（通達事理、明辨是非的婦女）、「仁智」（有膽識才智的婦女）、「貞順」（恪守禮教的婦女）、「節義」（躬行節義的婦女）、「辯通」（能言善辯、從容應變的婦女）、「孽嬖」（荒淫無道的婦女）等等。這種分類，除《孽嬖傳》外，是對婦女的一種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包括她們的道德修養、聰明才智、教育功能、內治效應等，表明婦女充當了社會政治生活的角色，而不是單純的家庭、婚戀的角色了。如果按照封建道德標準的常規，這些人即使再有才能、事業上再有建樹，都是不能被列入女教類的書籍，成為後世之楷模的。但是，在劉向的《列女傳》中，她們卻能夠受到讚揚和推崇，甚至被作者視為女性的典範而加以褒揚。劉向的這種多元化的取捨標準，與後世文人在編修書籍時著重「節烈」作為衡量女子德行的唯一標準相比，無疑具有很大的獨到性。

《列女傳》突破了漢代封建道德標準，只要婦女有一善之舉或一技之長，都可入傳，都可以被加以歌頌，且成功的刻畫了多元豐富的女性形象，徹底抓住的人物的特色與性格角色，實為其寫作特色之一。

四、結合編輯與創作且巧妙融合學問與藝術

劉向《列女傳》既不是一部純粹的史料蒐集和典籍重整的編著，也不是一部純粹創作書寫出來的小說，而是一部編輯與創作相結合的傳記類古代小說作品。在劉向編集《列女傳》的過程中，編輯加工過的史料部分構成了該書的主要架構，

而那些屬於文學創作內容的文字，雖然在文字數量上較少於前者，但卻也佔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列女傳》的內容實際上融編輯與創作為一體，並且將學問與藝術較好地結合起來。

我們可以看出，《列女傳》中的人物故事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前人的經傳、史傳和諸子，二是來源於劉向在歷年校書過程中記錄的多種異文，三是來源於古代傳說和民間故事，四是來源於當時漢代的真人真事。¹²值得讚許的是，劉向在編寫這些人物故事時，無論對哪一種類型的資料，都沒有原樣照搬照抄，而是進行細心的加工、潤色、編輯乃至創作，因此，《列女傳》中的大多數人物故事既非出於作者的杜撰，亦非全由於人物史料的實錄，而是一種新的創作手法，是編輯與創作混合在一起的產物。這種寫法的優點是，故事既具有真實性和歷史時代感，且具有藝術感染力，因此人物形象特別具有鮮活的特性和突出的個性。

由此可知，《列女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劉向在這本全部以女性為傳主的史書中，為了刻畫女性人物，運用了很多獨特的人物描寫手法，以下列舉幾點做說明：如成組塑造女子形象，描寫女性外貌、心理、言行等。在這些描寫中劉向善於抓住其與男性不同的性格特點加以描繪。

（一）分類編排女子群像：

劉向重新分類編排，將百餘名女子分為七種不同的群組，並相應地塑造了七組女子形象。每組十數個女子有相近的性格特點或事蹟，如《母儀傳》塑造的是一組母親形象：她們都可作為母親的典範，言行事蹟合乎禮儀，教導兒子從小明白事理並且養成良好端正的品德，最終促使兒子成就一番事業。另外幾類有通達事理的妻子、終不更二的貞婦、必死無避的義女、孽嬖亂亡的淫婦等。雖然產生在《列女傳》之前的《史記》早已設有類傳這類，如《儒林列傳》、《遊俠列傳》等，但它塑造的全是男子群像，如此分門別類地塑造女子形象，劉向是首創。不

¹² 陳東林，〈劉向《列女傳》的體例創新與編撰特色〉《明清小說研究》第 80 期（2006），頁 139。

僅如此，劉向還能在同一分類中，做到同中有異，即在同類題材的女子中寫出她們的細微差別。例如同是勸諫丈夫遠行避禍的隱士妻子，《賢明傳·楚接輿妻》中的楚接輿妻是安貧樂道，「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¹³」，對丈夫出朝執政一事循循善誘，勸勉丈夫不羨慕榮華富貴的德行；而《賢明傳·楚老萊妻》中的楚老萊妻卻是果斷堅定，不「為人所制」，聽說丈夫已答應出朝執政，她「投其畚菜而去。……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¹⁴」描寫其匡夫辭官保住安康的果斷行跡，兩篇題材基本相同，塑造出的人物卻迥然相異。

（二）傳神的肖像化女性外貌描寫：

曆史著作通常很少描寫人物的外貌特徵。儘管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對人物的外貌、身材作了描述，那也僅只是些白描般的粗筆勾勒。至於司馬遷筆下描寫女性人物形象的文字，更是寥寥可數。劉向在《列女傳》中第一次對女性角色的外貌作了仔細描繪。如《仁智傳·晉羊叔姬》中羊舌子之妻勸兒子叔向不要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美女，理由是很美的必然有很醜的地方，並舉從前仍氏生的女兒為例，文中用「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¹⁵」來描寫仍氏女的美貌。《孽嬖傳·夏桀末喜》中的末喜，劉向描繪她是「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¹⁶。簡單的幾句話，雖然是抽象的描繪，但不難體會末喜是個行邪心狹的怪異女子。又如《孽嬖傳·陳女夏姬》中的陳女夏姬，「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¹⁷」刻畫出一個嬌豔迷人、技壓群芳、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婦女形象。當然，劉向的肖像描繪除了前兩頁提到的鍾離春之外，其他的都有簡單描述，雖不算多，但他畢竟已經注意到外貌描寫對凸現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還是了不起。而且這些相貌描寫在古代傳記文學史上出現較早而且較為成功的。

¹³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15。

¹⁴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19。

¹⁵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56。

¹⁶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344。

¹⁷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373。

（三）細緻的女性心理描寫：

在《節義傳·珠崖二義》中，劉向對珠崖縣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二人的心理描寫：兒子將珠子置於母親鏡奩中，母女均不知。按當時法定，藏帶珠子由珠崖（今海南島）到大陸入關是犯法的。犯法當斬，引出二人推讓爭死一節：

女名初，年十三。……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妾當坐之。」¹⁸

初擔心繼母獨自攬下罪過，看看左右，立刻說是自己應該承擔罪責的理由；繼母以為初講的是事實，但愛憐她年少喪父，也爭著說自己當斬。劉向用一個「恐」字、一個「憐」字，細膩地描繪出兩人此時的心思和情態，精細的刻畫出母賢女孝兩個形象。再如《辯通傳·齊傷槐女》中寫衍（人名）的女兒婧得知父親碰巧因為喝醉酒傷害了槐樹，觸犯齊景公「犯槐者，刑！傷槐者，死！」的法令後，「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¹⁹」。一個「懼」字寫出了婧既害怕又為父親性命擔憂的複雜心態。儘管《列女傳》的心理描寫與西方傳記文學相比，比重很少且極其簡括，但對塑造人物形象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藉由生動的夫妻言行刻畫女性角色：

在我國古代傳記文學中，通常肖像描寫、心理描寫所佔的比重都不大，因為在刻畫人物時，作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人物的言談和行止上，這是我國大部分傳記文學的共同特點。與以往史傳不同的特點是，《列女傳》在寫人物的言行時，特別描寫出夫妻生活之間的活潑可愛處²⁰。如在《仁智傳·衛靈夫人》中，衛靈公與夫人有一天晚上夜坐宮中，聽見車子移動發出的聲音到宮闕門時便停止下

¹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268。

¹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291。

²⁰ 張慧禾，〈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第 5 期），頁 84。

來，過了關門又響起來，夫人據此判斷此人是蘧伯玉。（因為按禮規定，爲了表示尊敬，大臣行至國君宮室門前要下車。）衛靈公派人查看一下，果然是伯玉。接下來寫夫妻言行：

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²¹

夫妻一系列動作與言語，因一「戲」字而添了盎然生氣。兩人之間一個小小的玩笑，栩栩如生的表現了衛靈公與夫人間那種親暱和睦的夫妻關係。

另外，因劉向是一位學問極爲淵博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又由於劉向在編撰《列女傳》時，廣泛地搜羅並涉獵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和文獻資料，所以《列女傳》是一部書卷氣濃厚、學問很豐碩的作品，這與一般的世俗小說有著很大的不同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列女傳》亦可以當作一本普及性的女性史學著作來讀。但又由於《列女傳》在細節上和人物角色的形象塑造上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文學欣賞的價值，因此，《列女傳》又可以當作一部文藝性的小說來欣賞。基於《列女傳》這些特點，這本書的確可以稱之爲結合編輯與創作且巧妙融合學問與藝術的一本佳作名著。

五、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

《列女傳》在史學著作內容上開啓了婦學著作的新題材，爲婦女爭得了史學中的一席之地。劉向《列女傳》專以婦女爲記載主體，所載之人有嚴守婦道的烈女、有通才卓識的才女、有言行怪異的醜女、有身懷治國本領的巾幗女英雄、有行俠仗義的義女、有禍國殃民的妖女，它第一次統整地把婦女事蹟分門別類地載入史冊，全方位地記載了從遠古的傳說時代到西漢中期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女性事蹟，成爲迄今所知第一部專載婦女言行、事蹟的通史與專史，從此婦學成爲史學

²¹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 147。

著作一個重要內容，開闢了史學著作的新題材，之後，史家逐漸注重對婦女的記載，隨時綴錄，代不乏人，如《魏書·列女傳》在序中所言：「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²²」，魏收於《列女傳》序只提劉向、杜預兩家，足見劉向、西晉杜預的列女傳記專著是同類作品的代表作，西漢的劉向明顯是開了婦學先例，後世史家爭相編撰《列女傳》，無論是紀傳體之列傳，還是野史之雜傳或是方志之婦女專傳，無不受劉向《列女傳》的啓示和影響，「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²³」，如范曄的《後漢書·列女傳》、皇甫謐的《列女傳》等都是仿照劉向《列女傳》而著成的有關婦女傳記專著，有的《列女傳》甚至是劉向《列女傳》的翻版或衍本，如劉歆的《列女傳頌》、曹植的《列女傳頌》、繆襲《列女傳贊》都是由劉向《列女傳》派生出來的婦學專著²⁴，足可見劉向《列女傳》對後世史學影響之大，它開啓了婦學研究的新題材，填補了古代史學研究的空隙。更爲重要的是，它爲婦學在史學上爭得了一席之地，從此，女子與男子一樣載入史冊，「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跡，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捐也，況女子哉？……，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²⁵」充分肯定了女子載入史冊的權利，自此，專載婦女的《列女傳》與專載男子的《高士傳》在史學著作中取得了平等的地位，因此，劉向《列女傳》的撰寫和出現，相當於建立起一種史學意義上抽象的男女平等概念，實爲可貴。

第二節 《後漢書·列女傳》之學術成就與價值

一、在中國史學上的成就

²² 魏收，《魏書（二）·列女傳》（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1172。

²³ 王回，《古列女傳·序》（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

²⁴ 王麗英，〈論劉向《列女傳》的立傳標準及其價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卷第2期（2002），頁24。

²⁵ 王回，《古列女傳·序》（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

劉向之後，范曄是為女性正位正名的再一人。范曄沿襲劉向《列女傳》的列傳體例，在《後漢書》裡增立《列女傳》的內容，使女性史在中國史學上第一次納入正史的範圍。這在史學上的確是一次大膽、創新的突破，也是中國女性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可見范曄之眼光獨特，見解卓越，以及《後漢書·列女傳》在歷史上無人能敵、無法撼動的地位。

范書問世之後，一則由於他記事詳贍得體，文筆優美，當時人喜歡傳鈔他的著述；二則由於范書只有紀傳和幾卷志，沒有表，容易閱讀，為學者所歡迎，而獲得社會上一致好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²⁶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范曄以前的數十家《後漢書》便逐漸散佚，在他之後，梁代蕭子顯所撰的百卷《後漢書》、王韶所撰的兩百卷《後漢林》，也都相繼被淘汰。到唐代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說：「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曄）、袁（宏）二家而已。」²⁷范書之所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能風行中國，是由於范曄過人的才華、史學思想，以及《後漢書》的史料和文學價值²⁸。因此此書在中國史學上的成就較大的，約有下列幾點：

（一）為創新的史傳體例：

《史記》中七十列傳，內容豐富精彩，有專傳如循吏、儒林、酷吏、遊俠與貨殖等列傳。《漢書》因循其體例，也立了循吏、儒林等類傳。范曄仿效《史》《漢》，以時代為序和以類相從的撰寫原則，著《後漢書》八十列傳，在十個類傳中，最獨特的是，范曄新創了七個列傳體例，如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范曄的創新，並不是憑空捏造，標奇立異。而是純粹想更真切的反應東漢時代的文化特徵和社會真相。今世古代史家對此有不少精詳的析論，舉藍文徵先生所論，詞簡意備，他說：

范書列傳門類有：循吏、酷吏、儒林及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前三者因《史》《漢》所固有，後七者皆蔚宗所新創，撥

²⁶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前言》（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頁24。

²⁷ 劉知幾，《史通通釋·外篇·古今正史第二》（臺北市：世界，1981），243頁。

²⁸ 《中國古籍研究叢刊（一）·中國史學要籍介紹》，（臺北市：民主出版社），頁93。

諸當代史實，最得體要。良以東漢尚氣節，故創獨行、逸民二傳，以表彰幽隱；黨錮之興，善類一空，宦官亂政，漢世遂傾，此皆一代大事，理宜分別列傳；文人與學者迥異，《漢書》無文苑，故司馬相如王褒之流，無法安排，竟置於普通列傳中，蔚宗創為文苑，後世諸史因之，竟不能廢；至於敦風教而傳列女，記異能而傳方術，例皆允當，常為後世所沿用，邵晉涵氏雖譏范書多立門類，然亦謂：「范書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繫，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南江書錄》）。可見其於范書之是處，亦不能不首肯。吾人細讀范書，到處可發見其義例之善，足覘其史學之深及史觀之正確²⁹。

所以不獨只有《後漢書·列女傳》之新創體裁具有特出的意義之外，尚還有其他新創的六個類傳，這是《後漢書》最突出的特點，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也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上崇高的地位。

（二）書法的實正：

清代史家趙翼說：「《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為尊者諱也。至於弑君弑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³⁰」這是指《春秋》中寓有褒貶深意的書法。范曄在《後漢書·列女傳》之書法看起來直筆得實。以《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為例，傳中記載「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記載蔡琰因天下兵亂，被趁機侵掠中原的外族所擄獲，范曄在傳後云：「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記載兩首蔡琰所做之《悲憤詩》，《悲憤詩》有中國詩史上第一首自傳體五言長篇敘事詩之稱，充分的寫出動亂的時代與她悲慘的遭遇，抒發她對於坎坷人生的酸楚，言辭動人，感人肺腑。

但是歷代以來一直有人質疑《悲憤詩》中所描述的史事之真偽，也不不少人質

²⁹ 藍文徵，〈范蔚宗的史學〉《史學選集》（1976），頁 307-308。

³⁰ 趙翼撰，楊家駱主編，《廿二史劄記》（臺北市：世界書局，1974），頁 47。

疑《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不符合史事，如梁啓超云：

兩詩並見《後漢書》。或疑第二首為後人擬做。范蔚宗未經別擇，誤行收錄。此說我頗贊同，因為兩詩所寫，同一事實，同一情緒，絕無作兩首之必要。第二首雖亦不惡，但比起第一首來卻差的多了。第一首則真千古絕唱。³¹

梁啓超認同第二首是范曄沒經選擇就誤將它收入《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後人擬做作品，第一首才是蔡琰親手做的最佳作品。蘇軾也頗質疑范曄與《悲憤詩》，他曾云：

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涵養主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必在父死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³²

蘇軾譏笑范曄之荒唐淺陋，竟然將別人擬做的文章列入《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中，蘇軾憑藉對於《悲憤詩》的言辭、格式與撰寫之時間皆與當時之史實不符，具體的質疑《悲憤詩》的真偽。

但從白品鍵〈《悲憤詩》史事考—旁論東漢末年羌與匈奴之相關問題〉中的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綜合以上章節對於《悲憤詩》史事的考察，我們發現大部分質疑《悲憤詩》及其傳文不符合史事的，不論是質疑傳文錯誤或是質疑《悲憤詩》乃偽託，這些質疑都是可以解釋的。也就是說，《後漢書·列女傳·董祀妻傳》只不過是記載的太過簡略罷了，既然其中所記得大部分事件都是可能發生

³¹ 梁啓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頁 127。

³² 茅維編，《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094。

的，那麼這樣的記載雖然簡略了些，卻不至於違反史實。³³

白品鍵在經過假設和論證之後，認為范曄所撰之內容，對照史實來看，是有可能如此發生的，只是范曄文筆簡潔，重點式的陳述其事，不至於因此評論范曄有違反史實的說法。

對於范曄直筆得實的書法。史家王鳴盛評道：

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推尊獨行。³⁴

王鳴盛認為《後漢書·列女傳》中對於德行、忠義之女性和事蹟的撰寫，對於儒家思想的規範與陳述能媲美於鄭玄。可知范曄對於《後漢書·列女傳》中人物的撰寫，都得實而公正，其史德之高也由此可見。又前代史家的寫史，大多具有明顯的政治史觀，惟有范曄傾向於倫理史觀和文化史觀，所以他如實記載了東漢婦女之道德之美，德行之貞，能鑑於司馬遷與班固的缺失，而加以匡正的³⁵。由此亦可見他史觀的正確和史識之高。

（三）文筆的優美：

散文是兩漢文學的主流之一，而散文的發展和成就，又主要表現在傳記上。范曄為司馬遷、班固之後，將歷史和文學相結合為一體的傳記作家。因為他富有才華和深厚的文學修養，寫出《後漢書·列女傳》紀傳中所載的婦女，形形色色，妙筆生花的躍然於書中。將當時婦女所面臨的社會與環境，寫的栩栩如生，活靈活現，敘事簡潔，詞采壯麗。

³³ 白品鍵，〈《悲憤詩》史事考—旁論東漢末年羌與匈奴之相關問題〉（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³⁴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 487。

³⁵ 藍文徵，〈范蔚宗的史學〉《史學選集》（1976），頁 310

范曄在寫撰寫這些婦女時，當然存有他自己的理念，但最重要的還是需根據史實。在一些傳記中充分又生動的描寫了人物的心理歷程，例如在《後漢書·王霸妻傳》中云：

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36

王霸在年少時就有很高的節操，光武帝時，連續徵召他都不出來做官。東漢末年當時王莽竄漢，很多儒生爲了氣節而放棄追求官位，王霸更是如此。范曄寫到王霸友人子伯的兒子來送信的時候，所乘的車馬、身上穿的服飾、還有僕從相隨，非常雍容華貴的模樣，這時在田裡耕種的王霸兒子知道客人來了丟下耒回家，看到子伯兒子的風采氣派，顯得局促不安，感到非常沮喪慙愧，慌張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見人。范曄這裡對於兩人兒子的描寫非常簡潔，卻能明白的凸顯出兩人在身份地位和外表態度之差別，把當時兩人初見的實況，寫的淋漓盡致。後來寫到王霸，他看到這等光景，心裡覺得很慙愧，客人走後躺在床上很久不起。直到王霸妻請罪之後，他才說出內心的想法「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王霸在反省自己兒子蓬髮垢齒，不識禮儀，見到客人如此羞愧，讓他自己重新思考隱居於野的生活是否正確，在王霸妻告訴他清貧和富貴的生活，與自己不顧世俗榮祿保持自己清白的名節，孰高孰低已經很清

³⁶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王霸妻》，頁 4717。

楚明白了。王霸聽完馬上從床上爬起，笑容滿面的連連誇讚妻子。范曄在王霸妻傳中，將王霸慚愧自省以及後來頓悟道理的情況，寫的活靈活現，使人對其心理的迴盪起伏十分清楚。在傳中將王霸妻的秉公忠正，直言無隱，寫得逼真動人，同時顯示當時政治動盪，士人對於出世入世的猶豫徬徨，以及隱士們注重清白的高節。

由上所舉，當可略知范曄文筆的優美了。文筆是作史的工具，《後漢書·列女傳》之所以成爲婦女列入史學名著之第一，原因之一，就是范曄本身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和很高的才華。范曄對書中的論贊很有自信和自負，但他若不自知之深，又怎敢如此妄言。

《昭明文選》錄《後漢書》論贊各一首，可見梁人已重視范文。《舊唐書》經籍志著錄范書論贊五卷，殆以蔚宗文筆高於六朝諸人，愛其文辭者，遂摘取論贊，使之別行³⁷。

細讀范書，序論文章燦爛的，真的比比而是，目不暇給。至於贊的部分，雖然劉知幾在《史通·論贊篇》中譏其爲贅疣：「夫每卷立論，其繁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之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當代學者趙呂甫，直指《史通》本篇對范氏的評議，未免失之偏激，不能視爲定論。趙氏說：

范蔚宗《後漢書》紀傳後用《論》，《論》後復繫之以《贊》。《贊》用韻，而體例一變。然《贊》之用韻，不自范氏始也。《史記·匈奴傳·贊》用韻之類，已開其先矣……《漢書》裡班彪寫作的《元帝紀》、《成帝紀》的《贊》，「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門矣。（《通志序》）……至於范史《序》《論》的優點是，論事當能溯源窮流，使上下數百年間事態演變的遺跡聊若指掌；能表彰節行（如陳蕃、李固等傳論），推崇唯物思想家《張衡傳論》，敢於譴責邪惡勢力（如《宦官傳論》）敢於

³⁷ 藍文徵，〈范蔚宗的史學〉《史學選集》（1976），頁 309

抨擊讖緯謬說（如鄭興、賈逵傳論）。立說有據，見解精闢，具有一定反封建主義的進步思想傾向。行文則駢散兼備，疏朗和諧。其缺點是，他的史學思想還存在封建正統觀點與命定論思想（竇武何進等傳論）。《史通》本篇對他的評議，未免失之偏激，不能視為定論³⁸。」

又史家杜維運教授，對於劉評也有異議。他認為，「惟自文字而論，《贊》不但無一字空設，而且字字珠璣。」並以《班彪列傳·贊》和《循吏列傳·贊》為例說：「簡短數語，含意豐富，文亦燦爛奪目。³⁹」足見范曄文筆之長，這也是《後漢書·列女傳》中明顯可見的特色。在《後漢書·列女傳》末，范曄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⁴⁰」在他選列這些婦女時，是以其端正節操且有蹤跡可紀者，還有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她們的遺風餘烈，才是婦女在史記中應該記載的。短短四句，呼應他在《後漢書·列女傳》傳前小序對於所羅列女性的標準、目的及價值。

綜上所述，范曄以卓越思想和超人的綜合能力，「進退眾家。以成一家之言。」實兼有史家四長。近世章太炎、錢穆、陳寅恪三位大師對范書多有褒詞，如章太炎說：「《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⁴¹」，錢穆先生說：「平心而論，《後漢書》確不失為一部極好的史書。⁴²」，陳寅恪贊之曰：「蔚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⁴³」，王先謙則說：「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眾家之後，獨至今存，其褒尚學術，表章節義，既不蹈前人所譏班馬之失；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雖文體不免隨時，而學識幾於邁古矣。⁴⁴」可見他們對於范曄的文筆、才華和豐富的學識皆頗為讚賞。

³⁸ 劉知幾撰，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 201-202。

³⁹ 杜維運，《後漢書·中學史學史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 123。

⁴⁰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董祀妻》，頁 4750。

⁴¹ 周林，《後漢書今注今譯·序》（長沙市：岳麓書社，1998），頁 1。

⁴²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市：三民發行，2011），頁 150。

⁴³ 張大可編著，《史記全本新注·序（一）總序》（西安市：三秦，1990），頁 2。

⁴⁴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序》（臺北市：中華書局，1984），頁 1。

二、《後漢書·列女傳》給女性一定的歷史地位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不僅存在著階級壓迫、宗族壓迫，而且還存在著男尊女卑的性別壓迫。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婦女的形象一般以賢妻良母、貞女、節婦、烈女出現，很少看到弘揚婦女智慧的史著。但是范曄的《後漢書》卻別開生面，專辟《列女傳》，記述才華出眾的婦女，給人以耳目一新的中國古代婦女形象。表現出這位歷史家重視婦女，在史學上給婦女以一定的地位。⁴⁵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記述知識女性班昭的形象。說班昭「博學高才」，成爲東漢和帝宮廷的著名學者。不僅皇后諸貴人要拜她爲師，而且大學問家馬融及其兄馬續者得：「從昭受讀」，「伏於閣下」。班昭不僅爲兄班固完成《漢書》中的《八表》與《天文志》，而且還作《女誡》七篇。所著賦、頌、銘、諫、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等凡十六篇。范曄《後漢書》記述了班昭這樣知識女性的史事，樹立女性的光輝形象，這在封建史學中確屬罕見。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記述無名氏的地位很低的樂羊子妻的事蹟。她勸丈夫把拾來的「遺金一餅」放在原處，不貪財。她說：「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意思是說，志士不會飲用盜泉地方的辱名之水，清廉的人不接受嗟來的食物，何況去貪圖拾來的東西而損壞自己的德行呢。當樂羊子遠方求學一年後回家時，妻子以織絲綢爲例，說明知識必須一點一點不間斷地積累，跑回家就中斷了學習，猶如中斷絲織一樣，成不了材。樂羊子受到勸誡與教育，再去求學，七年未回家。《後漢書》還講述樂羊子妻教育小姑不貪別人家的雞，並代小姑獻出生命的感人事蹟。這些記載歌頌了中國勞動婦女的高貴品德，樹立了婦女的光輝形象，這在封建社會裡是難能可貴的。

《後漢書·皇甫規妻傳》記述了不知姓名的皇甫規妻子如何能文善書，寫得一手好字，且貌美賢慧。丈夫死後，她不屈服于董卓的威脅，寧死不屈，也是歌頌賢慧的知識婦女的堅強品格。

⁴⁵ 夏祖恩，〈漫談《後漢書》的史學特色〉《福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97。

《後漢書·董祀妻傳》記載董祀妻蔡文姬博學且有辯才，又通曉音樂。她靠自己的雄辯口才，在曹操面前為丈夫說情，獲得免罪。她也為曹操抄寫古籍，字體工整漂亮，準確無誤，這是表彰中國知識女性的聰明才幹之作。

范曄《後漢書》專門記述一些中國封建社會勞動婦女、知識女性的聰穎智慧與高貴品德，給在封建社會中受雙重壓迫的中國婦女以一線希望和一定的歷史地位。這是范曄《後漢書》又一重要特色與影響。中國勞動婦女也能登上歷史的大雅殿堂，揚眉吐氣，這是《後漢書》的一大創舉。范曄尊重婦女的史學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後漢書》儘管還沒有擺脫從記載政治史為主的中國傳統史學的束縛，但它已具有某些革新精神，並擴大了史學研究範圍。他以紀傳體述史，從人物傳記中反映社會各個側面，系統地再現歷史事實。在史學體裁、內容、方法上都有某種新意，呈現出《後漢書》的史學特色。因此，《後漢書》在史學思想上有一定的進步性。總之，范曄的《後漢書》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的一部優秀史學作品，較有創新精神，在中國史學史上占一席之地。

第三節 劉向《列女傳》之影響

劉向《列女傳》，是歷史上第一部婦女史傳專著，無論是在倫理道德和女教方面，還是在文學方面都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對於文學的影響

(一) 傳記文學

劉向《列女傳》在中國傳記文學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代表漢代在正史之外，以類傳形式單獨成書的一種獨立記述人物的雜傳體之產生。《列女傳》所編撰人物眾多，所列的事蹟紛雜，但它是獨立的傳人文學之始。從此，我國開始了「正史列傳和雜傳珠聯璧合的歷程」。⁴⁶

⁴⁶ 張慧禾，〈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浙江師大學報》（1998年

1.對後世雜傳興盛的影響。在劉向《列女傳》影響之下，後代史書傳記都有專門的婦女傳記作品，它們的編撰手法、寫作宗旨和人物取材上，都有受《列女傳》的影響，在所載的婦女之性格有的重貞節、孝義，也有些重才學、文辯，所記載的人物某特定、重要事蹟，有的則撰寫了人物的一生。從劉向《列女傳》完成之後，一般雜傳中的婦女傳記也陸續問世，因此劉向《列女傳》可以說間接地促使傳記文學的蓬勃發展。

如東漢末成於眾人之手的《東觀漢記》就是仿照劉向《列女傳》為后妃以外有品德義行的婦女撰寫的傳記，流傳至今「舉案齊眉」的故事就是源自《東觀漢記·梁鴻列傳》。三國時吳國謝承所撰的《後漢書》則設有《列女傳》專篇。

劉向在《列女傳》中用「君子謂」、「君子曰」等評論的形式和引《詩》為證的方法也為後人廣為採用。如皇甫謐文學創作的代表作《列女傳·龐娥親》的傳末，先是用「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引出評論，然後以《詩》「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相證，說「娥親之謂也」。⁴⁷後世有些傳記撰寫的內容直接抄自劉向《列女傳》，或是改寫《列女傳》原先的內容，如皇甫謐《高士傳》卷上的《老萊子》，卷中的《陳仲子》則是分別節錄自劉向《列女傳·賢明傳》的《楚老萊妻》、《楚接輿妻》、《楚於陵妻》等，在文章用字淺詞方面也都頗為類似。

在傳記體裁方面受劉向《列女傳》的影響較大的有嵇康的《聖賢高士傳》、皇甫謐的《高士傳》和《列女傳》、陳壽的《益部耆舊傳》、張方《楚國先賢傳》、張鷟的《文士傳》、周裴的《汝南先賢傳》、葛洪的《神仙傳》、杜預《女記》、虞通之《妒記》、劉開《廣列女傳》等。這些專書多運用通史體例，廣泛蒐集先世經史內容，撰寫範圍非常廣泛。可見，其在取材標準、整體結構、寫作方式方面皆有受到劉向《列女傳》的影響。

5月)

⁴⁷ 陳壽撰，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魏志·龐涪母娥傳》（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549。

2. 「以類相從」的方式流傳。劉向《列女傳》將婦女依照「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項分類敘述，著述的內容蒐集自歷史典籍與民間傳說，作者以儒家思想之「德行」、「倫理」等類別加以條列，以清楚表達自己所欲傳達的思想。這對後世書籍寫作時利用分類的方式表達作者的旨意有深遠的影響，如南朝宋劉義慶召集門下食客共同編撰的《世說新語》就是將漢末以來名人軼事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等三十六個門類加以敘述。直到今天，這種分類的寫作方法仍爲許多的編撰者繼續沿用。

（二）對女性形象的影響

1. 重道德的女性形象

《列女傳·周宣姜后》中云：「《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⁴⁸」講到婦人雖然可以利用美色得到寵愛，但是要靠美德才能長久。從《列女傳》的七大分類和所撰之女性事蹟分析，劉向重視女性的品德更甚於外貌。如奇醜無比的鍾離春，卻有過人的機智和治世之才，她將治國之策自薦於齊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當齊宣王聽了她對齊國可能遭遇的四種危機的見解後，就馬上立她爲后，無視於她醜陋的外表，可見齊宣王愛才甚於色的程度。劉向在《孽嬖傳》中記載歷代以來以美色禍國的女性，如夏桀末喜、殷紂妲己、周幽褒姒、衛宣公姜、陳女夏姬等等，她們雖有美貌但無足夠德行，使得國家敗亡。劉向欲以如此強烈的正反對比，突出「婦德」對於國家興亡的關鍵影響力。《列女傳》所描述的是在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下的標準女性，她們不靠外表，但具備聰明的智慧和傑出的才能，能深明大意，又擅長匡夫教子，後代女性作品的形象塑造多受此影響。

從先秦時期文學作品到漢樂府和六朝時期的女性形象就已經有明顯的

⁴⁸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頁75。

改變。從《楚辭》中美麗多情的「既含睇兮又宜笑」、「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中盼而不見心情惆悵的湘夫人，或如《莊子》裡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膚如冰雪、超凡脫俗的樣貌，到了曹植《洛神賦》中的洛神的雖「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般的美麗，但已是「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的高潔品行，和「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般的明禮貞潔。從先秦只重外貌情感的描寫方式轉向外貌與道德並重的描寫方式，這無疑是受到史傳中的女性形象所薰陶的結果，而《列女傳》這本婦女史學文學專著的第一部，當然其中重道德的婦女形象對他們是最有影響力的。

《列女傳》中專載的女性形象這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明清文學中女性意識的覺醒有不小的影響。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描繪了豐富的女性世界，塑造眾多的女性形象。其中曾有「提倡女權」的描寫，如第七回小山問唐敏關於赴試一事道：

請問叔叔，當今既開科考文，自然男有男科，女有女科了。不知我們女科幾年一考？求叔叔說明，姪女也好用功，早做準備。……姪女並非要去做官。因想當今既是女皇帝，自然該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輔弼，庶男女不致混雜。所以請問一聲，那知竟是未有之事。若這樣說來，女皇帝倒用男丞相，這也奇了。既如此，我又何必讀書，跟著母親，孀孀學習針黹，豈不是好？⁴⁹

李汝珍在《鏡花緣》的開頭就已表示沒有「女科」是不公平的，她強調女性才華的重性要，認為女性應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大力讚揚女性的智慧和獨立之人格，支持女子參加科學和參與政治，從中也可以看到劉向《列女傳》女性形象的形貌。

2. 「奇女」形象的影響

在《列女傳》眾多女子中，包含了許多頗具膽量與智慧的女子，她們

⁴⁹ 李汝珍，《鏡花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頁 37。

都是一人成事的。除《貞順傳》中的「召南申女」、《仁智傳》中「魯公乘奴」和《辯通傳》中的「阿谷處女」外，這些女子都有敢向君王卿相據理直辯的奇膽，具有神秘的色彩。她們有的會用隱語，有的極醜卻有天才，她們能了解天下形勢，具有前瞻卓見，為國擔憂且有具體的治世之道。她們是奇女子，國君在她們的點醒之下，國家都能大治，如鍾離春、孤逐女、宿瘤女、莊佺等。這些奇女子的形象成為之後的俠女形象的主要精神。唐傳奇《甘澤謠》中的紅線女，不僅精音律，通經史，她出身解助薛嵩的憂患「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⁵⁰」她施奇技，來去無蹤，輕鬆將一場戰爭消彌於無形，這與《列女傳》奇女利用口才說服國君最後「國以治」是相同的。又如裴鏞所著傳奇小說《昆侖奴》中的紅綃女第一次見到崔生要分別時，紅綃女相送已久，突然做了一套動作：豎起三個指頭，然後手掌反復三次，最後指了指胸前佩戴的小銅鏡。說道：「記住！」，所用的隱語暗示下次相會的日期時間和地點，會「隱語」的紅綃女就有齊鍾離春的影子

《列女傳》中有許多因父親觸犯當權者而憑膽量和言辭使父親免罪的女性形象，如《辯通傳·齊太倉女》中的緹縈。她是漢太倉令淳于公的五個女兒之一。淳于責罵生女兒沒用，緹縈聽了很悲傷，就隨其父去了長安，進諫天子，並申明願替父頂罪，最後使父親免除肉刑之苦《辯通傳·齊傷槐女》中的傷槐女因父親傷了齊景公的槐樹而替父向晏子求情，使父親免罪。如果家裡有男孩子，也許她就不會造訪晏子，也不會被晏子開玩笑說她私奔。《辯通傳·趙津女娟》中娟的父親是守渡口的官員，醉酒瀆職，娟替父向趙簡子陳說事理，使父親得以活命。父女親情，女兒救父理所當然，在家裡沒有男孩子時，這些女性都很自覺地以超乎尋常的膽量、理性和智慧地去承擔起一個兒子的職責，她們似乎也通過這種方法來證明自己的地位及存在的價值。

《列女傳》中的這些俠義女性形象對後代文學的發展無疑是有深遠影響的。

⁵⁰ 吳組湘等選注，《歷代小說選·第1卷》（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1991），頁405。

西晉皇甫謐《列女傳》中的龐娥的行爲就與這些女性有相似之處，她在行事之前也是作了充分準備，也是一個伺機爲父報仇的孤膽英雄。這些女性形象可以看作是劉向《列女傳》中緹縈、傷槐女和娟等形象的發展。而在晉朝干寶《搜神記》中的李寄的經歷也相類似，李寄家裡沒男孩，但她的機智與有膽量比男孩更甚。她行事有計劃，孤身前去斬蛇，憑著機智與勇敢，終獲成功。李寄的身上就有《列女傳》中莊姪的影子。唐傳奇中的謝小娥身懷膽智，爲報仇女扮男身，用盡心機、受盡苦楚、力殲強梁，既能報仇又能守志，是一個絕奇的女子，是《列女傳》中那些奇女子的縮影。

3.爲後代的文學著作之原型

《列女傳》中其中好多人物爲後來小說家、戲劇家的創作發揮提供了婦女角色的原型。如《節義傳·魯秋潔婦》中秋胡在外當官五年，回到家裡，在桑園遇見妻子並調戲她，妻子回家知道調戲她的是自己的丈夫，於是投水而死。這個故事對後代影響極大，如漢樂府的《陌上桑》內容與秋胡戲妻的記載有某種相似，或者在《陌上桑》創作時曾經受到《節義傳·魯秋潔婦》的啓發。漢魏以至唐宋詩歌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題材。南朝宋顏延年最佳之作《秋胡詩》五章其篇幅之大、形式之整飭、敘事之曲折，被世人評爲其中最上乘者。到了唐代有秋胡變文，已發展爲長篇故事。元代著名的雜劇作家石君寶將「魯秋潔婦」這個故事搬上藝術舞臺，成功地塑造出一個形象鮮明又富有個性特徵的女性形象——羅梅英，一個美麗、有教養，忠於愛情，並富有強烈鬥爭精神的女性形象，幾乎家喻戶曉。《秋胡戲妻》是石君寶最著名的代表作，雖然故事出自劉向《列女傳》，但石君寶改造很多。內容寫軍戶秋胡新婚三天，就被迫從軍，妻子梅英靠採桑度日，奉養公婆，抗拒誘惑，且堅持不改嫁。10年後，秋胡作官返鄉經過桑園，調戲已不認得的妻子，遭梅英痛加斥責。梅英返家後，得知那人就是丈夫秋胡，馬上要求離異，寧肯在街上討飯，對秋胡不屑一顧。後來婆婆說情，還以死相挾，她才勉強原諒秋胡。劇情非常緊湊，角色語言生動，寫出富有反抗精神、性格突出的主角梅英，是元雜劇中不可多得的成功形象。

此劇在戲劇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京劇《桑園會》就是淵源於此。此外，《節義傳·齊義繼母》中的齊義繼母的形象，也可以從關漢卿《蝴蝶夢》中那位賢德慈愛的繼母身上看到。《貞順傳·齊杞梁妻》中的杞梁妻哭崩城的故事，應該是孟姜女哭崩長城故事的雛形。

二、對後代史學的影響

《列女傳》突破了史傳中以男性傳主為主的傳統，第一次完全以女性為傳主，塑造了七類分別具有特色的女子形象。從劉向之後，史學家紛紛開始注重於對女性的記載，出現了各朝代的女性傳記。南朝宋時，范曄在《後漢書》中專載《列女傳》一卷，首開正史為女性立傳的首例，將皇族婦女列入《皇后紀》。范曄也承襲劉向《列女傳》為各階層婦女設傳，既「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其取材標準、編撰形式幾與劉向相似。此後，歷代史書似乎成為定則，故正史中「列女」成為與其他男性傳主類傳頗具差異性的內容。其後《晉書》、《魏書》、《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新元史》、《清史稿》等都設有《列女傳》，可以說劉向賦予婦女在歷史中的重要地位。

三、對婦女倫理道德影響

（一）重義輕生

《列女傳》裡反覆強調的就是儒家思想的「禮」和「義」，然而由於過於倡導「禮義」而導致「輕死亡」思想，這對後來各朝代的女性都有影響。劉向《列女傳》中自殺的共有十四人，比較殘忍的是一個自殘割去自己的鼻子（《貞順傳·梁寡高行》），還有兩個自殺未遂（《貞順傳·齊孝孟姬》、《節義傳·周主忠妾》），雖然說生命最能考驗「禮義」，但劉向撰寫這些重「禮義」的女性，常常不分是非善惡，為了顧全「禮義」輕易地選擇結束生命，在她們眼裡似乎只有死才能證

明自己的節操，最後也死不得其所。如「蓋將之妻」，對打敗仗的丈夫覺得很羞恥，爲了保全妻子而喪失人臣之節，認爲這是苟且偷生，所以憤而自殺。「魯秋潔婦」，因丈夫長期出外作官終於回來，卻心有淫思，遇妻不認，妻子認爲丈夫無義而感到羞恥自殺。這些輕易放棄生命的女性，成爲後代《列女傳》演繹的源頭。史傳中，我國婦女節烈人數到了宋以後大幅增加，明清時期節烈人數更是劇增，從董家遵的《歷代節烈婦女的統計》中，明朝節烈的女性多到 35829 人，清朝節烈的女性還有 12323 人，明清婦女爲了堅持自己想法而自殺似乎習以爲常。雖然宋代以後婦女選擇自殺的原因眾多，但劉向《列女傳》中「重義輕死」的思想是對她們有影響的。

（二）一女不事二夫

《禮記·郊特牲》記有：「信，婦德也。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主張喪夫的女姓需守節而不能再嫁。雖然漢代因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已經開始重視貞節，但由於遠古習俗的遺風，社會上一般人的貞節觀念還很淡薄。對婦女在節操上的要求尚爲寬鬆。董仲舒論證「三綱」之道，但「夫爲妻綱」並沒有特別仔細去發揮。劉向在《列女傳》中雖未主張婦女需守節操，但爲了女教的需要，在《貞順傳》、《節義傳》撰寫了不少夫死不二嫁的年輕女子，在《貞順傳·蔡人之妻》中明確提出「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另外從《貞順傳》、《節義傳》的標題看，劉向對這些女子的行爲是肯定、稱道的。在劉向讚美的不嫁二夫的女子中，像「息君夫人」那樣因對前夫感情深厚而不嫁二夫是無可厚非的。像「魯寡陶嬰」、「梁寡高行」等是在丈夫死之後爲了「養幼孤」而堅持不再嫁，亦是情有可原。另外像「陳寡孝婦」夫死不再嫁是爲了奉養婆母，她如此的行爲也值得稱許。但是《貞順傳》中的「楚白貞姬」、「衛宣夫人」等女性在丈夫死後沒有合理的理由卻不再嫁，而守寡至終，這些女子是不應該得到讚賞的。劉向對一女不事二夫的提倡，尊崇儒家的理論，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如東漢班昭拖著《女

誠》聲稱「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⁵¹可見劉向所提倡的理論客觀上使得漢代貞節觀念的更為加強。這種貞節觀念發展到宋明理學時期，理學大師程頤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⁵²」的觀點。在「一女不事二夫」的觀念根深蒂固之後，寡婦再嫁雖然法律沒有禁止，但嫁娶雙方都認為是不光彩的事。且在位者訂定守節者的旌表制度，還可免除本家的徭役，因此宋婦女皆以守節為榮，以再嫁為恥，因此後代婦女們承襲此風，婦女成了禮教的犧牲品。

（三）女教思想

劉向編撰《列女傳》主要目的是要勸諷後宮，感悟天子，通過各種途徑來深化他的女教思想。首先通過傳主的言行，後以褒貶來強化其中的女教觀念。有的給謹守禮節、堅守女教的女子以顯位，如曾言「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的齊宿瘤女，齊閔王謂之賢女，而立為后。有的則給加以名義稱號，如《賢明傳·宋鮑女宗》中的宋鮑女宗在丈夫有外妻而不怨恨，也沒有離去，反而「養姑甚謹」，宋公聽說她的事蹟之後，表其號曰「女宗」。如《貞順傳·梁寡高行》中的梁寡婦為了堅持不改嫁而割去自己的鼻子，王認為她身懷大義，尊她號曰「高行」。有的通過給她們以金錢、權位相勸。如「楚昭越姬」執禮，獨死守節。楚昭王死後，楚昭王弟子閻與子期謀認為：「母信者其子必仁」，於是迎她兒子熊章為楚惠王。劉向把有違儒家女教觀念的婦女列入《孽嬖傳》，因為她們違背禮義、好邪淫佚，最後使國破家亡，如魯莊哀姜就是一個例子。在《列女傳》中，劉向為了提高女教的可信度，在每傳中都用《詩》、《書》加以佐證。利用可靠的佐證使女性以此為榜樣，竭力讓言行符合儒家對女性所規定的禮教，以達教化目的。

之後的史學家、思想家在《列女傳》的啓迪下，女教書紛紛出現⁵³。如東漢班昭代表作《女誡》就是在劉向《列女傳》的啓發下創作的，她教導婦女柔順、大力鼓吹貞節，至於才智則視為可有可無。因此婦德的標準往貞節、柔順方向發

⁵¹ 范曄作，洪進業、韓復智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3），頁 2790。

⁵² 程頤，《二程全書·遺書》（臺北市：臺灣中華，1986）卷二二

⁵³ 詹曉青，〈劉向《列女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高等教師在職碩士論文，2008），頁 37。

展。班昭在《女誡》中的思想，引起了漢代大儒馬融的共鳴，「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⁵⁴南朝宋時，范曄不計篇幅地將《女誡》載入了《後漢書·列女傳》。唐代陳邀妻鄭氏「假班大家以立言」，撰修《女孝經》十八章。唐代宋若昭編寫《女論語》十篇。元代出現以「女教」命名的女教書，根據吳澄《女教之書序》以及虞集的《女教書序》中的記載，此《女教書》是相人許獻臣所輯錄，略仿朱熹《小學》的體例，編撰此書使女性在日常誦習之，讓無論王公貴族還是貧民百姓的女性都成為儒家女教所期望的賢內助，「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織紅組胡之工、宗室俎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等方面都能得到培養。明代宗室朱詡鉞女朱隆姬守貞五十年著有《女教經》。另明代鄭氏撰寫《女教篇》，收錄在《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中，明成祖時徐皇后仿照《女誡》內容，編訂了《內訓》二十篇。⁵⁵清代余啓運所輯《女教經傳通纂》和《女教史傳通纂》。可以說，女性教化書之始祖是劉向《列女傳》。

《列女傳》中的重道德、重禮義、忠君愛國、不為利誘、匡夫教子等思想也深深感染著後世女性。劉向要求「婦人以色親，以德固」，特別重視女性的德性，深惡痛絕那些只具有美色而鮮少德性的女子，這種思想「重德」思想一直延續至今。而女性的忠君愛國，像魯漆室女忘私憂國、許穆夫人的為國事蹟，一直被運用作關心國事的典故，例如《後漢書·盧植傳》中所謂的「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特別是《辯通傳》的人物，有的貌醜卻有奇才，懂得治國之道；有的勇敢果斷，不向權勢低頭，幾乎沒有一個不值得稱道的。還有齊相御妻的匡正丈夫，鄒孟柯母的三遷、斷機教子，齊田稷母的勸子拒賄，魯義姑姊的捨子救侄，珠崖二義的爭相處死等，也深深感染著後世女性，為以後的人們所廣泛傳頌。

⁵⁴ 范曄，《後漢書·列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

⁵⁵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

第四節 《後漢書·列女傳》之影響

范曄在《後漢書》中裡增立《列女傳》，使女性史在史學上第一次列入正史的範圍，這是史學上第一次大膽的創新與突破，也是中國女性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後世史家編修史書時，也因受到范曄《後漢書·列女傳》的影響，皆沿用此體例，納入《列女傳》的編撰，雖然歷朝正史的《列女傳》所載內容與取材標準，已經與范曄《後漢書·列女傳》有所差異，但《後漢書·列女傳》對正史的影響之深遠是顯而易見的。

歷代官修正史除了少許短暫的朝廷外，都設有《列女傳》。在二十五史中，十三史有《列女傳》的編撰，即《後漢書》、《晉書》、《魏書》、《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上列史書中雖然有皆名為《列女傳》之人物記載，但隨著兩千年的社會時代文化變遷，其撰寫的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接下來將分別探討受到《後漢書·列女傳》影響的其他正史《列女傳》對於《後漢書·列女傳》的承襲與演變。

一、《後漢書·列女傳》

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成其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⁵⁶

范曄《後漢書·列女傳》所注重的就不侷限於傳統的溫柔和順，而是進一步強調其德行與修養。最明顯的是，范書中的「列女」，指的是賢德高秀的女性，劉向《列女傳》的「孽嬖」一類，已被刪除，女性史傳專記高行美德的婦女傳統，在南朝奠定，從此歷朝之《列女傳》都仿《後漢書》，編入有才德之女性。唯范曄認為賢哲足以隆家的婦人與貞節之女性，都可以入傳。

⁵⁶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2781。

《後漢書·列女傳》16篇傳記中有13篇傳述及妻子的形象，例如：首傳即以渤海鮑宣與其妻的對話為開頭，描述桓少君是「生富驕，習美飾」，卻能不愛財貨，「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⁵⁷，實為一位能棄富安貧的賢妻順婦。傳中尚有樂羊子之妻，諷夫不昧拾金⁵⁸，以及呂榮「(夫)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則流涕進規。」⁵⁹等等，妻子扮演了勸勉品學、輔助家業的角色。此外，這些賢妻的形象還反映了「隱逸為賢」的思想在漢魏六朝的女性傳記中得到體現⁶⁰，《後漢書》的梁鴻妻孟光、太原王霸妻等，都是勸夫或與夫隱居的顯例。

二、《魏書·列女傳》

魏收云：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紵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列女傳》。⁶¹

他認為婦人只要做到「主中饋」即足矣，先聖之賢妻良母等女性，興家昌邦，皆非匹婦，值得尊敬，而過去關於各種賢明、才識辯通之女，亦代不乏記載，所以他也繼之搜錄。然《魏書·列女傳》似未繼承范曄編纂女性賢明的傳統，賢妻的事例至此大幅刪減，取而代之的是忠義之婦女，例如代夫對抗南方蕭衍攻圍的苟金龍之妻劉氏，她與拓拔澄的母親孟氏，同樣因為忠勇之義行而入傳。劉氏於夫

⁵⁷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2781。

⁵⁸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2792。

⁵⁹ 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2795。

⁶⁰ 衣若蘭，〈女性入史：歷代正史列女傳之編纂〉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396465&highlight=%C1%D0%C5%AE%82%F7> 檢索日期：2012年2月26日

⁶¹ 魏收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1977。

病無力守城時，「率屬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並將意圖叛逆的軍官斬首，教育城民以忠節，人心益固，因而渡過難關。

62

然而《魏書·列女傳》裡共計 17 個傳記，就有 8 個與貞節有關，這樣的比例是《後漢書》的兩倍，因此六世紀史家對貞節烈女傳記的編纂，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傳中所記華陽王楷妃元氏自毀其面，並絕食死節，以及鄭善果母親的割耳截髮以明志，都是其中之顯例。過去女性傳記中較少歌頌婦女因嚴守貞節而自殺的例子，《列女傳》中女性的死亡，通常都是最後不得已才行之，《後漢書·列女傳》寫婦女自盡的例子有諫夫不成以死謝罪之趙阿；尋父屍不得，投江而死的曹娥與叔先雄；其中和貞節相關者，為受盜人以殺姑母威脅，不從其辱，自刎而死的樂羊子妻，以及拒絕再嫁、自縊而卒的荀采。可見史傳裡因逼嫁而死的例子始於《後漢書·荀采傳》。但是，《魏書·列女傳》則無一因逼嫁自盡身亡的例子，雖有房氏的割耳之自殘行爲，然其矢誓不嫁與《後漢書·列女傳》中所記劉長卿桓氏的割耳自誓，實同出一轍。因此，《魏書·列女傳》雖然與貞節相關的傳記比例增多，然寡婦自殺或自殘的事例，在此傳的轉變似不那麼突出。

三、《隋書·列女傳》

同樣重視貞烈的主題，唐初所修之《隋書·列女傳》直言女德以「溫柔與貞烈」最爲重要，序曰：

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⁶³

其傳末史臣曰也強調「柔順爲先」，並再次褒揚忠壯義勇與冰霜志堅的女性，顯示史家撰著本列傳的動機。傳中類似韓覬之妻于茂德截髮自誓等守節的故事⁶⁴並不少，孝女《王舜傳》更是爲報父仇而拒嫁的首例。貞烈的例子在隋傳中比例較

⁶² 魏收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983。

⁶³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797。

⁶⁴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頁 1806。

高，而且這些傳主無論是自盡或他殺，都死得相當慘烈，對於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傳中也首次有比較具體地描述，史載趙元楷之妻崔氏，「為賊所拘，……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床簧之上，將凌之。」⁶⁵將女體暴露於讀者眼前。其次，《隋書·列女傳》也顯現了特殊的貞節觀，首篇傳記《蘭陵公主傳》最後雖以死自誓，拒絕改嫁憂憤而死⁶⁶，然其忠貞的對象柳述乃是她的再嫁之夫，顯示唐代史官之貞節觀念，似不如後世部分史家對女性貞操嚴格到幾近「潔癖」的程度。

另外，隋傳中的女性有近三分之一的傳主被強調「美姿儀」，此乃繼劉向《列女傳》之後，女性傳記再度述及女子的容貌，不同的是，在劉向筆下，美貌與才德往往是難以並存的，美色常是與禍國相關，而有辯才之女性則多「狀甚醜」，另《晉書·列女傳》也不吝於讚美女主人翁的姿容，甚至以「美艷有義烈」來形容呂纂之妻楊氏。⁶⁷然而，後世《列女傳》中所出現「色美」，通常成為賊人欺凌女性的慾望來源，中國史家對女性的容貌與才德的描述，值得將來進一步探討。

四、《晉書·列女傳》

（一）義行：

唐代史臣房玄齡等所修的《晉書·列女傳》並無因逼婚而立志守節的例子，然拒辱之節烈事蹟為數不少，若以比例來看，約占三分之一，可視為由「列女」而「烈女」的蒿矢。⁶⁸這些女性中，除了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在夫病篤之際即殉夫死亡，其他的傳記都是記載她們面臨敵人欲納其為妻室，婦女因拒為「賊妻」，留下「義不為賊（胡）辱」遺言，後自裁或被害身亡。晉室陵夷之後，節操風化日下，而傳中的王惠風拒妻喬屬，謝道韞使孫恩為之改容等等節義的行為，實為幽谷之清音，可以激濁揚清，垂名萬世。唐代纂修《晉書》的史家對女

⁶⁵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頁 1811。

⁶⁶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頁 1798。

⁶⁷ 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2526。

⁶⁸ 山內正博指出，《晉書》、《舊唐書》與《遼史》之〈列女傳〉曾因傳寫之誤，寫為〈烈女傳〉，見氏著，《〈舊唐書〉「烈女傳」〈宋史〉「列女傳」—現代語譯—》，《宮崎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社會科學》，29（1971），頁 28。他但並未指出稱為「烈女傳」的時代與版本。

性的貞節表現，主要放在女性忠於前夫，抗拒他族或賊匪強娶的行爲上，其著重「義行」的選取，或也符合爲政者想要傳遞的「忠義」思想，但重要的是，顯現出有別於強調夫死立即殉節的另一種貞節實踐。

（二）才智：

繼范曄之後，《晉書·列女傳》收錄了 14 篇與才識婦女有關的傳記，約占全傳的五分之二，數量僅次於貞烈類型，可說是歷朝《列女傳》中對有智婦女褒獎最勤者。這些女性或識鑒高明，或聰辯無礙、文才過人，收入傳中，正符合其序所言，只要「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皆撰錄。」⁶⁹此後才識型的女性傳記斷斷續續入傳，《金史·列女傳》以後則罕見，至《清史稿》才又再重新出現。

（三）賢母：

作者於序言列舉虞興以來，「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如昌化周室的妊姒二母、楚子發母，以及孟母、楚樊姬、桓少君等「既昭婦則，且擅母儀」的女性。而傳中確也編纂部分母儀與賢明的傳記，例如養育前妻子女、視同己出的石氏、尹氏，嚴於母訓的湛氏、宋氏；可以「語大事」的周氏，仁慈輔助劉聰的劉娥，勸苻堅切勿輕率入江左的賢妻張氏。其中嚴憲與孫氏二傳更是集貞節、母儀與識鑒三德於一身的例子。

這樣結合的傳記在《隋書·列女傳》即可見，鄭善果的母親崔氏即是；又《隋書·列女傳》中，陸讓之母馮氏傳更專載其躬自至朝堂爲其孽子請命之事，也是母儀之例。

綜合上述二書對母儀的描寫，顯示七世紀的史家對女性爲母的角色相當有興趣。自從《魏書·列女傳》將母儀與貞節的楷模結合後，隋、晉兩傳《鄭善果母》、《杜有道妻嚴氏》與《虞潭母孫氏》亦專書此主題，稍不同的是，《魏書》的例子比較強調女性如何實踐貞節，而隋、晉二傳則強調識鑒過人的賢母形象。這些

⁶⁹ 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2507。

輔助男系的婦女傳記，顯現的是既合於禮法，又不疏於母親職守的女性。

五、《北史·列女傳》

李延壽在隋、晉兩書的修纂之後，於高宗初年合宋、齊、梁、陳四書為《南史》，又刪增魏、齊、周、隋諸書而為《北史》。《南史》無《列女傳》，《北史》《列女傳》合併魏、隋《列女傳》全 33 傳，加上西魏的趙氏與陳氏二例而成，或為勉強符合本書以西魏為正統的想法。但是或囿於資料不足，或限於李延壽之史才，傳中僅僅補了此二傳，其餘的傳記除局部史文有所刪減之外，完全抄錄自《魏書》與《隋書》，連序與論都是拼湊二書而成⁷⁰。李延壽顯然十分贊同魏隋二傳以貞、烈、才識與賢母之內容，又由其自行增加的二例：趙氏為忠義之婦，陳氏則為仁慈之楷，雖難以推斷其收錄女性傳記的新看法，但卻皆是無關貞烈之二例。

六、《舊唐書·列女傳》與《新唐書·列女傳》

（一）賢母形象轉換：

《唐書·列女傳》選錄的女性傳記，比起十世紀以前所編之女性傳記類型，已較為窄化。例如賢妻良母與才識之女入傳者大幅減少，而且即使入傳，描述的重點也有所不同。以母儀類型為例，《舊唐書·列女傳》只剩下楊氏一傳，她訓誡其子董昌齡為忠臣之道，因「強明節義」以聞而被封為「北平郡太君」⁷¹。《新唐書·列女傳》則有兩篇母訓之傳，一為勸誡為官必需清廉的李畬之母⁷²；二是常以忠義教誨安南賊帥陶齊亮的金節婦，此傳透露了唐人在意邊區民族的忠誠與否。母親的形象，至兩《唐書》轉變為以教子盡忠取代《後漢書》的慈母與《魏書》裡的勸善之母。

（二）賢妻形象轉換：

⁷⁰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2994。

⁷¹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5149。

⁷²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5821。

兩傳皆將賢妻的典範，全部轉換為忠義的類型，尤以《新唐書·列女傳》最為明顯，例如高叡妻秦氏，勸其夫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⁷³楊氏的例子最為鮮明：「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⁷⁴《新唐書》還編入妻子義勇救夫的例子，如竇烈婦「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⁷⁵，令其夫得脫走不死，周迪之妻則賣肉身與人食，保全了其夫的性命，在在展現了《新唐書》重視「義」的態度。然竇氏的事蹟無關貞節，卻也被稱為烈婦，表示及至宋代，士人對於「烈婦」的意涵，並不侷限於殉夫而已。

（三）貞節的激烈化：

從《舊唐書·列女傳》的序言，我們可以得到此傳著重貞烈的部分佐證。序曰：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⁷⁶

且相較之下，《新唐書》比《舊唐書》增加更多與貞節義烈相關的例子。關於傳主行為的激烈化，我們由《新唐書》可見：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唐興，風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⁷⁷

當中所謂「孝、節、義、慈」，固然無違於仁道，但是要想與哲人烈士並垂不朽，惟有臨大難、守禮節，甚至於白刃當前都要堅定不移才能達到標準。首傳中，房

⁷³ 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822。

⁷⁴ 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825。

⁷⁵ 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830。

⁷⁶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5138。

⁷⁷ 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5816。

玄齡的妻子盧氏在玄齡快病死時，要她不可寡居，但盧氏「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⁷⁸」傳達的是極其強烈的性格。女性為守貞所做的自殘行為，在唐宋以前的史傳已有截耳毀面的例子，然過去這些傳記所陳述的女性，都是在夫死之後自誓持節或受逼嫁娶而以此方法抗拒凌辱，未有如此傳只因夫對妻之一語，就即刻以「剔一目」來明志的，而且傳中單單只寫了盧氏這個事蹟的「場景」，來代表傳主的一生，完全不涉及盧氏其他方面的行為表現，史家強力地濃縮與凸顯傳主「守貞之意志」，在此傳表露無遺。

（四）孝悌：

除貞烈的傳統外，兩書最突出之女性德行類型當為孝悌。《新唐書》之編史者已重申女性在「三從」的原則下，應有的表現，孝則為第一步。傳中新添了8個孝順的例子，而且文中描寫許多自殘的行為，李妙法的傳記就是「血淋淋」的證據，「父亡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為開。……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傳中提到李氏不只一次的自殘，幾近自虐性的行為，以強化其孝心的至誠與孝行之激烈。

特別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回顧過去列女傳記關於書寫女性孝行的傳統，《後漢書·列女傳》，所載孝父者有曹娥、趙娥與叔先雄，《列女傳》孝女殉父或為父報仇的情節自此始；此後除了《魏書》以外，隋、晉、唐書也陸續載有女子為父報仇的主題。

七、遼、金、宋史《列女傳》

元代所修的遼、金、宋三史更將女性史傳的書寫，推向嶄新的階段，列女傳幾成了「烈女傳」。雖然《遼史·列女傳》曰：

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讚衛共姜，春

⁷⁸ 歐陽修，宋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頁 5817。

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遼據北方，風化視中土為疏。終遼之世，得賢女二，烈女三，以見人心之天理有不與世道存亡者。⁷⁹

但「烈女」還是占本傳的一半以上，蕭訛里本則是夫亡殉夫的典範，史載其臨終之言曰：「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⁸⁰」於是自刃而卒。《耶律中妻蕭氏》則記載蕭氏在金兵略地之時，於其夫死節之處自殺。這兩個傳記，為往後烈婦事蹟的記載塑下模型。

《金史·列女傳》的序，也可發現史家特別提到寡婦節烈，其曰：「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⁸¹」《金史·列女傳》可視為烈婦記載的重要轉捩點，傳中烈婦的數量驚人，22 傳中只有 2 傳與貞烈無關，並且這些傳記多是單獨描寫女性於夫死殉節或因逼嫁自殺者，且提及自盡時的年齡。傳中選取的貞烈事蹟幾乎都發生於戰亂之時（尤以元兵與崔立之變為主），而且這些事蹟往往與忠於國家相連結，獨吉氏之夫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⁸²烏古論氏卻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兄及吾夫乎？」⁸³史載溫特罕氏亦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⁸⁴即是明證。然《金史·列女傳》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傳記僅著重強調婦女的「節烈」事蹟，其他母儀、賢明、才識等類型的事蹟，不是消失，就是僅成為附帶一提的語句，《宋史》中亦如是，往後的《元史》與《明史》則承繼之且有所發明。

《宋史·列女傳》以烈婦入傳者，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而且其描述的內容較過往更加激烈與「血腥」。自從唐傳開始記錄貞烈女性的苦楚以來，《宋史》對女性被強凌的情況，以及女性面臨貞操威脅時的情緒反應，有進一步細部的描繪。首傳朱娥孝衛祖母，史載其「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

⁷⁹ 脫脫等撰，《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471。

⁸⁰ 脫脫等撰，《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頁 1473。

⁸¹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2797-2798。

⁸²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頁 2801。

⁸³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頁 2802-3。

⁸⁴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頁 2803。

喉以死⁸⁵」。譚氏之妻趙氏傳的記載「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甌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⁸⁶」，又靖康中張晉卿丁氏為金兵所挾，「再三罵不已。卒乃忿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⁸⁷」唯這些例子多是敘述婦女抗辱而死的狀況，傳中對女性自殺的方式，或自殘以自誓的方法，則不如《明史·列女傳》描述之具體。

七、《元史·列女傳》

明初所修的《元史》對女性史傳的處理又有何因襲與變化呢？《元史·列女傳》序中提及居安應淑順、臨變有貞特之操。其曰：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⁸⁸

（一）節烈：

表面上作者不贊成殉夫，但傳記中所強調的貞節意味仍十分濃厚，首篇傳記即可顯現。傳中崔氏「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⁸⁹」一語道出史家記錄的興趣，加以時有權貴求娶崔氏，《元史》寫崔氏「爬毀其面」，此處又顯其自殘的行爲。傳中段氏、吳氏、武氏、尤氏等皆以自毀其面或齧指自誓不嫁而受旌表，官方的表揚，或也是這些傳記出現的重要因素。《元史·列女傳》卷一記載了一些元初守節婦女的事例，卷二則幾乎都是烈婦，並充滿相當多自盡的內容。《元史·列女傳》共計約有半數以上的傳記描寫的是為守貞操而自殺身亡的女性，《金史·列女傳》全部更只有五例非自殺而死。可以發現，金、宋史中的節烈傳記，除了幾個不服逼嫁致死的例子，幾乎都與兵賊的暴力威脅有關；《金史》中貞節烈女

⁸⁵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頁 13478。

⁸⁶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頁 13490-13491。

⁸⁷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頁 13480。

⁸⁸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4484。

⁸⁹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頁 4484。

抗辱被害者很少（僅三例），多為自盡身亡，《宋史·列女傳》則升高到半數貞烈傳記的結局都是婦女被殺，《元史·列女傳》所載貞烈事蹟約僅十分之一的傳主是抗暴被害，大多是自縊或投水而死。其次，《元史·列女傳》增加不少記載本家或夫家親人逼嫁或以死從夫之例，史載趙哇兒並以殉節受到官方之旌表。又本書所記女性以毀體或自盡來明志者，不算少數，以毀面、斷髮、割耳為多；傳中也出現了為未婚夫守貞之例（趙玉兒與柳氏），在在顯示貞節觀念在本傳發揮的作用。

（二）孝親：

孝親的事蹟，在《元史·列女傳》升高到約占全傳的 40%，而且描 述的重點異於前代。有關割股療親的事蹟，史傳中首見於《金史·列女傳》中割股為姑的師氏，以及為父的聶孝女；《宋史》朱雲孫妻劉氏割股為姑、呂良子割股為父，願以身代。《元史》的記載則增加秦氏二女、孫氏女、許氏女割股為父，以及已婚的張氏女為母、劉氏為舅吮膿血等例，並「越演越烈」。但重要的是，此傳傳達了婦人照顧舅姑責任的重要性，婦女孝事翁姑事蹟的比例占了全傳孝行的一半，本傳序中就特別提出事「姑舅之道」一語，律法也規定媳婦不可以惡意遺棄公婆。而且傳中明顯將「節」與「孝」緊密連結，守節的女性傳記，幾乎都與孝事翁姑的行誼脫離不了關係，尤其在〈丁氏傳〉最為明顯，史載：「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⁹⁰傳中可以清楚看到史傳強調守節孝事夫家父母是婦人的職守。

（三）母儀形象罕見：

另外《元史·列女傳》所載婦女也不惜割股療姑以表孝心，郎氏、鄭氏、杜氏、楊氏、張義婦之割肉，還有為姑滌溷舐目的聞氏等等。而作為母親的形象在

⁹⁰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頁 4494。

此傳不僅罕見，且史家不再詳述母親如何含辛茹苦地撫養、教誨子女，而是記錄寡婦撫育夫家子嗣（不一定是親生子女），並常以夫家家族延續的利益為優先，像犧牲己子以救前妻子的〈秦閨夫柴氏〉即是，撫孤至此已成為節婦評價增值的成分，脫離母儀的內涵了。這些孝婦的記載，也成為明人記錄婦人孝行的基礎。另外，我們由《元史·列女傳》記錄蘇氏的割股為夫、官勝娘救夫於虎，為夫嚐糞的惠士玄妻王氏、費隱妻王氏，可以見到婦女「孝行」對象的轉移，妻子以夫為天的表現，已幾同於對待父母翁姑的孝行。

（四）「異象」的出現：

而《元史·列女傳》中節孝事蹟的記載，也時伴隨著「異象」的出現，例如〈趙孝婦傳〉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⁹¹」鄉人傳頌節孝女性之異象，無非是代表社會人心對此種行為的肯定。而這種孝順或節義感天的奇事，自唐宋以來即流傳於民間，明代的女性傳記承襲之，相關的記載愈加繁多。例如以下幾種模式：傳主死前有徵兆，死後有異象，顏面如生，自然異象，風雨大作等等。這些傳記當中的敘述，像割股割肝、擊倒虎蟒、死後異象等等的情節，在《明史·列女傳》中亦可見。

八、《明史·列女傳》

《明史·列女傳》中女性行誼的類別，除孝、義兩項之外，最明顯的就是幾乎被視為專屬於女性德行的「節」與「烈」。此傳中來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域的女性，卻有著共同點：奉獻、曲從以實踐孝義貞烈。未嫁者為父母、未婚夫，已婚者為夫家犧牲，舉凡侍養父母、翁姑，捨身代夫、父而死，為夫或未婚夫守貞、殉死等等。貞節烈女是本傳的大宗，也是一般對《明史·列女傳》的重要印象，然傳中守節女性人數卻僅約殉節者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說，烈女的比例極高。

⁹¹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頁 4488。

不過《元史·列女傳》所記室女守貞殉節者人數尚不多，《明史·列女傳》輯錄的未婚守志之女與已婚節婦的比例，則高達了 1：3.33。此外，這些女子傳記中也顯現一些丈夫不才，婦人勤苦持家，夫死之後，孝養翁姑，撫孤有成，或是成就家業者，所謂的「忍苦成家」型之婦女，只是這些婦女主要以節婦的形象出現，記錄者大多著重速寫傳主如何「明志」的過程，而不是細描其如何渡過漫長而艱苦的寡居生活，其「成家」的一面，也就往往為人所忽略。

（一）殉烈：

而以激烈手段犧牲生命的殉烈女性，幾乎佔了《列女傳》全部人數的七成，承自元、明所修《元史·列女傳》的特色之一，本傳烈女人數最多的是兵亂將至為保貞節而自盡者，高達本傳總人數的 16.49%，殉夫者次之，傳中收錄拒絕擄辱而死，以及因抗賊而被殺害的女性，也比實踐孝道或仁義者多。還有一些是為保名節或不從家人逼婚（或再婚）而自盡，以及在室女為未婚夫殉節，也有幾例是由於國破家亡或兵臨城下而殉節者。本傳的開端就寫十位烈女守貞自盡的事例，可見編者頌揚烈行的用意。

（二）賢妻與母儀消失：

另在傳統女性史傳書寫與女德典範的脈絡中，我們發現賢妻與良母在《明史·列女傳》中幾乎消失無蹤。回顧歷代《列女傳》強調的女性典範，有賢能輔助的妻母色彩降低，貞烈激增的趨勢。元代修史時，賢妻與良母兩項女德幾可說已不再被當作模範，明清承之，亦以貞節烈女為入傳的主要對象，賢妻與良母傳記已邊緣化到近乎被隱沒的程度。《明史·列女傳》收錄女德的標準比方志、私家著述更為狹隘，傳中節烈的指標，更高過女性一切成就。傳中所記的內容以女性之持貞與行烈為重，夫妻的關係幾乎不被述及。母親形象在《明史·列女傳》中也被隱沒不見，在貞烈的價值觀凌駕其他道德，幾乎成為評價女德的唯一標準時，賢妻良母類型的女性又不在官方旌表制度的範圍內，不易被文人傳頌、史志

載入的情形下，明清女性史傳中妻與母的形象，嚴重被擠壓。節孝之婦，往往取代了賢明的妻子與慈愛母親的形象。其中賢妻的定義，納入了節孝之意涵，賢慧常等同於孝事翁姑，婦功也轉換為節婦德行的一部分象徵。而母親的角色則漸漸與慈母的形象疏離，一位寡母之撫育遺孤，被與孝道、貞節的概念相連結，收編在苦節的書寫之中。從此角度來看，或許也可提供何清初史臣在《明史·列女傳》中以「守節」類型的女性傳記居次的一部分解釋。

整體而言，歷朝列女傳記所強調的女性角色，賢能輔助的色彩，漸為貞烈所取代。歷代諸史《列女傳》收錄女性慷慨捐生的傳記，在比例上有漸增的趨勢，動機卻走向集中於貞操一項。過去紀錄女性死烈的原因尚有：一基於孝親，如《後漢書》的曹娥殉父等。二本於愛國，婦女報國的行爲見《魏書·列女傳》北魏孝文帝時的孟氏與劉氏，《晉書·列女傳》的荀灌、張茂妻陸氏為夫討沈充等，然這些傳中，一是為子，一是為夫守城，另一更為報夫仇而舉兵，所顯現的替夫、子而非出於己身愛國的意涵，亦不得不注意。這樣的忠勇行爲與忠誠之心，雖符合國家統治者的希望，然仍源自於女子三從的基本架構。而元明兩朝是《列女傳》走向「烈女傳」的關鍵，元人所修的遼、金、元三史《列女傳》，因貞節而死的烈女（尤其殉夫者），比例大增，殉親的例子雖然在往後的列女傳中仍可見，但是忠烈類型從《元史》就不再出現於女性史傳中。清初修史承繼了女性史傳頌揚貞烈的採擇標準，而這種崇烈之風，即使編者對這般強調「奇苦」的風氣有些微詞，可是基於這些女性至性的表現，有益於倫常正氣，秉筆者也不敢有所疏忽，故仍大篇幅的記載。

第五章 結論

西漢劉向《列女傳》是以女性作為專著獨立成書的樣貌首次出現，而在紀傳體史書中設立女性類傳，則是以范曄為先。

首先，從劉向之家族世系、仕宦過程，探討其人生的歷練與過程，以了解他能首次寫出《列女傳》此本以女性為專著書籍的目的、成因與背景。劉向身為漢室之後，衷心於政治，且坎坷又漫長的政治生涯使劉向更專注於國事的發展，他滿心希望通過一己之力永保劉氏天下，看朝政混亂，他屢次的上書苦諫仍是無疾而終，於是他利用整理宮廷藏書的機會，以戒天子為目的撰寫《列女傳》一書。由於劉向他坎坷的政治遭遇，再加上漢成帝這位史上少有的荒淫墮落、昏庸無道國君之推波助瀾，劉向欲利用文學的諷喻作用諫上，並將儒家之禮教思想、道德規範與貞節觀等理念傳播於世。

然而從范曄的生平、家族世系和仕宦經過的分析後，可見他短暫的一生中，雖然學術思想上承襲了范氏的家學內涵，但他卻反佛、反鬼，異於時風；在政治上得其父之蔭護，雖無特殊經國之大略與實力，官位卻蠻顯達，最終則因自己對人對事之判斷不明，輕易躁進而喪失性命，結束了備受爭議的一生。范曄撰寫《後漢書》，受當時的學術變遷及社會風氣的影響，加上晉宋之際重文藝、騁才學的風潮，及著史之風十分盛行之感染下，范曄在貶謫期間，積聚了諸家後漢史書的精華，編成了《後漢書》。

比較之下，可見兩人的相異之處，從出身來看，劉向為漢朝宗室後代，范曄則出身五代儒學官宦世家，家學深厚，都深受儒家思想教化之薰陶，與政治的淵源和關係都很深。兩人都面臨的政治環境不同，劉向剛好深處於西漢由盛轉衰的時期，元帝、成帝重用外戚，成帝更是荒淫無度，朝政非常混亂。反之，范曄在宋文帝時期正是歷史上著名的「元嘉之治」，國局穩定，社會經濟行況復甦，而范曄受當時政治環境與士人風氣影響，對於政治的態度較為消極。再比較兩人仕途坎坷、在官場中載浮載沈的原因，劉向主因皆是他屢次與宦官、外戚強大勢力

的對抗失敗，而遭到貶官，但范曄卻因為爸爸的功勳一開始就做到很高的職位，因為他的個性輕躁，得罪長官而才遭到貶謫。如此不順利的仕宦過程，是兩人發憤撰寫《列女傳》和《後漢書》的極大動力與成因，有如此的仕宦歷練，才會有這兩本影響後世的偉大巨作產生。在儒家思想方面，劉向著重儒家重「仁德」之思想為主，范曄才重賢君之寬和政治，這與時代、個人見解有關。

接著著眼於劉向《列女傳》與范曄《後漢書·列女傳》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分析與探究。劉向在《列女傳》中選取了百餘名女性入傳，描寫了七大類型不同品性事跡的女性，從多方面展現了古代社會中女性的生活，同時，作為一本當時重要的女性教化書籍，因百餘人範圍廣大，所以從列女最基本的家庭角色：母親、妻子、女兒三方面進行《列女傳》中女性形象之歸類和分析，可以發現劉向在「母親」形象中著墨甚多，有母儀天下者、善於教養子女者、仁慈的非親生母親、仁智聰慧者，甚至也有惡母的撰述。「女兒」形象中有替父脫罪者、好禮執節者，最特殊的是相貌醜陋卻有奇才者。「妻子」形象則有賢明、仁智者、貞順節義者、維持家族團結者，還有劉向最別具心裁的惡妻形象。

在范曄所撰之十八人中，因人數不多，則分為六類形象分述，即「貞節」、「孝順」、「恭順」、「忠義」、「才賢」、「母德」六項，從分析中便可見在部分程度上范曄承襲了劉向《列女傳》中的女性形象，例如對於才華、賢智者的頌揚，對守貞、節烈的倡導，對為人子女孝順、為人妻之恭順、為人母親儀德的稱頌等。但相較之下，兩書中之女性形象仍有明顯消長的，在「母儀」類方面，劉向偏重后妃等母儀天下的形象描寫，范曄則重賢明、節義方面的描述。在「節義」類方面的表現不同，劉向注重能深明大意、捨己為人的美德，范曄則著重於「殉夫」、「殉父」等奉獻犧牲的精神，為義輕生的狀況明顯又更多了。在「才辯」類方面，劉向描寫有辯才的女性，通常是以說事「隱喻」的方式，替自己、家人解危難之急，有過人的膽識和智慧。范曄則著重於「文才」的傳世，在文學上有傑出表現且名震當時、有著述問世等，比較兩人的婦女觀，劉向顯得是比較侷限的，他強調「一女不事二夫」的絕對貞順，但范曄所傳之蔡琰就嫁了三次，可見在劉宋時代的范

曄，在婦女觀方面是比較寬容、開放的。

劉向《列女傳》首創獨立且是單行於世的人物傳記體例，這是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思想上，劉向能以歷代史實為借鏡，勇於針貶時弊，具有進步的政治思想。且劉向在編寫《列女傳》之過程，能大膽拋棄了名目繁瑣的傳統道德教條，突破了單一的道德標準，只要婦女有一善之舉都可入傳，並不要求婦女對封建教條事事遵循、條條守規，可見其多元化的婦女角色標準。就內容而言，《列女傳》既不是一部純粹的蒐集史料和重整典籍的編著，也不是一部純粹創作書寫出來的小說，而是一部集合編輯與創作的傳記類古代小說作品，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列女傳》一書無論是在倫理道德和女教方面，或是在文學方面都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范曄《後漢書·列女傳》使女性史在中國史學上第一次納入正史的範圍。這在史學上大膽、創新的突破，也是中國女性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可見《後漢書·列女傳》在歷史上無人能敵、無法撼動的地位。此書之偉大之處，正在於它超越《史記》、《漢書》的地方，在於它的後浪推前浪之處。它對後世的巨大影響力，特別是在文學領域，對駢文、小說、戲劇的創作，產生了宏大的影響，對於後代正史的影響更為顯著。

劉、范二人之書雖然在體例方面並不完全相同，但就內容而言，卻有共同之處，即採錄的範圍比較廣，注意到了各個方面的婦女人才。他們都重才學德行，不專主節烈。這就是劉、范二人著書的宗旨。後世所立的列女傳，事實上既以狹隘，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較無積極意義，只不過是爲了維護封建禮教的陋習而已。

參考書目

一、古籍：(按作者姓名筆畫排序)

王夫之，《讀通鑑論》（上海：世界書局，1936）

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臺北市：中華書局，1984）

王回，《古列女傳》（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1）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4）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市：樂天出版社，1972）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海：中華書局，1976）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全祖望，《鮚埼亭集》（台北永和：文海，1987）

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李汝珍，《鏡花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史并附編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李善，《文選：附考異》（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1991）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范光宙，《史評》（清順治十五年（1658）刻本）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6）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張志淳，《南園漫錄》（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91）

章學誠撰，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脫脫等撰，《新校本遼史附遼史源流考》，（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陳壽撰，裴松之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陶宗儀，《說郛》（臺北市：新興書局，1963）

程頤，《二程全書》（臺北市：臺灣中華，1986）

趙翼撰，楊家駱主編，《廿二史劄記》（臺北市：世界書局，1974）

劉向，《新序》（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劉向，《說苑》（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

劉向，王照圓注，《列女傳補注》（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劉因，《靜修先生文集》（臺北市：新文豐出版，1984）

劉知幾，《史通通釋》（臺北市：世界，1981）

劉知幾著，朱恆夫、姚松譯注，《史通》（臺北市：台灣古籍出版，2002）

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劉知幾撰，趙呂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劉咸炘著，楊家駱主編，《四史知意並附編六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歐陽修，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1）

蕭統，《文選》（上海：中華書局，1977）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市：三民發行，2011）

錢穆撰，王雲五主編，《漢劉向、歆父子年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鍾嶸，《詩品》（臺北市：台灣書房，1996）

魏收，《魏書（二）》（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魏收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嚴可均，《鐵橋漫稿》（上海市：上海古籍，2002）

二、專書：（按作者姓名筆畫排序）

王族，《紙上城池：古書的故事》（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王錦貴，《中國傳記體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朱東潤，《史記考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朱國藩，何志華，樊善標編著，《〈古列女傳〉與先秦兩漢典籍重見資料彙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

吳組湘等選注，《歷代小說選》（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1991）

李景星，《四史評議》（長沙：岳麓書社，1986）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杜維運，《後漢書·中學史學史第二冊》（台北：三民書局，1998）
- 汪榮祖，《史傳通說：中西史學比較》（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周林，《後漢書今注今譯》（長沙市：岳麓書社，1998）
-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施之勉，《漢書集釋》（臺北市：三民書局，2003）
- 范曄撰，韓復智，洪進業註，《後漢書紀傳今註》（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出版，2003）
- 茅維編，《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徐子宏注譯，《周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高尚志，馮君實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 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
- 張大可編著，《史記全本新注》（西安市：三秦，1990）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曹旭，《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曹道衡選注，《兩漢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

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梁啟雄，《荀子簡釋》（上海：中華書局，1983）

章義和，《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8）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許素菲，《說苑探微》（臺灣：太白書局，1989）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書店，1987）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黃清泉注釋，《新譯列女傳》（臺北市：三民書局，1996）

- 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楊伯峻，《孟子譯注》（臺北市：華正書局，1986）
- 楊伯峻，《論語譯注》（上海：中華書局，2004）
- 葉大慶，《考古質疑》（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賈誼，于智榮譯注，《賈誼新書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 雷家驥，《兩漢至唐初的歷史觀念與意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 劉兆祐，《中國目錄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 劉向著，張濤譯注，《列女傳譯注》（濟南市：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
- 劉熙載著，徐中玉、蕭華榮校點，《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
- 劉瀚平，《話解易經·下經》（臺北市：五南，1996）
-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戴蕃豫，《范曄與其〈後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

顏之推著，周復剛、陳紱譯注，《顏氏家訓譯注》（臺北市：建安出版社，1999）

三、期刊論文：（按作者姓名筆畫排序）

邢培順，〈《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材料來源及加工取捨方式探索〉
《濱州師專學報》（2004年3月）

王琳，邢培順，〈試論劉向著述的思想傾向〉《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3月）

王麗英，〈論劉向《列女傳》的立傳標準及其價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卷第2期（2002）

田中和夫，李寅生譯，〈《列女傳》引《詩》考〉《河北師院學報》（1997年4月）

任芬，〈劉向《列女傳》及其現實意義〉《中華女子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

朱仲玉，〈魏晉南北朝時期史籍散論〉《史學史資料》第4期，（北京師範大學
史學研究所編印（1979）

吳全蘭，〈論劉向《列女傳》中的女性倫理思想〉《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9）

吳敏霞，〈《列女傳》的編纂和流傳〉《人文雜誌》（1988年3月）

- 宋仁桃，〈漢代婦女婚姻觀念的演變〉《蘇州大學學報》（2003年4月）
- 李寅生，〈《列女傳》引《詩》得失當議〉《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3月）
- 李淑梅，董曉瑞，〈從《列女傳》到《烈女傳》看婦女地位的變遷〉《邯鄲師專學報》（1991年10月）
- 李莉，〈劉向文學思想淺探〉《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 柯香君，〈論《周易》思想對中國悲劇之影響〉《人文社會學報》（2007）
- 范存芳，〈論《後漢書·列女傳》——儒家正統女性觀確立以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規訓〉《學海縱橫》
- 夏祖恩，〈漫談《後漢書》的史學特色〉《福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 高敏，〈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盛及其特徵和原因〉《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
- 張慧禾，〈中國女性類傳的發軔之作——劉向《列女傳》的傳記意義〉《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1998）

陳東林，〈劉向《列女傳》的體例創新與編撰特色〉《明清小說研究》第 80 期
(2006)

焦慶艷，〈《試論《列女傳》的語言藝術》《西安石油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月)

黃翠芬，〈《左傳》「君子曰」考證〉《朝陽學報第一期》(1996)

葛志毅，〈《列女傳》與古代社會的婦女生活〉《中華文化論壇》(1997 年 3
月)

熊明，〈劉向《列女》《列士》《孝子》三傳考論〉《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
年 5 月)

劉淑麗，〈漢代儒家正統婦女觀的演變〉《社會科學輯刊》(2003 年 6 月)

劉駿捷，〈劉向的憂患意識與學術實踐〉《齊魯文化研究》第九輯

薛麒麟，〈從《列女傳》到《烈女傳》——兼論漢唐婦女地位的變遷〉《益陽師
專學報》(1991 年 10 月)

鍾書林，〈《後漢書》研究史概述〉《唐都學刊》第 25 卷第 2 期(2009)

藍文徵，〈范蔚宗的史學〉《史學選集》(1976)

四、學位論文：(按作者姓名筆畫排序)

白品鍵，〈《悲憤詩》史事考—旁論東漢末年羌與匈奴之相關問題〉（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程方勇，〈范曄及其史傳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3）

馮利華，〈劉向《列女傳》試論〉（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論文，2007）

詹曉青，〈劉向《列女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高等教師在職碩士論文，2008）

劉燕，〈正史《列女傳》〉（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鄧劍萍，〈從女性主義角度看劉向《列女傳》〉（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衣若蘭，〈女性入史：歷代正史列女傳之編纂〉

<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396465&highlight=%C1%D0%C5%>

AE%82%F7 檢索日期：2012年2月26日